



这些跨国电池厂的女工，从全球化的受剥削和受受害者，发展为组织起来的维权者，为争取合理补偿和安全的工作环境而奔走，这个历程本身就是振奋人心的。这本书还带领读者一一阅尽中国的信访制度，民工怎样层层上访，工人最后怎样被迫罢工抗议，并几度瘫痪了这间跨国工厂的生产。

这个故事，不只是维权斗争的故事，而且是工人意识转变的故事，也是关于她们的希望的故事。这些女工受够了工厂中的氧化镉的有毒红色粉尘，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揭露公司怎样在关乎她们的职业健康上欺蒙她们。尽管官方禁止工人自主组织，而媒体又有新闻检查，但这些与别不同的工人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站出来，重申工会运动的传统价值：团结起来，坚决维权，以及用劳工的组织力量来对抗不义的制度。最后，GP超霸电池工人的维权故事还提醒大家关于工人运动的ABC，就是必须普遍尊重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87和98条的权利，即组织权和集体谈判权。我相信这本书使我们朝这一目标迈前一步。

Agnes Jongerius（荷兰工会联合会主席）

这本书记录了中国南方“打工妹”的一次维权历程，这个历程同时也是一种少见的、让女工自主自为的经历。一般民工的维权都是自发的，抗议和罢工往往短暂而又限于当地，但是这本书所记录的三间GP超霸电池厂的女工，却组织了持久的抗争，筹划了种种维权行动。她们把自己作为镉中毒受害者的身份，转变为主动争取自己权利的主体，这些权利包括安全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健康。她们打破沉默，把自己受到工厂的化学品危害，和权利受侵犯的事实公之于众——这几间工厂都是为世界市场生产电池的。妇女成为这次维权的领导者，无疑置自己于险地。但是她们也为其他中国民工立下榜样，证明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工人的集体抗争的意识还是会发展起来的。其他人将仿效他们的榜样。

Christa Wichterich（德国作家，关于全球化与妇女的专家）

ISBN 978-988-18039-5-5



售价(含邮资):
HKD 100 / USD 15



为健康与尊严而抗争
镉受害女工维权史



为健康与尊严而抗争

镉受害女工维权史

全球化监察





❖ 遭受害女工维权史 ❖

广东省惠州市



“让外商发财”——这是惠州市政府的外资服务中心





GP 超霸電池是香港
的名牌，並且行銷世
界。



惠州超霸電池廠





❖ 镗受害女工维权史 ❖

罗仲荣是金山集团的主席兼总裁，
也是前任行政会议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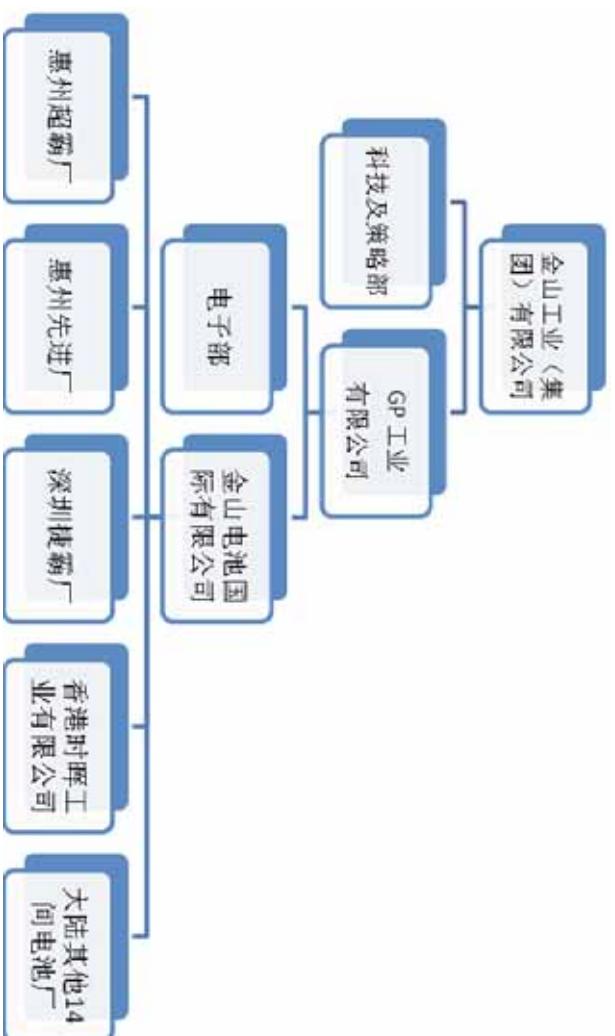


金山集团在香港葵
涌的总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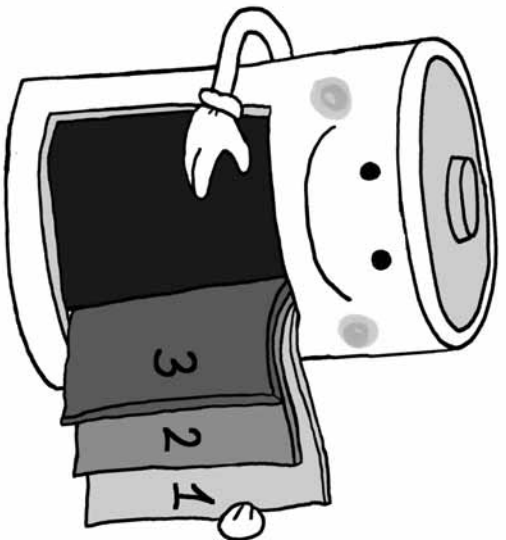
金山集团架构图





❖ 镉受害女工维权史 ❖

镍镉电池的内部结构



① 镉片（负极）

② 隔离片

③ 镍片（正极）



镉矿石

氧化镉粉





(上图)
惠州先进
电池厂

(右上) 超霸厂工人赤手处理机器，
把镉粉加工为负片。这个工人所用口
罩不符规格。此照片拍于2004年初。

(右下) 这个工人在处理镉负片，
手上看到镉粉尘。

vi





❖ 铜受害女工维权史 ❖





viii



超霸、先进电池厂在2004年以前使用类似的纸口罩



根据美国专家意见，要有效防止吸入镉粉尘，应该使用图中的设备。左图为空气净化呼吸器（面罩），右图为电动空气呼吸器（面罩）。

x





❖ 镉受害女工维权史 ❖



深圳捷霸厂女工抗议厂方毒害工人（2006年10月）





超霸厂的工会卡。卡上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字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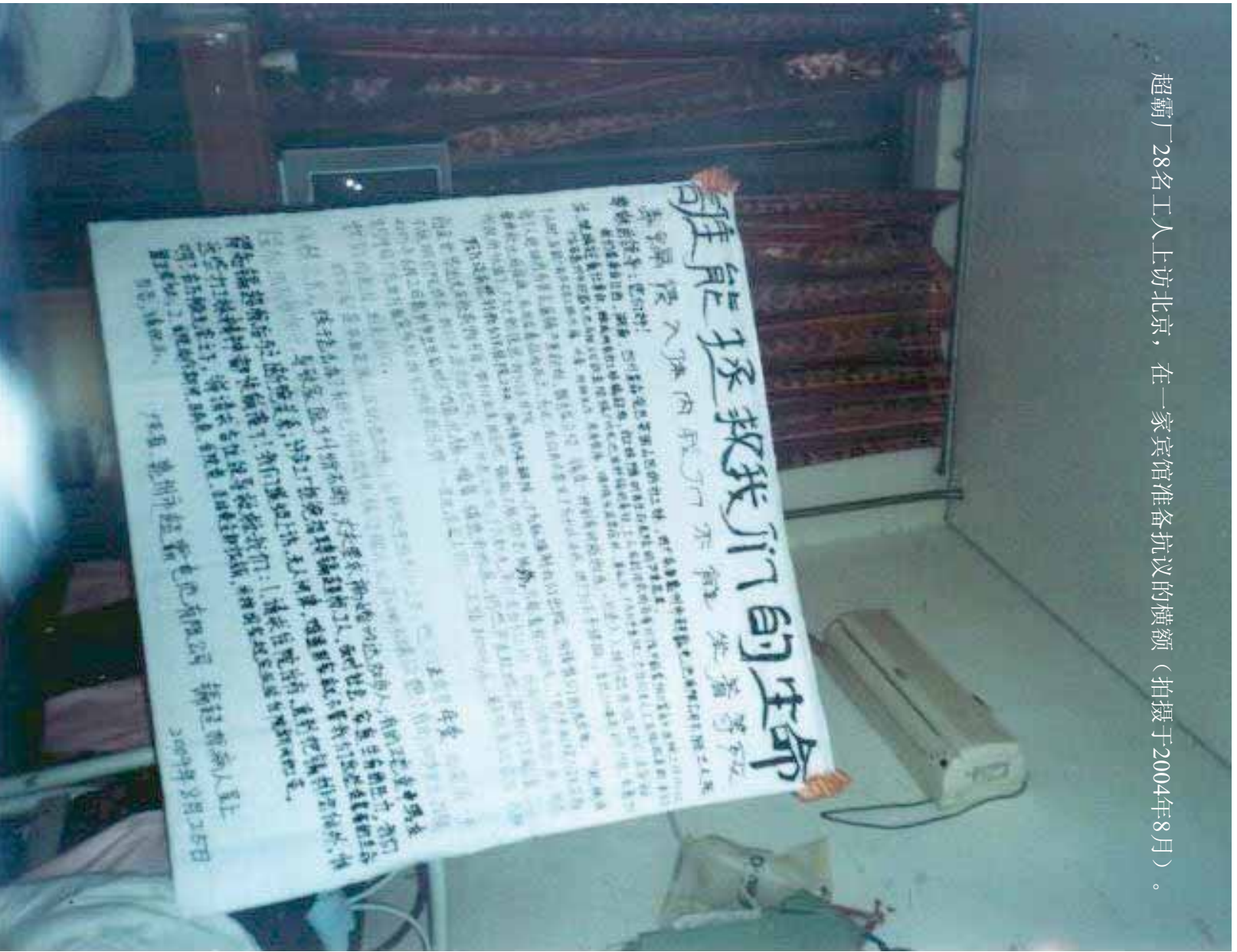
惠州先进厂的宿舍





❖ 遭受女工维权史 ❖

超霸厂28名工人上访北京，在一家宾馆准备抗议的横额（拍摄于2004年8月）。





2004年7月香港团体到金山集团总部抗议



超霸厂女工的抗议
(拍摄于2004年12月)



❖ 镉受害女工维权史 ❖

2005年12月已经被迫离职的女工抗议厂方在宾馆进行例行每年体检，又强迫她们脱光衣服洗澡才能体检。工人手持横额上的口号：“合法复查，还我健康”



付洪琴的住宿证。她入职惠州超霸厂两年后死于肾衰竭。她父亲控告超霸厂没有负责她的治疗费，並成功向超霸追讨26,500元的赔偿。





2007年1月，无锡的松下电池厂被揭发工人镉中毒。

2007年1月4至9日，无锡的松下电池厂工人堵路抗议，但被警察殴打并送回工厂。



xvi





❖ 镉受害女工维权史 ❖



2007年9月，日本的亚太劳工团结阵线（Asia Pacific Workers Solidarity Links）到日本松下总公司声援无锡松下电池厂的工人。



目 录

序	1
■ 第一章 ■	
故事的主角和配角——镬，官，商，工	4
■ 第二章 ■	
风波初起	20
■ 第三章 ■	
超霸厂工人为检查而罢工	36
■ 第四章 ■	
先进厂工人罢工	55
■ 第五章 ■	
官商勾结	68
■ 第六章 ■	
血汗工厂的一天	82
■ 第七章 ■	
看得见的拳头——围绕调解方案的较量	97





■ 第八章 ■	
千里告御状	115

■ 第九章 ■	
灾祸在扩散	153

■ 第十章 ■	
维权 DIY	178

GP超霸电池镉毒事件大事表	194
---------------------	-----





序

这本小书首先是一本控诉的书，控诉部份地方官商怎样为了所谓经济发展或者干脆为了发财而剥削、压迫劳动者，置劳动者基本健康和权利不顾。它特别要控诉GP超霸电池，在2004—2005年间，或者之前，罔顾生产安全和职业健康，导致惠州、深圳、香港四间工厂共五百工人确诊镉超标，28人轻度中毒。而事后也没有全面负起责任。

由于当地官员刻意协助资方打压工人，这场劳资纠纷从2004年1月起就是一场毫不公平的较量。即使只是为了送院检查，只是为了得到一份真确无误的诊断书，工人也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同政府——而不只是同厂方（！）——周旋：谈判，罢工，堵路，流汗，流泪。

但这个故事不过是全中国的电池行业的一个典型而已。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血汗工厂，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电池厂都已经转移到中国。今天，中国生产了世界上一半的电池，其中包括镍镉电池。也因为这样，中国也成为了镉的消费大国：镉的一半世界产量都由中国使用。由于厂商和当地政府都草菅人命，导致工人受镉害影响不知凡几。

不过，这个个案同类似案例也有相当不同。

GP超霸电池的工人，在长达三年中，用自己的泪和汗，用自己的行动，表现出少有的韧力和组织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工占多数，带头人也是女工。其次，由于这些女工维权时间比较长，使事件在2004年全年不断升级，超越厂门，把





序

方方面面的部门和人牵涉进来：横向，从一间厂发展到四间，从境内牵涉到境外；纵向，从工厂所在地小金口镇一直往上牵涉到市级和省级各个部门：劳动局、卫生防疫中心、法院，一直到医院、传媒、公安，甚至市长和广东省政府，一个个接踵而至，务必把工人的抗争遏制。到了这一步，本来工人必输无疑，而且是全输，因为大陆新闻完全不予报导，官商更加肆无忌惮打击工人。可是，在这时刻，来自香港的声援导致棋局骤变：新闻封锁被打破了。香港的报道转口变内销，大概惊动中央部门，最后由国家卫生部派出五人专家组到惠州“指导”；大约同时，工人也上访北京，也弄得当时部份惠州官员紧张兮兮，最后虽然证明虚惊一场，但是此时官商也不能不做点让步，既威逼又利诱工人离职。

工人在2004年9—10月间陆续离职之后，事件并没有结束。工人一方面不断跟金山集团打官司，另一方面，每年的健康检查也成为新的战场。在2005至2007年间，工人，资本家，各级官吏，法官，双方律师，香港团体，国际工会等等，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台，搞不清楚究竟是喜剧、悲剧还是闹剧。不管怎样称呼它，整个故事也处处折射着当代中国的光怪陆离，但也透着社会最底层的、从未间断的反抗精神。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可读之处。

本书是经过同四十多位工人做了大量访谈写成的。这些访谈记录了她们的喜怒哀乐，她们的抗争，她们的爱恨。其中有两章更完全是女工的手笔。

这本书的英文版在2009年5月出版，共六章。中文版篇幅则较多，共十章。主要的内容在2006年底已经写完，所以资料





基本以该年为准。

金山的故事仍未落幕，因为镉在体内的影响是长期的，而那些中毒工人的治疗更是漫长的。其次，即使只是为着每年的健康检查及各种附带权利，工人也要继续串连，抗争。何况，还有许多“好戏”在后头。有多少镉超标工人发展为中毒？会有工人因此而死吗？金山控告香港三个团体诽谤的官司又会怎样发展？中国其它电池厂的工人，又有多少会受到职业病的折磨？不管结果怎样，我们相信，把金山电池工人用血、汗和泪编写下的故事记录下来，本身就是一场斗争，一场彰显公义的斗争。这个故事告诉世人：

即使暂时力量悬殊，劳动者反抗剥削和不义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

2009年12月



■ 第一章 ■

故事的主角和配角 ——镉，官，商，工

金山电池的故事有许多主角，也有许多配角。
最重要的主角，是镉。没有它，就不会有这个故事。

关于镉的概述

镉（Cadmium, Cd）是一种有毒的银白色重金属。镉质地柔软，富有延展性，抗腐蚀、耐磨，广泛并持久存在于工业与环境中，对人和动物造成极大的健康危害。国际癌症研究署（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把镉归类为第一类人类致癌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文件，人体排镉的半减期长达20—40年，就是说，镉一旦进入人体，通常要花十几年以上才能把镉排出一半。这是因为镉随尿液的排出，每次份量极其微小。由于难于排出，镉能对多种器官和组织造成长期损害，特别是肾脏和骨骼。过量镉堆积在肾脏，会造成肾小管损伤，而衍生肾衰竭。过去瑞士利用老鼠进行的实验更显示，过量的镉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肾衰竭、肺癌及前列腺癌的风险。慢性镉中毒并不罕见，1931年起，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就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当时该地区出现了一种致死的怪病，患病者临终前会出现全身骨痛，有的人还会一直喊叫





着“痛啊，痛啊……”，所以这种病当时被称为“痛痛病”。由于镉的毒害太大，2006年7月，欧盟禁止电器及电子用品中含有镉。这个禁令也使到含镉电池不能再出口到欧盟。

镉及其化合物（比如氯化镉、氧化镉）都有毒。氧化镉呈红色。制作镍镉电池所用的材料就是氧化镉，主要是用作导电。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血汗工厂，像电池这样非常污染和有毒的工业，纷纷转移到中国。2004年中国生产了世界一半的电池，八成都用来出口。当年中国共出口了八亿枚镍镉电池，比1999年上升了67%。¹中国作为镍镉电池生产大国，也意味它同时也是镉的消费大国。²

要防止工人在制造电池时吸入或意外吃进镉，花费其实不会很多，只需要比较有效的通风系统，和有效的口罩，以及职前的培训。这些法律义务其实都记载在《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治法》中。可是金山电池却仅仅为了节省一丁点的成本而把这一切法律要求置于脑后。尤其可恶的是，连告诉工人镉为毒物这样一种不花钱的法律义务，金山电池也竟然懒得去做！怪不得金山属下的大陆三间电池厂都实际变成了毒窟，在2004—2006年酿成400多人超标，22人中毒的恶性事件。中毒者数目在以后还陆续增加。

为了推卸责任，香港金山工业集团事后声称：“众所周知，吸烟和食用牡蛎等贝壳类食品（在中国是经常食用的）会增加体内的镉。”³金山忘记了，工人的工资其实没有多少钱可

1 《中国电池工业经营全书》，航空工业出版社，2006年，北京，284页。

2 <http://www.asiammetal.cn/report/2007ge.pdf>

3 2006年2月金山集团就镉事件回复瑞典团体的质询（It is generally known that smoking and consuming shell foods, such as oysters, a common diet in main-





以天天吃牡蛎。工人受镉害，不是因为吃牡蛎，更不是因为吸烟（厂里大多数是不吸烟的女工），而是因为金山电池属下的工厂，在长期罔顾工业安全和工人健康的情况下使用氧化镉而造成的。铁证如山，焉得抵赖！

在这个故事中，读者会不断接触到“尿镉”、“镉超标”和“观察对象”等名词，所以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基本概念。

尿镉

为尿液中镉的含量。根据中国卫生部2002年发布的《职业性镉中毒诊断标准（GBZ17-2002）》——下称《诊断标准》——测量人体镉含量，主要是靠化验尿液中镉的含量，而非化验血液。因为镉主要沉淀在肾脏，故把尿镉作为慢性镉中毒的诊断指标。

血镉

血液中的镉含量，简称血镉。血镉主要反映近期接触量。⁴只有在急性镉中毒时，血镉增高才可作为过量接触镉的左证。这一点对读者了解故事的发展很重要。

观察对象

《诊断标准》把尿镉测定连续两次在 $5\mu\text{mol/mol}$ 肌酐⁵以上，尚无慢性镉中毒的临床表现，视为观察对象。也就是只超标，未算中毒。为什么是 $5\mu\text{mol/mol}$ 肌酐呢？因为据调查，

land China, increase bodily cadmium levels.)。

4 据中国卫生部颁发的《职业性镉中毒诊断标准GBZ17-2002》附录A：“血镉主要反映近期接触量。”

5 “摩尔”（mole，简写为mol）表示分子数量，1摩尔（mol）= 10^3 毫摩尔（mmol）= 10^6 微摩尔（ μmol ）= 10^9 纳摩尔（nmol）。纳摩尔又称“毫微摩尔”。





当尿镉达 $5\text{--}10\mu\text{mol/mol}$ 肌酐时，肾小管功能异常的患病率可达 $5\%\text{--}20\%$ 。这也说明，超标者虽然未算中毒，但是当中会有一些比例的人会进一步恶化，所以才成为“观察对象”，需要密切观察，每年复查，并非如金山所说的，“观察对象可以正常生活，不须治疗”，简直就是身体健康一样。（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后面还要说到。）

镉中毒

分为急性中毒和慢性中毒两种，当中又有程度轻重之分。金山电池22个中毒工人都被诊断为“慢性轻度中毒”。

所谓“慢性轻度中毒”，就是说不仅尿镉两次超标，而且有头晕、乏力、嗅觉障碍、腰背及肢体痛等症状，同时实验室检查又发现以下任何一项改变时，可诊断为慢性轻度镉中毒：

- a) 尿 $\beta 2$ -微球蛋白含量在 $9.6\mu\text{mol/mol}$ 肌酐以上；
- b) 尿视黄醇结合蛋白含量在 $5.1\mu\text{mol/mol}$ 肌酐以上。

金山怎样堆积自己的金山

第二个主角，当然是金山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集团）。它是控股公司，属下的金山电池所生产的GP超霸电池是有名的香港品牌，2003年被香港中华厂商会选为十大品牌。除了生产一次性电池之外，金山也生产室内电话、照相机等家庭电器用品的电池，以至电动汽车的电池。2008年奥运会选择金山的汽车电池来装备其45座位的电动小巴。

金山电池不仅生产自己的品牌，还为许多国际著名品牌生产各种电池，它们包括EverReady, Siemen, Sony, Panasonic,





Rayovac, Nikon, Canon, Toshiba, Fuji, JVC, Kodak, Konica, Minolta, Olympus, Pentax, Ricoh。

母公司金山集团也很有名气。由香港政府举办的2000千禧年的盛典的灯光就是由金山所赞助。金山工业集团1964年成立，1984年在香港上市，在几十年内便发展为一间亚洲跨国公司，拥有广泛的工业投资项目，主要为电器及电子工业。2002—2003年，即镉毒事件爆发前一年，营业额55亿港元，总资产81亿港元，员工超过一万五千。集团有三大主要成员机构：GP工业有限公司、金山电池国际有限公司及奇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奇胜已于2006年出售），各于新加坡独立上市。集团现时之生产设施、产品研究发展及销售办事处遍布全球十多个国家。金山集团的电池产量位列全球十大；在亚洲是日本之后的第二大电池生产商，又是世界十大电缆生产商。

GP超霸电池可说是金山集团的“金山”，因为电池占集团总营业额多年来都超过一半，2005—2006年为57%。电池业务占总税前溢利，2004年前曾经接近四成，近两年因为原料价上升以及镉害事件影响而下降为两成。2002年金山电池在销售量及营业额上都超过其它品牌，怪不得它当时的边际毛利提高40.5%。

金山在自己的年报中自夸为关心公益，参加了香港政府的一公司一份工计划、展翅计划，所以连续两年获香港社会服务联会颁“商界显关怀”标志；它又自夸关心环保，参加了环保署及业界合办的“流动电话电池回收再造计划”，又与商界环保协会合办“绿色生活由我做起”教育计划。讽刺的是，金山集中生产一次性消费电池，这本身就不符合环保原则。





更搞笑的是金山主席罗仲荣在2004年报中说“集团一向视员工为最宝贵的资产，致力缔造一个理想的工作环境，令员工感到备受重视和赏识，增加员工对集团的归属感。”读者从我们这个故事可以了解到所谓“员工备受重视和赏识”是怎么回事。

金山能够迅速发展，同中国全面与全球资本主义接轨是分不开的。1982年，金山产品开始打进大陆。奇胜以高质产品进入中国，提供一系列开关插座产品予当时对外开放重点投资项目之一“广州中国大酒店”。自此，奇胜为中国各项重点工程提供产品服务，在当时中国高档市场占据超过90%的份额。为了充份利用大陆极为廉价的工资，于是把工厂从香港迁到大陆，在1986年开始投资于合资企业并发了大财。金山的合资对象是德赛集团。德赛集团成立于1983年，后来成为“亚洲最大的电池生产基地之一”，前身为惠州市工业发展总公司。它是惠州政府为引资而专门建立的国企。金山集团就是它第一家引进的外资。起初，“它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全方位的大力的支持，使得德赛能够第一次和外商嫁接，结成战略同盟，建立了初期为数不多的几个合资企业”。⁶多年的经营使金山同大陆官方资本结成合作关系。到今天金山在全中国大陆有17间工厂，多数是电池厂。从1997年至今，超霸电池成为全中国同类市场十大畅销品牌。2002年它收购了中国第二大碱性电池商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75%股权，因此取得了有第

6 “1992年惠州市人民政府正式批覆在惠州市工业发展总公司的基础上组建德赛集团公司。”见德赛网站之〈大事记〉。<http://www.desay.com/docc/about/memorabilia.asp>





一品牌之称的“双鹿牌”，为其雄霸中国电池业奠定基础。

2002年金山又以近一亿人民币买进TCL集团6%的股权，罗仲荣也因此成为董事。TCL集团在1981年成立于惠州，是一间大型的国营公司，从事制造及分销电子及电器、信息科技及电讯产品例如手机。今天，TCL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品牌。值得注意的是，TCL集团的第一大股东不是别人，而是惠州市政府，占股份40%多。简言之，金山集团、惠州大官、TCL、德赛可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⁷

金山电池在惠州共有三家电池厂。建于1994年的超霸厂被称为“新厂”，建于1987年的先进电池有限公司则是“老厂”，座落在市区里。超霸厂原有1,500工人，先进厂1,300多名，都生产镍镉电池。还有一家新时代电池厂则在2003年建厂。关于超霸厂工人的事件，媒体有许多报导。关于先进厂的，却很少。超霸厂事件曝光较早，斗争延续得较久，有很多积极的工人和代表。先进厂则迫于社区的压力，很快关闭了生产线。

江小眉⁸回忆道：

“先进电池厂，一开厂就做镍镉电池。开厂的时候原名是‘时晖’，叫了有五六年。起先是跟德赛合资，由德赛出面打税。之后改名为先进电池有限公司。1987年的时候，厂很小，只是几间旧房子，顶上盖的是瓦片。1988年建了一

7 TCL曾经被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质疑它在1998年改制前后，以李东生为首的最高管理层，其占有股份从7.99%无端增加到2002年的25%；同时国有股份就从91%一直降低到只有41%！这里究竟有无文章，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真是天知道。关于郎咸平的文章，请参考《中国企业战略思维误区分析》，郎咸平，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七章。

8 本书中工人名字皆为化名。





幢新厂房。那时候我就在附近读书（中学），有老乡在厂里做。我到厂里玩过。初中毕业以后，1990年5月，我进了这家厂。”

金山集团的主席兼总裁是罗仲荣。曾和罗主席交过手的理工学生形容他为人颇为冲动。不管怎样，我们的罗主席在香港也算是一个人物。罗主席在取得理学学士学位后，便于1972年加入金山工业集团。他不仅是著名工业家，而且是社会名流，长袖善舞，屡获勋章。他是太平绅士，又曾获香港行政长官颁授“金紫荆星章”，以表扬他对促进创新科技发展之杰出成就。他又先后担任过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和主席、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2005年更登上政坛，被行政长官曾荫权委任为行政会议成员。更重要的是罗主席同惠州官员关系很好，也是惠州市的荣誉公民。

罗主席的政见偏于保守。2006年记者问到他对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立法建议有何看法时，罗说：“我相信市场力量。立法可以考虑，但愈少愈好。”

当地政府众官相

珠江三角洲在二十多年间发展为一个巨大无比的出口加工区，以其低廉的劳动成本和各种税务优惠而吸引了世界各地资本，而为首的当然是香港和台湾资本。惠州也因此从一个年产值只有30亿元人民币（1988年）的小城市变为800亿元（2005年）的工业城。官方报章这样介绍惠州：“世界最大的电池和激光光头生产基地之一；亚洲最大的电话机、计算机主板生产基地；CD、DVD等激光头年产量占世界产量的40%以上……





这些都是惠州的骄傲。”⁹但是高速发展的代价之一就是职业病像瘟疫一样传播。

目前在中國大陸，接觸毒物、粉塵和噪音等職業危害的人員高達2,500萬人以上，分布於50多萬家企業。國家安全監督總局在2004年的報告中提到：“我國實際接觸有害作業的人數、職業病患者累積數、死亡人數和新發病例，都是世界上最高的。每年約70萬人患各種職業病。工業發達國家已經基本解決的傳統性職業危害，如塵肺病、急性和慢性職業中毒、作業場所噪音傷害等，在我國仍然嚴重威脅着勞動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由於勞動保護條件惡劣，從業人員從接觸到患病的时间越來越短，患者死亡率從低於15%升至20%以上。職業危害嚴重的原因是：“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急功近利，在項目引進中沒有嚴格進行職業安全健康方面的評價，造成國外一些嚴重危害從業者身體健康和污染環境的產業向我國轉移，出現了一些過去罕見的化學和放射性傷害病例。”¹⁰

職業病泛濫不是因為沒有法律。相反，中國有關法律其實比較發達地區還要嚴格。以鎘的診斷為例，大陸的標準比香港還要嚴。職業病泛濫是因為有法不依。官員可以在限制民工權利的法律上，積極落實，超額完成，可是一涉及到保護民工權

9 科技日報網，http://www.stdaily.com/big5/stdaily/2006-11/14/content_594465.htm

10 《全國安全生產：態勢趨於好轉形勢依然嚴峻》，人民網一國內新聞，2004年5月28日。另外，廣東省接觸職業危害的職工有近1,000萬人。有5大職業病高發行業：寶石加工業（易致塵肺病）、集裝箱生產業（電焊工易患塵肺病）、制鞋皮革業（苯中毒易致白血病、再生障礙性貧血）、五金電鍍行業（易致三氯乙烯中毒）、電池生產行業（易致鉛、鎘中毒）。此外還有電子、印刷等行業。但監管職業病的專業人員卻極少。





利的法律，很多官员却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

2006年11月，中国热带医学杂志发表了惠州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的报告，实际批评了惠州的职业病管理腐败，值得引述：

“全市登记工业企业2万余家，从业人数103万，涉及职业危害的企业数约4,000余家，自1998年共收到8起职业病事件报告，与从事企业数和人数严重不符，存在管理空白。……部分基层政府片面强调招商引资，让一些属国家明令禁止的‘五小’工业和属工艺落后淘汰的企业落户，尤其是制鞋、宝石、电池、电镀、皮革等职业危害大，污染严重的中小企业。个别职能部门不按法规办事，给已明令取缔的企业，异地发予相关的证照。企业在申报的过程中漏报、瞒报的现象普遍。卫生部门对企业职业病危害的种类掌握不清楚，降低职业卫生监管和职业病的防治力度。”¹¹

其实金山镉害事件中所涉及的官员，不仅麻木不仁，而且偏帮资方，打压工人。没有当地官员的帮助，金山老板和工人之间的交手，谁胜谁负还难说呢。

当地官员为什么会这样积极帮助金山脱困？稍微了解国情的人都懂得，这是“地方保护主义”嘛：GP超霸是当地的大户。但是当地政府要保护的，还有比交税更多的东西。

世界各地都在积极引资，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不仅把引资多少列为官员政绩的考核标准，而且不少地方都像惠州市那样，明文规定官员引入的外资数目同他们的收入直接挂钩。惠州市的文件〈关于鼓励外商在惠投资兴业的若

11 中华首席医学网, http://www.shouxi.net/literature/200611/3117_103083.aspx.





干规定）包括这样的奖励制度：

“对在招商引资工作中作出积极贡献、成绩显着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记功和授予先进称号，可给予现金奖励，并作为干部提拔任用政绩考察的重要依据。对于非国家公职人员在招商引资工作中牵线搭桥引进项目成功的，可按项目实际投资额一定比例给予现金奖励。”¹²

一个比较重视清廉的政府不应该有这样的规定，因为这鼓励官员搞官商勾结。尤其当各地政府还拥有许多大企业，而这些官方资本又与外资结成紧密的合作伙伴的时候，在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况下，就难免使官与商之间结成利益关系。这时候官员自然容易偏袒无良资本家。前文提到过惠州政府与TCL、德赛、金山的密切关系。这里再补充一点人事上的资料。前任惠州市副市长许光，一开始时就是德赛的车间主任，以后平步青云，一直做到德赛老总和副市长（2006年才卸任）。还有一个曾长期任官的朱友植，是TCL的独立董事，后来又被罗仲荣委任为金山工业安全基金的拨款委员会委员（关于基金，我们以后会谈到）。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当地官员毫不掩饰地维护金山集团。官商之间达到这样的亲密程度：超霸 / 先进厂工人在2004年初先后罢工争取体检，当地市政府就立即成立包括有相关部门的镉事件处理小组进驻工厂，协助厂方打压工人。而一个叫张莉的，本来属于政府处理小组成员，在事后可以摇身一变，变为超霸厂的高级管理人员，专门负责对付工人。这位“

12 惠州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http://www.huizhou.gov.cn/tzhzviewArticle.shtml?method=viewArticle&id=2AA9A5E8F1404F8ABA172D158346A1D2>





张姨”有一句话非常有代表性，言简意赅地反映出中国大陆的政治风气。有一次，工人当面斥责张莉处事不公，形同妖怪。张应声说：“妖怪千年在，好人命不长！”

工人抗争梗概

在许多有关民工的大陆报导或分析中，往往只把他们描绘为受害者：他们的处境多么悲惨，多么需要帮助。这样的笔法，同嘲笑跳楼的民工——为追讨欠薪而跳楼——是“跳楼秀”的冷血报导相比，自然好得多。可是，那种把民工特别是女工单纯看成弱者，并不符合事实。他们在不少的情况下也会变成抗争的主体。事实上每年都有许多民工罢工、堵路的事件。而在这次金山电池的工人斗争中，一方面逐步形成了工人的领导核心，而且后来变成以女工为主；另一方面，即使不是领导核心，工人中也涌现了各有才干的积极份子。在厂方眼中，有些很有领导才能，有些特别善闹，有些口才特别好，有些不怕死，不一而足。

超霸 / 先进两厂分别有1,500及1,300工人。他们主要来自湖南、四川、江西等，也有不少是惠州人或来自广东其它地区。在其它民工抗争中，工人有时沿省籍而凝聚起来，使得团结成为困难。但是在GP超霸电池事件中，在2004年全年，两厂工人基本上能够克服内部矛盾，至少在直接受镉影响的工人中团结斗争（至于未受影响的工人，要他们参加斗争就比较困难了）。在事件初起，工厂以为这些女工知识不多，容易糊弄。但是一年下来，有个管理人员不得不说：“以前以为你们是傻瓜，现在才知道你们是精瓜！”

由于事件涉及多个厂，以及不同部门的员工，且历时超过





三年，线索颇为复杂。整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事发到工人被迫离职（2003年底至2004年底），为第一个阶段，主要抗争目标是争取体检真相和住院治疗。从工人离职之后至今，为第二个阶段，主要围绕官司、体检、赔偿等问题而行动。本书比较着重前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涉及大陆三个工厂（惠州超霸 / 先进，深圳捷霸）的几千工人。但是，由于大陆工人往往是在直接牵涉到自己才会行动，而每批工人的体检和公布结果的时间又有所不同，所以罢工、堵路、堵厂有时只牵涉几十人，有时又扩大到五、六百甚至上千人。

按卷入事件或参加抗争的时间顺序，主要涉及如下几部分工人：

1. 超霸厂粉房（加工部）工人；
2. 超霸厂装配部工人；
3. 先进厂装配部工人；
4. 先进厂包装部工人；
5. 超霸厂全厂员工（包括组合部、包装部工人）

2004年5月间，有17个工人自行去体检，发现镭超标。

刘右君是这17人中的核心人物。他在工人中间口碑很好：积极，有头脑，做事公平。事件发生的早期，他做了很多组织工作。2004年5月和6月装配部女工的斗争，他都参加了，并成为带头人。离厂后，刘右君还经常到医院跟工人联络，帮助工人进行组织，直到有了新的领头人。

刘右君走了之后所形成的核心却是以女工为主。这有点反常。民工的斗争，几乎全是自发的、无组织的、为时很短的，所以也很少有比较固定的领导，最多只有带头人，而通常以男性居多。但是金山电池工人的斗争不仅为时长，而且领导者以





女性为主。斗争时间长，主要是因为涉及到镉害这个本来为祸深远的职业病。领导以女工为主，则主要是由于一些特殊情况：她们不少人是拉长，也就是基层管理。这些人教育水平比较高，本来就有管理经验，在工作中锻炼出一定的领导能力，也有一定的威信。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她们不会参加工人的斗争的。可是，当这些拉长也检验出镉超标的时候，她们愤怒了，然后在见识过厂方的欺骗后，她们就把心一横，带领工人闹起来了。

女工群芳谱

程湘是拉长，是最早参加罢工争取体检的17名员工之一。

后被列为镉观察对象。刘右君离厂后，她成为工人组织者及八个代表之一。程办事周到，有条有理，并且以身作则。除了跟工厂、政府镉事件处理小组谈判之外，还帮助几名已离厂的镉超标工人争取到一些补偿。2004年9月份离厂之前，工人们便开始打算通过法律途径向厂方索偿。她是组织员工诉讼的发起人之一。用她丈夫的话说，她有较强的叛逆性格。她回乡后，还在一起村民维权事件中起了领头人的作用。在整个抗争过程中，她的能力和认识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幸运的是，他的丈夫在事件中从头到尾积极地支持她，支持工人们，出谋划策，查找法律条文以备上访，以及与工厂、政府代表谈判之用。

曹梦华，为人聪明、干练，性格倔强。离厂前，她担任拉长之职，工作认真。随着镉事件的发展，工厂的欺骗和压制使她日益反感。2004年9月初的谈判、到惠州市政府上访和全厂





大罢工，她是工人代表。10月份之后，她住进广东省职防院，当时许多工人只是以织毛衣、纳鞋底打发时间，她查阅有关职业病知识和法律、相关劳动法例，和各种资料，同厂方代表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

李丹，粉房员工，是最早住院的员工之一。她性格泼辣、果敢，冲动。起先，工人们并没有想到需要怎样的抗争，更缺乏经验。李丹也是如此。她说：“很多事情经过以后很久，回过头才明白”。只是在一步一步争取最基本权益的过程中，事件的逻辑迫使她和其它工人一样走到和厂方针锋相对的地步。后来，她成为第二批发起诉讼的员工的组织者和代表之一。在香港，面对金山工业集团的李太，她说：“不是我们不讲情面，是你们一再欺骗我们，把我们逼到这一步。”

郑春红，结婚和生育之后，她才进了厂，在装配部当员工。春红的学历较其它代表稍低，不善言词，但做事情认真稳妥，所以后来成为第二批诉讼的组织者。她也是最早罢工争取体检的17名员工之一。想起自己辛辛苦苦工作，却身受着如此伤害，她经常难过甚至流泪。不过，她的天性乐观，用她自己的话说，“天天都是一副好笑容”，也是“穷开心”。

江小眉，初中毕业后进厂，后升任拉长，工龄很长，当然，也受害甚深，经常发病。她是当地人，婚后从乡下迁至城区。在两厂员工当中，小眉也有一张“好笑容”。像大部分中国农村（乃至城市）女孩那样，她不善于争取，却把吃苦耐劳视作理所当然。多年的工厂生活使她“想法非常单纯”。她一再提到以前是怎样以厂为家，事情做不完甚至拿回家里做。尽管每天下班回家已非常疲惫，她仍要做大量的家务，却很少机会在其它亲朋



❖ 镉受害女工维权史 ❖

面前吐苦水。镉害事件曝光之后，她自己发现超标了，向厂方讨公道却同样遭到打压，使她看清了厂方的本质并走上抗争的道路。这真正是逼上梁山。因为她勤恳无私为工人办事，得到工人的信任，成为总代表。





第二章

风波初起

(2003年12月)

事情是从2003年10月开始的。

“如果不是李季忠到广州医院去检查，也许后面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¹

记者的这句话，也可能是员工自己说的。一些工人也曾经这样告诉我们。就超霸的镉事件来说，的确有凑巧。

不过，超霸镉事件中，第一个发现血镉超标的不是李季忠（易志雄），是名叫邓馨的女工。可能记者有所考虑，所以这样写。

邓馨因身体长期不适，尤其在2002年9月生下一对双胞胎之后，时常腰骨疼痛。她到医院看病。医生诊断是“腰椎间盘突出”。偶然地，她了解到病因可能是由于体内重金属比例过高，而自己在车间里成天要接触一种叫作“镉”的重金属。她是超霸电池厂的老员工，在一楼粉房工作，每天11个小时呼吸满车间飞扬的氧化镉粉尘。粉房又称加工部，工位是制作电极片，也就是将粉末状的氧化镉等原料用机器压成固状，再运到三楼的装配部

¹ 《百名员工疑镉超标 惠州GP超霸电池厂事件迷雾》，2004年7月18日，中国经营报（田彦红 张鹏）。李季忠是化名，原名应该是易志雄。





继续加工。这样，她来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²（以下简称“省职防院”）。抽血检查的结果是：血液中的镉含量严重超标。院方“建议试排（镉）或者治疗。”

邓馨把检查结果交给了厂方，“我就想等着厂里给我治疗”³。这样一等就是两个月。厂领导没有答应她的要求。

易志雄也在粉房上班。他得知消息，便向邓馨打听，也去了省职防院。据称他也头昏——这是受镉影响的工人常见的毛病。12月19日，易志雄拿到检查结果，血镉比邓馨还高得多，达187nmol/L（正常值为4.5~44.5nmol/L）。据工人说：邓馨在厂里工作了七年，本来是个拉长⁴，后因故被调到粉房工作，因此血镉超标程度不如易志雄。

消息传开，粉房里一片恐慌。虽然对“镉超标”大家并不怎么了解，但总还知道是件坏事，是表示身体受到了伤害。

那时候，车间里的人听到易志雄超标超得那么高，个个都快哭出来。那个黄××，我看着他眼泪快掉下来了。易志雄是开机的，机器开正常了、物料稳定以后，就不用一直

2 关于邓馨自检发现血镉超标的较详细的经过，可参看《惠州：镉中毒后的劳资紧张》（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8月9日出版 29/2004，总第191期。记者：刘英丽），但与重庆电台播出的《惠州镉超标事件》中邓的自述稍有出入。该报导中还说有一段谈到邓馨：“在2月24日的检验中，邓馨的血镉指标显示为正常；但6月14日，她再度自行去检验，却显示血镉和尿镉都超标，而检验员与单位统一检验的是同一个人，都是“王俊”。厂方则在2004年6月17日发出通告，宣布不再承认员工自行检测的结果，这更增添了员工的疑虑。这是后来惠州超霸、先进、深圳捷霸厂许多工人的共同遭遇。工人手上握有大量关于医院嫌疑出具虚假检查结果的证据。

3 邓馨的自述。重庆电视台《惠州镉超标事件》，播出日期：2004年10月25日。

4 工厂里，流水线通称为“拉”。“拉长”就是流水线的管理人员。一个车间有几条流水线，便分别称为“一拉”、“四拉”等，也可以反过来称“拉二”、“拉三”。拉长之上还可设主拉。





守在机器旁边。如果他都超得那么高，那么，那些配粉的拍片的员工，整天离不开岗位的，不是更完蛋了！⁵

后来有员工多次提到：其实早在2003年6月，就有工人因为头晕、头痛，体检发现镉超标。还有最早住院的员工之一姚××，女儿2001年3月出生。怀孕期间，她产检验血，有一项超标。医生问她：“你有没有接触化学物品？”接着建议她最好不要去上班，到广州的省职业病医院做检查。姚××当时不以为意。妊娠时也没不正常反应，就更没放在心上（后来孩子出生后，却验出镉超标）。我们很难设想，假如工人更早发现患上职业病，情形会是如何。

关于“职业病”，近几年来大陆媒体的报导在增多，但大多数工人往往误解了它的意义。人们对“职业病”一词的印象，只是长久从事某种职业而养成的特殊心理与习惯。2001年10月，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实施日期自2002年5月1日开始。各地政府对该法例（以及安全生产法）都有所宣传，但力度有限，且极具中国特色的，宣传对象只限于企业，很少普及到一般工人，因为地方官普遍没有保护工人的应有权利的意识，如果不是有意地偏袒企业的话。虽然还有一个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可是，它从来不会像香港的职业安全健康局那样、无偿向公众大力推动有关预防工伤的教育（电视广告、免费书刊和讲座、免费培训等）。

加上由于工人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劳动强度又很大，身体早就不很好，即使得了职业病，也往往误以为是工作过劳而已，没有警惕到是职业病。一篇新闻报导这样说：

5 超霸电池厂员工访谈记录。





“如果不是看到检验结果，工人可能永远不会将自己平日的腰酸背痛或盆骨痛等症状，和镉这种金属联系起来。他们原来都以为是加班的缘故，据工人称，在电池厂上班，一般每月工作30天，每天12个小时。”⁶

其次，即使在受到伤害之后，工人也不一定意识到患的是职业病，因为很多职业病在一般医院里诊断不出来。很多工人带着一身病痛，不明不白地辞了职。过去，在超霸厂和先进厂，不少年轻的女工因为受不了工作岗位的肮脏而辞职，一些工人试图多吃猪血来帮助清洗肺部积尘。事实证明这并没有预防到镉毒。预防职业病需要的是有效的防护措施和专业知识，而有义务提供这些条件的主体，本来就是资方而非劳方。只是由于大陆一般私人工厂大多不肯有效预防职业病，才迫使工人药石乱投。“哪个工厂没有毒呢？”有工人无奈地这样说道。

生产环境恶劣 防护措施无效

金山电池属下至少有四间工厂出现工人镉超标和中毒：惠州两间（超霸 / 先进厂），深圳一间（捷霸），香港一间（时晖），可见事件决非意外，而是管理层长期漠视工人健康的结果。究竟金山高层知否镉有毒？香港金山的员工告诉我们：香港派出的高层个个都知道镉有毒，知道要有劳动防护，但是否会同国内人讲，就不知道了。

究竟金山电池对预防职业病麻木不仁、罔顾法律到什么程度？

按照大陆的《安全生产法》及《职业病防治法》，资方有

⁶ 《惠州：镉中毒后的劳资紧张》，记者：刘英丽。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8月9日出版 29/2004 总第191期。





责任告诉工人接触到的所有危害因素，特别是有害化学物，有责任提供足够的劳动防护，工作场所要符合卫生标准，不得安排孕妇在有危险的岗位上工作。这一切法律义务，超霸 / 先进两厂全部违反。（有关详情请参考〈惠州小金口超霸厂违反劳动法等法律之处〉⁷⁾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13条，工厂应该把有害与无害作业分开，设立有配套的更衣室、洗浴室、孕妇休息间等卫生设施。可是超霸厂完全没有遵守。车间是密闭的。当工人清洗车间时，扬起的镉粉令她们近在咫尺却望不见彼此。工人们长年就是在这样的车间里每天工作12小时，“像机器人一样，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工人喝水的杯子都是没有遮盖的放在充满镉尘的车间一角。不用半天时间，杯子上就会布满粉尘。很多员工的杯子都没有盖。即使有盖，打来的开水要掀开盖，让水冷了再喝。厂里规定员工不准串岗，还规定上晚班不准到楼下去，也就是逼着员工在车间里吃东西，包括拉长。从1994年到2004年整改以前，十年时间一直是这样的。从拉长到工人，不知因此吃进了多少镉粉。

一位超霸女工回忆：

工厂工作环境恶劣。一楼到三楼的车间均有空调，密闭不通风，没有抽风设施。而从四楼开始，就只有排气扇，不能产生良好排气效果，很难起到排出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作用。

工厂厂房与工人宿舍相隔很近，车间的排风孔直接对着

7 请上全球化监察网站 (<http://globalmon.org.hk>) 查阅。





宿舍门窗。可想而知，工人的生活环境中存有多少有毒有害物质。

另外，工厂提供的防护用品差劲的不可思议！首先是口罩：从94年建厂到2003年“非典”爆发前，装配部（包括一楼第一道工序、直接接触镍、镉等物质的工人）都使用一种纸一样薄的白色口罩，别说防有毒的粉尘，连一点感冒细菌都抵挡不了。说个不方便的比方，比卫生护垫还薄。而这样的口罩他们一用就是6年。有些工位连这样的口罩也没有。2003年为了预防“非典”，工厂开始改发给工人蓝色的外科用的一次性口罩，每周三个。因为今年发生大批工人镉超标的事情，厂方才开始改用防尘口罩，一周两个。经工人们反映后，才答应一周三个。还有手套与工衣，都是用普通的、不能起到防尘效果的材料制造。并且，因工厂车间未能提供更衣室，工人需把工衣带回家或者宿舍清洗，更直接穿到食堂吃晚饭。这样，镍、镉等有害粉尘也被带到了工人的居住环境以及饮食。

我们厂里很多员工，怀孕了好几个月，还在粉尘车间做。很多是怀孕5个月以后才调去二楼。生下来以后，经常要给在工作时间内、到楼下为小孩喂奶（小孩由家人带到工厂），因为喂奶的时候还没洗澡，工衣通常没换下来，我怀疑小孩都吃进不少镉粉。

纸口罩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无法防止氧化镉吸入体内。根据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局，当空气中镉含量超标不足十倍时，雇主要为雇员提供“具高效空气微粒过滤棉的面罩”（a half mask, air purifying equipped with a high-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HEPA) filter)。当空气中镉含量超标25倍时，雇主主要为雇员提供”连接空气净化呼吸器的头罩，或具高效空气微粒过滤棉的头盔” (“a powered air-purifying respirator (PAPR) with a loose-fitting hood or helmet equipped with a HEPA filter”)。⁸但是在超霸厂，空气中镉含量竟然超标35倍，而厂方居然只提供——纸口罩！

据先进厂员工说，国内的管理高层基本上知道镉有毒：2002年4月薛佩琼任职车间主管，到车间里来的时候戴五个口罩，实在很夸张。做了一年以后，因为黄疸性肝炎住院，说这里很毒，后来走了。

“刘新华从90年做厂长，94年去了新厂（超霸厂）。有一次他说：女孩子不要做那么久，做久了没小孩生。那时我听了心里很怕。后来看到厂里有人生小孩，心里才不怕了。”

至于中低层管理，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对镉毒最多只是一知半解，如果是拉长，就完全不知道。所以等到拉长也被检查出超标时，她们的怒火中烧简直是天经地义的。

2004年8月，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节目记者来到超霸公司，拍摄到改造过的车间，采访了超霸负责人。该负责人说：超霸公司“认识到镉的危害也只是这几年的事情，对于今天的后果他们已经尽力在弥补了。而且他们强调，造成今天的后果工人本身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公司已经为他们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工人本身不注意卫生和防护也是导致他们体内镉超标的原因。”

8 <http://www.osha.gov>





感谢细心的记者：“在超霸公司，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培训材料，可我们注意到这些材料的培训内容却都是关于如何避免使镉污染环境，并没有教他们如何做好自身防护的内容，而且这些培训都是在2001年做的，之前并没有组织过培训。”

当记者问及为什么工作了七八年的工人之前未被验出镉超标，“超霸公司负责人说，他们以前体检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传染病，肝炎等疾病上，并没有针对镉超标作过检查”，而具备职业病健康检查资质和能力的惠州疾控中心成立于2002年，因为这个历史原因，超霸公司未能按《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对工人做定期职业病体检。”

节目邀请了中国政法大学学院副教授黎建飞作为嘉宾。黎建飞教授否定了工厂的推托（“过去他们也不了解镉的危害”）：“我们国家的立法对这种有毒有害作业的重视是从建国以后就开始的，镉至少在1981年《化工部关于化工严重有毒有害作业名单》里就已经列出来了，也就是说‘镉中毒’这三个字对我们普通公民来说非常陌生，但对于专业生产厂家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如此来看，厂家就有一些明知故犯的意味了。”

至于说甚么惠州疾控中心2002年才成立，所以无法为工人定期作体检，更不值一驳。成立于1960年的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就不可以检查吗？

除了车间里的镉粉四处飘飞之外，工人们还使用镍、油墨、清洗剂、稀释剂，以及用天拿水擦洗电池上用来封口的沥青，这些材料也有毒性，尤其天拿水是含苯的，毒性特别强，而且每个月都要用很多。江小眉回忆先进厂的工作环境：

1991年5月我开始做拉长。后来又调到装配部做拉长。我什么都做过，四条拉都管过。最早时候，车间里隔一段距





离就有一个大吸尘柜，共四台，头尾各两台。还有小吸尘柜。下班时候要打扫，每人一把扫帚，一扫就很大灰尘（主要是镉的粉尘）。还有用吸尘器吸。吸尘柜会震动，灰尘被吸进去以后，经过震动，变得更大了。我们测过，声音也非常吵，靠近吸尘柜的工人要戴耳塞。吸进去的粉尘正负相碰，会着火，金山在加拿大的厂就曾经着火，还把单转到这里来做。加上吸尘柜用电又大，所以最后都拆掉了。

车间顶上装的是大吊扇，一开，灰尘到处吹起来。

我们用天拿水擦掉从电池的封口冒出来的沥青。一个月要用二十多罐的天拿水（两千斤），很大罐的。厂里每周小搞一次卫生，每月大搞一次，要几小时。厂里搞SS管理以后，就更是这样了。每次搞卫生的时候，就买几百斤的布，也是用天拿水擦洗。天拿水有毒，当时很多人晕倒过。送到医院打吊针，要自己出钱。

后来老板到厂里来，一进车间的门，就受不了。环保部门、卫生部门和厂里内部检测空气中的镉含量，全是超标。

1996年开始，两年体检一次⁹，有照肺积尘，还有乙肝两对半¹⁰。每年都检查出几个大三阳，几十个小小三阳。大三

⁹ 金山后来辩护，两年一度的体检没有验出过镉超标。当然啰，因为这些体检从来没有做过镉的测试，又哪里验得出？

¹⁰ 两对半：检查有无肝炎病毒感染的主要指标。检查项目有五项：表面抗原(HBsAg)，表面抗体(抗-HBs)，E抗原(HBeAg)，E抗体(抗-HBe)，核心抗体(抗-HBc)。其中1、3、5项阳性，俗称大三阳，1、4、5项阳性，俗称小三阳。两者都表示体内带有肝炎（乙肝）病毒，但一般日常工作、生活中接触不太容易导致感染。事实上大小三阳都很普遍，我国肝炎病毒携带者超过1.2亿人。至于是否肝炎，需检测肝功能有无受损。2004年3月东莞市富阳针织厂以“大三阳”为名辞退上百名工人，修改劳动合同以拒付违约赔偿。然而，劳动条件恶劣导致免疫力下降，才是工人易受病毒感染的重要原因，





阳的人就放假。因为听说会传染，厂里就严格起来。98年，有一个四川来的工人肺结核，听说后来得了肺癌，没钱看病，回家去了。

97年，粉房从香港搬来，超霸厂先有，先进厂到了98年才有粉房。

98年以后成立了环保小组，有培训资料，说粉尘有毒，工人要多喝水。但大家都不清楚有什么毒，不知道那么可怕。说培训，其实就是拉长给员工念一段资料。

说到“多喝水”，可能真是有用的。后来出事的那段时间，厂里还特地表扬工人刘××，说她每天喝很多水，所以没超标。刘××是惠州本地的，很爱美，每天喝水，搽洗面奶。但是我们在车间里做，每天都在赶产量，哪有时间多喝水？

据一“业内”人士指出，惠州很多电池厂都像超霸集团一样忽略职业病预防，但是，很多同类厂均是2年换一批员工，用更换率来减少厂内员工的病发率。而超霸集团则相对有些“老实”，所以才被发现有员工中毒现象。¹¹

这段话听起来颇有些冷酷的味道。

总而言之，在偶然的、“上帝的第一推动”以后，超霸镉事件就开始按照自身的牛顿力学定律，在中国社会的地形中向前推进了。

例如该厂大部分工人每月加班竟达180小时左右（《百余员工被炒 是因不称职还是大三阳》，北京青年报2004年4月11日）。对肝炎病毒携带者的歧视，在大陆颇为严重。

11 《超霸集团再有130工人镉中毒 中毒者投诉医院没做镉排除 每天仅输葡萄糖》，《文汇报》，香港新闻A14，2004年7月19日，记者：郑海龙。





粉房里的骚动 (2003年12月—2004年4月底)

但在2003年底至2004年初，超霸厂工人对镉的知识，包括它对身体各方面的影响，大多还知之甚少。随着时间、交流的增加和事件的发展，了解才不断加深。个人的体质有强有弱，工人的受害程度有所不同，对镉毒的严重程度认识也就不同。怀疑自己平日“恶心、头痛、骨痛等症状以及容易流产”是蓄积在体内的镉所致的，起先只是一部分工人。有的工人接触镉的机会不多，工龄不到一年，超标或中毒程度却超过做了十多年的老员工。

此后几个月里，有些工人上网查找镉的资料，还有的工人去买相关书籍，将其中谈到镉的章节复印给别的工人看。不过，交流是不够充分的，带有一定的猜测和摸索性质。最初的时候更不乏混乱、误解、以讹传讹。先进电池厂的员工甚至传言超霸厂因中毒死掉两个人。一位工人讲起当时的一些小故事：

工人的情绪变化很大。一开始大家什么都不懂，以为超标就是中毒，易志雄拿到检查单以后，有工人还说他职业病，从此有工厂照顾，是拿到“铁饭碗”了。

当时还有个传说：接触镉粉尘的人多数生女儿。只有一个姓黄女工生的是男孩。她的工作是送料，接触胶水。还有一个工人生的是男孩，这人刚进厂就结婚，没受粉尘的伤害。所以大家都怕了。来自农村的人还是看重生男孩，有的还迷信。……有个男工很想生个男孩，在医院里他跟我们说：“厂里给我十万八万我都无所谓，只要把镉排掉……”。他怕妻子生不出男孩。很多人听说女友镉超





标，就不要她，也是因为这个……。

工人住院以后，害怕就少了点。因为有个拉长超标了，但生下一个男孩。¹²

有些女工在验出镉超标后，立刻辞职，因为怕男友或老公知道而被抛弃（据说至少有几十名女工这么做）；或者自动放弃了复查的权利。

言归正传。易志雄血镉自检超标之后，这一次，粉房有9名工人决定自费到省职防院做检查，大多是女工。12月22日，她们到了广州，好不容易找到了省职防院。

走到医院二楼的时候，门诊部主任陈朝东凑巧撞见了她们。陈向她们招手：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电池厂的工人，想来这里检查身体。”

陈把她们叫进他的医务室，详细问了一番，说：“真是不巧啊，医院里的机器出故障了，要等新的零件从美国寄过来，才可以给你们做血镉检查。”

工人们面面相觑，很失望，为了体检，她们从白天晚上起就没吃饭，也没吃夜宵，这时都快饿晕了。她们心里虽然有几分不信，但也没奈何，只好自认倒霉地回到惠州。

¹² 工人的这种说法虽然是推测，在科学上却有根据。不过，镉对生育的影响表现在男性方面：男性体内镉含量增高会影响精子的成熟和活动能力，并使含Y型染色体的精子锐减，大大减低生男的机会；而镉对X型染色体的精子影响较少，因此生女孩的机会就相对高。较有名的案例是被称为“女儿村”的英国韦尔斯北部的戴姆维斯小村。生物学家实地考察后证实，村民之所以在几年内生下的全是女儿，是因为饮用了从附近锌矿场中排放的镉所污染了的水源。中国也有同样原因造成的“女儿村”，如福建省清流县的高阪村。





到了晚上交接班的时候，刚进车间，就有工人带着一脸坏笑问她们：“医院里的机器坏了是不是啊？”

她们大吃一惊：“啊？你们怎么会知道？”

“哈哈！你们这么多人请假，厂里难道还猜不出你们去干什么？市防疫站的车都开到厂里来了。你们的车还没开，人家电话可能就已经打过去了……”

这9名工人之中，有好几个后来成了最积极也最坚决的工人代表，负责收集资料，对外联络，跟厂方谈判，打官司……当她们回过头，说起当时发生的事，总是又好气又好笑——“他们拿我们当猴子耍！”¹³

为真相而斗争

不论如何，恐慌仍在蔓延，工人们在同样的环境中工作，许多人有明显的、相似的症状。这种恐慌，随着事件发展和人们对镉及镉中毒知识的了解而加剧了。压制或哄骗都不能消除它。

粉房的工人们集体要求厂方送他们去医院体检。厂方不理不睬，还对易志雄和另一名自费前去体检的男工看不顺眼，加以刁难，威胁要炒掉他们，因为他们不去上班，还多次找厂方要求体检和住院。工厂发出通告：某某因镉超标了一点点，就找厂里麻烦，闹事。如果14天后不上班，就开除……工人到人

13 这几名超霸厂员工不相信机器真坏了：在她们以前，广东省职防院几乎没有做过镉检查项目的，怎么零件就坏了呢。而且她们在厂里一闹，才过8天，医院就前来取尿样检查，并在两三天内出了检查报告。就是说，在她们闹之前，机器忽然坏了，然后工人一旦闹起来，机器就忽然好了，这未免太巧合吧？





事部把通告揭掉，说：要炒我们？可以。不过要先把我们身体里的镉排出去。

更重要的是，厂方的蛮横已经扭不转工人的怠工了——粉房的产量急降，上班的工人们情绪很抵触，最后干脆怠工。大家愁眉苦脸，车间里一整天下来没有人说话。这下子，管理人员急了。

生产部经理亲临粉房，给工人们打气：“活泼点嘛，干嘛这样……”

马上就被工人打断了：“都快死的人了，还活泼什么呀！”粉房不肯干活，装配部和其它车间就得停产。这样，厂方陷入无计可施的境地。为了安抚工人的情绪，到下午，厂里通过市政府找来一个“专家”——前面提过的省职防院门诊部的陈朝东主任——讲解镉知识，并答应体检。专家告诉他们：只要多喝水，多排尿，就可以把镉排出体外。¹⁴

工人将信将疑。不管怎样，怠工终于迫使厂方让步。12月30日¹⁵，厂方通过惠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系了省职防院，安排医生到来，为全体粉房的工人、工程人员以及工龄10年以上的老拉长逐一采血，共计79人。血样带回广州检验。按照工人们后来的说法：厂方之所以只给粉房的员工体检，一来因为他们闹得最凶，二来他们接触的氧化镉粉最多，最危险。

¹⁴ 《百名员工疑镉超标 惠州GP超霸电池厂事件迷雾》。事件中，工厂找过两名医生给工人讲解镉。2003年底到厂讲解的是陈朝东。2004年5月是住院部的陈家斌主任。由于工人分白班夜班，并不是同一车间所有的工人都去听讲解，所以访谈结果有一些出入。工人告诉我们：5月间，“专家”第一天讲解时谈到镉有毒性，会遗传，还播放了光盘。第二天再讲，就改口了，说多喝水多排尿就可以把镉排出体外。

¹⁵ 惠州超霸电池有限公司于2004年5月15日发布的《关于血镉超标报告》提到的检查日期为12月31日。





2004年1月2日，厂方宣布有了检查结果，证实有18个员工血镉超标。由于验出有人血镉超标，厂方不得不在医院建议下送院试排（镉）。“2004年1月5日省职业病防治院建议公司送罗××、夏××、魏××、曾×四人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进行试排。”¹⁶

这4名粉房员工都在厂里做了五六年、超标特别多。

结局几乎是个玩笑。这样的玩笑，在头几个月里超霸厂玩得乐此不疲：才住了一两周，这四名工人就“已排正常”了。半减期长达几十年的镉，就这么容易“已排正常”？

种种可疑迹象使工人怀疑厂方与医院都没有讲真话。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厂方没有把检查单交给工人，只是以一张表格将血检结果打印出来，让工人看。后来，很多粉房工人都认为最早的检查结果是假造的：“假得命都没有！”工人认为，如果厂方不是有鬼，为什么不直接把检查单发给工人？其次，这张表格只说明有少部份工人血镉超标，而后来查出其实所有老员工镉超标，其中一位拉长还发现是中毒。第三，工人不相信厂方安排的体检结果，后来有部份人自费去检查（由于太多工人投诉过省职防院，所以这次医院不敢再阻挠他们自费检查），发现在一两天之内，由厂方组织的血检与自费血检的结果相差极大：以李××为例，2004年5月13日由厂检的血镉为1.9μg/L，但是自费检查的血镉，5月17日和25日都分别高达8.07μg/L和8.7μg/L，相差超过三倍。自然，血镉检查结果比较容易波动，所以从头起就应该检查尿镉并公布结果，但是厂方却没有这样做，令人生疑；而对于血镉检查结果有巨大波动，

16 超霸公司《关于血镉超标报告》。





它又拒绝重新检查以求真相，自然使工人失去了对厂方和医院的信任。

2月24日，粉房工人第二次采血，包括上次检查超标的以及因故未检的员工。化验结果是：一般老员工都出现镉超标。

工人再也无心上班，一再要求住院治疗。厂方的“改善”措施是把镉超标工人调到4楼的组合部，负责包装电池，并且让她们一天只上8小时的班。不要误会，最后这一点并非出于厂方体恤工人，而是针对“闹事份子”的、颇具中国特色的变相“处罚”——超霸厂员工在惠州市“数一数二”的工资待遇，有三分二源于加班收入。没有加班，她们的月收入就仅剩四五百元，而每月的伙食和住宿费又得扣去160多元。

李彤回忆：

老蔡说让我只上八个钟。他这是搞我们超标的。我说蔡先生，我们出门打工，都是为了赚钱，我要上十二个钟的班，我有老有小，才16块9一天哦，上八个钟赚几个钱，除了生活，没有啦。最后我说：上八个钟我不去了，反正厂方也不管，我死就死在厂里。



第三章

超霸厂工人为检查而罢工

粉房工人通过怠工迫使厂方答应了体检要求。厂里不把结果发给工人，只给工人看厂里打印出来的鬼晓得是真是假的检查结果表。鉴于大多数工人的情绪，和个别工人的抗争，厂方同时又不得不安抚和稍作敷衍，于是送个别员工住院。可是在医院根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于是很快又被赶出院，有些还获得“已排正常”的证明。其中一名女工姚××于3月23日出院，虽然此前最后一次尿镉检查仍超标两倍，出院证明却是“经予驱镉治疗，现患者尿镉正常”。¹但是人体根本不可能几周就把镉排掉。

医生根本不把无药驱镉的真实告诉工人。工人总是要施加种种压力才能了解到一点真实情形。医生试过给最初住院的工人打排镉针（依地酸钙钠），结果副作用很大，患者脸上掉皮，更糟的是，肾脏受了损害。医院只好赶紧停药。其实，国家公布的职业性镉中毒诊断标准中已经说明，“依地酸钙钠驱镉效果不显着，不主张使用”。最后，医生只好招认：目前尚无有效的驱镉药物，只能对症支持治疗，就是针对患者出现的

¹ 她带女儿去省职防院自费检查，结果女儿尿镉值达8.2μmol/mol肌酐，按成人的标准算，亦超标1.84倍。由于她的出院证明上有“痊愈”两个字，使她连复查的机会都没有了。后来她将检查报告上报给工厂，厂方理都没理，不但不安排她再检查，还逼她离厂。类似的个案之后还有很多。





诸多症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等于承认什么几个星期可以排镭的诊断是虚妄的。

出院工人争取工伤待遇 (2004年5月)

到4月30日为止，9名工人全部被接出院。

这段时间的冲突，主要发生在住院工人与厂方之间。此外还有17名体检超标工人的罢工。

工厂没有想到，工人在住院中了解到一些职业病及相关法律知识，以及应有权利，并且经常跟厂内一些工人保持联系——这些给他们后来的抗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我那时了解到，如果享受工伤待遇，可以拿到平均工资，还不要伙食费、住宿费，收入比你们（上班工人）还高。²

不过，工人的心态远不是贪得无厌，他们连能否申请职业病诊断、享受工伤待遇都没有把握。她们不过要求检查，治疗，住院期间给点生活费而已。

到了发薪日，他们每人只领到一两百块钱，也就是三四百元的基本工资扣掉住宿费等等之后的余额。谁也想不到厂里这么抠门儿。³拉长曹梦华说：

他们四个住院的人的工资是我到会计部代领的，他们的

2 超霸电池厂员工访谈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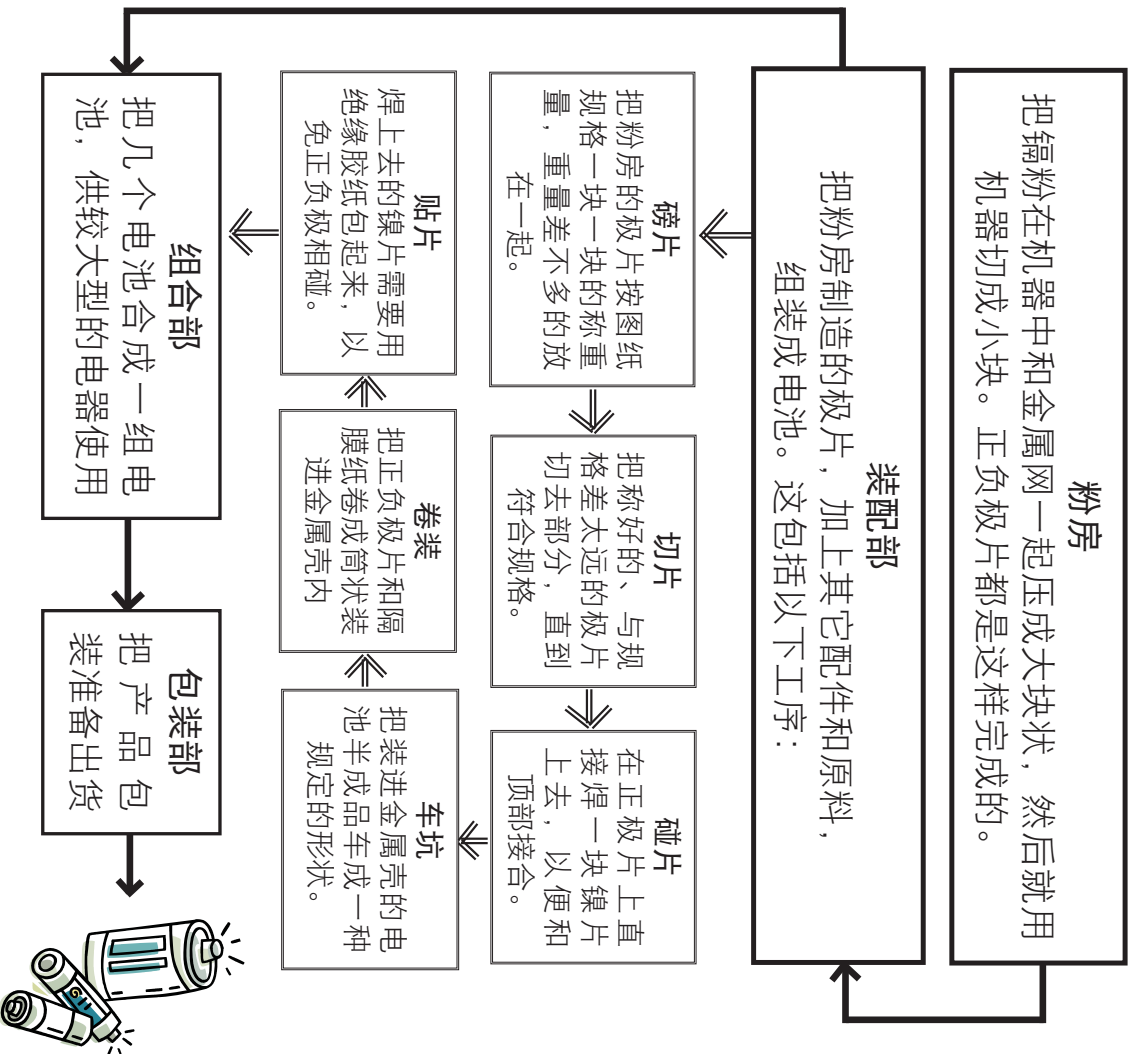
3 他们未经诊断，疑似职业病患者。按中国相关法律，他们的住院期即停工留薪期，工资应按原标准发放，具体说，就是按前12个月的平均收入发放。





工资才100多块钱！我很气愤，跟厂里说：“不是按12个月平均工资发放吗？怎么只有这一点钱？拿一百多块钱人家怎么过！”厂里还要扣45块钱的住宿费，另外要一天出5块钱给医院里的那些护工，也从工资里扣。我对厂里反感最初就是从这开始的。

电池生产程序





住院工人就更气愤了，他们打电话回厂里。刘新华答说：这是劳动法 and 总公司规定的，公司一直都是这样……

4月30日，工厂把他们全部接出院。有三名工人找人事部，要求给他们工伤待遇。

人事部经理陈建芬说：你找到法律条文，我就给你。

工人把法律翻出来：我这是疑似职业病，在没诊断前，就有享受工伤待遇的权利。

陈建芬耍无赖，说：你这拿的是什么书，我们厂都没看到。

工人说：不给的话，后果你自己看。⁴

陈建芬只说了句“公司会负责的”便不理睬，之后再也不见工人。

装配部：暗流涌动 (2004年3—5月)

“李季忠不安地回到厂里，血镉超标的消息震惊了整个粉房，消息很快传到了另一个接触镉粉的装配部。工人们顿时炸开了锅，七嘴八舌说起自己身上诸多不明原因的病症，包括腰背痛、头晕以及全身疼痛。‘我们想自己肯定也中毒了。’装配部女工王雅平说。”⁵

4 之所以这样“对话”，按工人自己的说法：因为写材料递交给厂方全无作用，根本不会理你，只好“来狠的”。2004年上半年，工人一般都找生产部经理刘新华和人事部经理陈建芬提要求，前者才是“说话算数”的，香港派过来的厂长谢启将需要依靠他，但刘的态度同样极恶劣，女工形容他“像土匪”，但刘也经常回避工人。

5 《百名员工疑镉超标 惠州GP超霸电池厂事件迷雾》2004年7月18日，中国经营报（田彦红 张鹏）





装配部在三楼，是超霸厂最大的部门，有500多名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女工。相应的，这里怀孕的女工也较多。

装配部的任务是把粉房压出的电极片继续加工成整粒镍镉电池。工人也要接触氧化镉，尤其是从磅片、贴片到卷装等前道工序特别脏。

工人中间有很多人本来就身体不舒服，头晕、头痛、浑身无力，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自己也“镉中毒”。装配部陆陆续续有人踏上了粉房工人走过的路：到省职防院自费体检。拉长不肯让她们请假，她们就在轮到上夜班时，白天偷偷去广州。自检镉超标的工人——后来，自然而然地，她们常常是几个、十几个人一起找厂方——拿着省职防院的结果找工厂管理层，可笑的是，厂方反过来要求那些工人不要声张，以免“影响不好”，甚至指责工人“传播谣言”。

工厂管理层的蛮横态度在事件中起到了激化工人情绪的作用。他们的“格言”多如牛毛，可圈可点：

“你自己检查，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请别人代着检查的！”

“你们要是信任工厂，我们就有得谈；要是不信任我们，就不用谈了。”

“你接触了镉，可能会得癌症；你不接触镉，也可能会得癌症，我们不可能包你7年20年内不得癌症。”

“你告吧，告到哪里我们堵到哪里！”

“你们现在走黑白两道都没用！”

同时有很多人辞职，到了5月间，装配部辞工的人数已达到三分之一，因为一方面厂方非常强硬，拒绝认真保障工人健康，而工人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做下去又怕受害更深；另一方





面，由于工人还没有团结起来，对于集体奋斗没有信心。

金山集团的高层事后对此应该深感庆幸才是：如果不是那么多工人辞工，那么几间工厂最后被诊断为镉观察对象、中毒的人数可能不只400多名。

管理层与拉长：从合作到对抗

超霸电池厂有不同的生产线，被称为“拉”，每条拉的主管叫拉长，通常由普通工人提拔。拉长的助手叫助拉，而他们上面则是主拉。在工厂体制中，拉长作为基层管理的地位和角色，虽然一样被剥削，但也直接地控制普通工人，协助老板从他们身上榨取大量的劳动。这类类似于警察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有些拉长比上面的管理还可恶！”这并不奇怪，因为工人是被剥夺了权利的“弱势群体”，拉长则应当对“上面”——也就是强者——负责，否则随时可能重新沦为普通工人。这是可怕的地位下降。大部分拉长是从工人做起的，好不容易才升为拉长。不管主拉还是助拉，跟工人一样是“拿日薪的”。虽然拉长工资不高，但是比普通工人高，此外还有较高的岗位津贴和伙食补贴。而主拉的工资更比普通工高出一千多元。

对待工人“像土匪”的生产部经理刘新华，在超霸厂是“说话算数的人”，即是说：有能力，也有权力。装配部经理蔡春桥、人事部经理陈建芬等高层管理虽然未必有权去“解决问题”，但从头到尾一直积极地参与对工人的压制。当然，就他们的位置来说，这是“份内的事”，只不过“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以蔡春桥为例：





“老蔡对每个员工都很好，说话很谦和，有什么事叫他帮忙他都会帮，比如老乡要进厂什么的。但他对拉长就不行，卡得很严，逼他们要员工做到产量。拉长是不能对员工好的。总之，好人他来做，拉长自己不能做好人。”

程湘说：

科文老曾对我们拉长管得很严，要我们在晚班时管住工人不可离岗吃夜消，结果拉长和工人都要在车间吃饭。老曾比老蔡可恶。老蔡还以身作则，遵守厂规，老曾却认为厂规只用来管工人，对自己不顶用。所以他在晚班时常常五六个钟头不进车间，去和修机的聊天，或者躲在办公室。

在镉毒事件的开始阶段，大部份拉长仍然是帮助管理层卡压工人。随着事件的发展，拉长们才从压制工人、观望、一步步转到工人一边，甚至成为罢工的领头人和指挥，因为她们也是受害者，并且受到厂方更多的利用和愚弄。然而在事件之初，2003年12月30日和2004年2月24日厂里安排体检时，还是包括了部分工龄较长的拉长。表面上，这是对拉长的优待，事实上当然是设法稳住人心。拉长刘青秀说：

去年厂里出事的那段日子，起先很多拉长都在观望。经理把拉长叫去开会，要我们跟员工说“多喝水，多排尿就可以把镉排出去”。有些拉长按管理层的意思压制工人，叫他们不要“造谣”，但很多拉长也担心自己的身体，从工人那里打听消息。

有一件事当时引起了拉长们的反感。那次蔡主管把我们所有的拉长召去开会。在会上，他说，几个94年开厂时候就进厂的拉长都检查过了，没有超标，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助拉要协助主拉做好工作，等等。

他这样说真正是弄巧成拙。其它拉长都很气愤：原来你偷偷给几个主拉做检查，就是不给我们体检！

其实，后来我们解除合同，拿了补偿金以后，几个主拉才去检查，结果全都超标了。我们这第一批打官司的员工代表中，有很多都是拉长，第二批就只有两个拉长。⁶

另一位拉长曹梦华回忆：

五月份，三楼装配部罢工。我们在粉房做的就是所谓没超标的工人，大家的心态就是“不相信，但是没办法”。生产不是很正常。老员工走掉的比较多，剩下的有点怠工，不像以前那样尽心尽力地做，包括我自己都是这样。以前我管得很严，这以后我就不想管了。反正能够保证三楼有得生产就可以了，要积很多料（半成品）是不可能的。

据说厂部的管理人员中也有比较正派的人，后来事情闹大以后，在私下议论中有人还提到应该专门开一条生产线让超标的工人去做，也不规定产量，云云。

最先的时候，人事部有一个萧凤兰，是香港人，要好一些。看到厂里工人这样，他也是很气愤的，骂那些管理人员没管好。但他肯定要给他们护短嘛。后来事情弄大了，就不再理。

17人的罢工

所谓17个人，都是5月初自检超标的工人，前后罢工了两个星期的工。其中有两名是粉房员工，其余都是三楼装配部工





人。刘右君是核心人物。另一个是程湘。程湘回忆道：

我拿到结果以后，找到蔡主管那里。老蔡那时压我们，叫我们不要出声。他说：给你调个工位吧，不然去打杂啦。后来又觉得我去打杂不太好，走来走去，还是叫我去做员工吧。

于是把我调到二楼组合部去，还有几个超标员工也都调到那里。

老大好像要逼着我们走（辞职），让我们一天干8个小时，不准加班。没有加班，员工就只能领到四五百块钱。员工就非要加班不可。我被调下去以后，老蔡说，对拉长优惠点，她要加几个钟就加几个钟。但他通过拉长拼命催我产量，我就到办公室拍老蔡桌子。我说我进厂才做了半年员工，然后就做了七八年拉长，现在要我做到产量，哪里做得到？我患了职业病还要做到产量（指标）？按照职业病防治法，你不能降低我的待遇。我还把条款讲出来。

他说：拉长追你产量？我下去骂她。下次你喜欢做多少做多少，喜欢做多久就多久，不喜欢做就下班。

我说：你说这话倒还差不多。

那时我说不加班钱太少了，就加两个小时吧。员工就跟着我加班。老蔡就来说：没叫你们加班你们加什么班啊？员工说：拉长能加班我们就不能加班吗？

到二楼去的时候，不但确实降低了我们的待遇，而且在许多方面他们管理得也不好，很多员工有意见。我们超标的人有机会接触，商量一下对策：这样做也不是办法，钱又少，还是要求给我们复查吧。后来我就想：算了，还是带着一起闹吧。





他们如果对我们仁慈一点，我们可能还不会那么闹。⁷

郑春红回忆道：

我们这帮人跟阿梅的老公一起商量，天天到他们住的地方去。刘右君和他到网上找那些资料。后来就拿了资料到卫生局，到信访办，一个一个部门地跑，要他们帮我们解决问题。厂方找人跟我们“商谈商谈”，那些人都是为厂方说话的。厂方老是拖拖拉拉，老是欺骗我们，我们就冲到办公室去闹。厂里的保安拦在那里不让我们进。我们不敢硬冲上去。后来另外有一个员工，很厉害的人，他跟厂里的领导有点关系，也想检查，那些保安不敢对他怎么样。我们看到他上楼去，就跟着他马上冲上去。当时厂里那个刘新华在粉房，看到我们在保安室想冲上楼，他马上就躲起来。

其它工人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超标，就没有罢工。

厂里一天推一天，我们查到香港金山集团的传真号，把我们的资料和签名传过去。香港反映到这边来，部门经理就跟我们说，你们十七个人闹得这么大，闹什么闹！还说等事情平静下来，就把我们这十七个人先砍掉。

我说，不用你砍，我们根本就不想再呆在你这厂里了！

这十七个人中间最积极的是刘右君，他为大家做了很多事。2004年5月，他做了工人代表。我们活动的地方是对着超霸厂门口的一户人家的大院子，那是一个工人的住处。每天，工人下班后，就不约而同地到这里集中，交流。要活动就要有经费，当时刘右君就动员工人每人交50元钱，用作经费。





后来自费查出超标的人越来越多。通过刘右君的动员，他们主动到大院里来，一起开会，讨论怎样向厂方要求复查。后来集资人数达到几十人，数额也达到几千元。在他帶領下，我们去市政府及各部门都上访过。接着，厂里说他和另外两个人出院带坏了大家，就又把他们放进了医院。他在医院跟医生说起那些症状（跟镉感染有关的），说得那么流利，那些医院里的人说：“你投错行了，你这么厉害的人，嘴巴又那么会说。”他为我们搞得这么好，什么都为我们争取到，没他的话，我们不可能住进医院。在厂方安排的检查中他没有超标，后来我们住院的人每个集资十块钱让他去自检，也不超标，那我们就没办法了。如果他验出来超标的话，搞起来啊……⁸

省妇联的介入 (2004年5月21日)

超霸厂一直拒绝把那17个工人再送院作详细检查和治疗，所以要它安排全体装配部工人接受镉的检查，就更不容易了。但为甚么在5月24日它忽然安排全体装配部工人采血检查呢？这首先可能因为这个时候忽然有外力介入：省妇联在5月21日忽然带着专家来超霸厂。而省妇联是如何得知这件事的呢？

一位男工阿辉说：

当时厂里压我们。李丹干着急：怎么办怎么办？我说：怎么办？你住院时省妇联找过你。你是如女，还问我们怎么





办？她就给省妇联打电话。第二天，妇联开了几部车到厂里。厂方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很紧张，赶紧通知我们收拾东西，回广州住院。⁹

据一位超霸工人说：来的是省妇联的黄部长；她们来厂里的时候，还带了小金口镇的妇联及其它官员，所以开了几部车。可谓兴师动众，声势不小。

省妇联带来什么呢？它带了“专家”——“对工人很残忍”的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部主任陈家斌——来做“培训”工作”，讲解“镉中毒的预防知识”。李彤回忆：

他们说是专家，放了碟给大家看。每条拉叫几个代表去听，再上来跟员工讲。老蔡要把我拉到前面坐在那里。我说“去就去，我怕什么”。陈家斌讲的我去听了，说编对人体没有多大危害，没事的，只要多喝水，多拉尿，就可以把镉排出体外，也不会影响到下一代。最后一次我不听，跑了，我说你这是骗我们的，还说你们是专家，专个屁呀。他哪里是什么专家！我去省职防院检查的时候看见过他，是主任，不是专家。我们老大（拉长程思琼）就说：你管他那么多干嘛，你不要吭声好不好。

我事先早就知道镉是怎么回事，跟别的工人说了。他当我们不知道！

省妇联的黄部长跟我们讲话，说防护措施要搞好啦，还说你们厂对你们这么好……我去找她，把自检的结果拿给她看，她说“你是超了”。我又拿用过的脏得要死的口罩给黄





部长看，我说黄部长，这样的口罩能挡得住什么，多臭啊，几天才给我们换一个。这黄部长就说，这个太脏了，又说了些安慰我们的话。她们进去开会的时候，有厂长、经理、人事部的、我们的主管、小金口妇联，我们员工还有十多个，在会议室开了一下午的会，开到晚上6点多。¹⁰

妇联来过之后，工厂答应把出院回厂的几名工人再送回省职防院，还答应尽快给全体装配部工人做血镉检查。5月23日，工厂宣布停产镍镉电池。5月24日超霸厂安排装配部540名工人采血检查。这大概是省妇联为超霸工人带来的幸运果。

省妇联给超霸厂带来了一场虚惊，毕竟那是个省级单位。有个工人说：“厂方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很紧张。换作现在，他们就不怕。后来，惠州市插手，省妇联就让开了。”

“你不要骗小孩！”

——装配部工人为取得检查结果而罢工

5月27日，超霸以厂长谢启将的名义致信给住院员工，强调“血镉超标不可怕，在医学发达的今日，此病可治！”

检查是检查了，但厂方一直不公布检查结果。工人去问，得到的回答是：医院的检查结果还没出来。有女工去问省职防院的陈家斌主任。陈说：“早就被你们厂胖胖的那个人拿走了。”工人这才知道工厂把检查结果扣压住了。于是，仅仅为求结果和取得检查原件，工人再次被迫罢工。程湘回忆道：





我和谭一清一起到人事部去，路上碰到陈建芬。她对我们说：“检查结果？要找陈朝东主任，他出差了。”

我说：“怎么会因为一个人出差，就把这么大的事耽误了。你不要骗小孩！”

陈建芬说：“厂里还没把结果拿回来，不然怎么会不跟你们讲呢？……”

黄才艾说：“我前天也打了电话去省职防院，说结果早就拿回来了。”

陈建芬还没回答完。正巧刘新华看见我们，就叫：“你们班不上，在这里吵吵闹闹干什么？”

我们说：“医院说检查结果早就拿回来了，为什么不给我们？”

刘说，哦是吗，那他打电话去职防院问问。又说，人事部不要插手，你们到生产部来。陈建芬就趁机溜走了。我们到了刘新华的办公室。他跟老蔡一起开导我们：“你们还是听话的好。想想，说句不好听的话，我现在就炒掉你们，你们打工的又能怎样？”

刘新华跟我们讲他老妈以前腿摔断，送了医院，但是没钱治，结果给医院拖延到死掉，去告也告不成。他讲这个社会多黑暗，工人是不可能斗得过厂方的，劝我们事情就这样算了。

我当时说，就凭你这句话，我们现在就下班，不上班了。然后我们回到车间，告诉工人厂方扣压检查报告。第二天，很多工人冲到老蔡的办公室要报告。

有少数桀骜不驯的工人开始更主动和放胆地劝止别的还在继续工作的工人。





厂里不给我们看检查结果，又不给我们治病，我们干嘛还要做？！抱着这样的心情，一些工人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接着，更多的工人停下来。大家自然而然就罢工了。

6月9日到11日，装配部500多名员工就这样“自然而然”罢工了三天。她们打卡，上拉，但不再干活，光是坐着不动。女工倒并不十分担心自己的安全，因为这次的停工是大家的共同行动。最后工厂只好让步。郑春红说：

回到厂里，我们领到的是一张小纸条，跟先进厂那边一个样子的。我们说：结果单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原件。厂里说：原件还没有到。

厂方发给工人每人一张像工资条那样的小纸条，上面写着各人的姓名、工号和血检指标。检验结果显示：540名工人中，有121名血镉超标。老员工几乎都超标了，其中有两名员工分别已怀孕了7个月和3个月。

列入超标名单的都哭了，厂里车间里，哭声一片。那些平时工作最卖力的员工，超标也最多。工人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是啊，谁能想到，多年来的辛劳换来的竟然是一个下场！

没超标的工人则暗自庆幸，甚至“高兴得要命”。

但事情还没完。“高兴”很快变成了怀疑：“5月24日，厂里（安排广州的医院）在装配部采血。第二天，陈金凤再到惠州防疫站检查。这次也出现了两个结果：厂里的采血验血结果为1.5微克/升，而惠州自检结果为8.7微克/升。过后，他们去问惠州防疫站，防疫站说那天机器坏了，以广州的为





准。”¹¹

基于对厂方所公布的数字的怀疑，不少人又自费去检查，结果仍然与工厂组织的检查结果不同。但厂方只管要无赖，就是不认可工人自费检查的结果，即使是同一家医院出具的检查结果。又说：“你们要是信任工厂，我们就有得谈；要是不信任我们，就不用谈了。”

工人答道：我们检查了这么多次，自费检查与厂里检查的差别太大，我们怎么去信任厂里？

工人不相信厂方所发的小纸条，强烈要求厂方把医院正式的检查结果发给她们：凭什么相信厂方自己打印的这张莫明其妙的小条子呢？！郑春红说：

等到厂里一检查出来很多人超，他们才跟着罢工。那么多人超标啊，个个都不干了，跑出来了。当时在车间、办公室里哭得呜呜响。那时我还感觉很坚强，也不哭，只知道去闹，要他们解决问题。我自己一早检查过，那痛苦已经过了，而且要我是住在家里（户口就在本地，不像外省来的工人那样孤身一人），当然要忍（忍住不透露病情），肯定不会让所有家人知道。我只告诉他（丈夫）我超了，不吭声也不流泪，不愿小孩子和家人看到。我小孩还天真地说：唉哟，那么多人中毒超标，好在我们两姐弟那么早就出来（出生）了。

厂里答应过几天发结果单给我们，同时要大家上班。我们上班了，坐在车间里，爱做不做，跟罢工一样，也没有产量，整天喝水，到阳台那里遛达，管他一个小时要600产

¹¹ 《百名员工疑镉超标 惠州GP超霸电池厂事件迷雾》2004年7月18日，中国经营报（田彦红 张鹏）





量。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主管就说，按你的产量定额算工资。也就是说我们做多少产量，就按定额折算成多少小时的工资。

工人不管他：你要这样算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就要你把结果单拿出来，还要送我们去治病，不管它工资多少，我们不在乎。

主管把员工一个一个叫到阳台上去问：人家个个都做得到产量，为什么你做不到！工人怕事的，就威胁他。碰到不怕事的工人，就说不过了。“你不是叫我们多喝水吗？那我们就拼命喝水喽，多喝水肯定就多上厕所，怎么做得到产量呢？”我就这样回答他。

那个姓罗的管理人员说：“你们这样子啊？你们哪里闹得起来？以后一分钱工资都搞不到。”我说：不管它，就闹到搞不到为止。

被列为“超标”者的情绪已难于控制。她们要求住院，要求给她们治疗、排镉。厂方则宣布：是否镉超标要以尿镉为准，血镉不能算数。工人于是要求全体检查尿镉。6月14日，工厂在罢工压力下让步，但也只安排121个血镉超标的员工留尿检查。

为了防止已经自费检查过的工人前来“闹事”，工厂在6月17日贴出通告：不准员工个人去医院检查；不再承认员工的自检结果。此外，厂方仍然只肯答应“每次送5个工人去住院”，如若不然，会“耽误工作，耽误产量”！。

工人当然不同意。女工继续派出代表不停地到市政府上访。而在同一时期，惠州老厂（先进电池厂）工人从14日开始





罢工，要求体检。看到事态日益严重，政府终于出面介入，并允诺送超霸厂所有尿镉超标的员工住院。程湘回忆说：

那天老蔡突然找我，让我们去见副市长许光。我说：啊？能见到副市长！

我们坐厂车到市劳动局，路上，刘新华跟我们说：许光是湖北人，原来是德赛的老总，调到市政府，后来升到市长。在仲裁庭，我们看到政府各个部门的大官都来了。许光给我们介绍：这个是劳动局的局长，这个是卫生局的……他说我们的检查结果在他手上，说他很同情我们的遭遇，政府正在按这些名单安排让我们住院。

许光去慰问住院员工，跟我们说安心治疗啦，问我们伙食好不好。我们说马虎虎。他说伙食不好就提出来。后来我们还真的因为伙食不好闹起来。……

尿镉检查的结果，有106人超标。¹²值得注意的是，这121人14日尿检，18日得知结果，只花了4天时间而已。而此前和此后的多次检查，工人总是要等上几周，要不停催促甚至发动罢工，厂方才让工人知道结果。

装配部的罢工，又带动粉房工人再次为求检查而起来斗争：

六月份，装配部的人下来体检的时候，我们粉房的全部工人也要求检查尿镉（5月份检查的是血镉，没超的人到6月份就没资格检查尿镉）。但是人事部经理陈建芬说：你们血镉都没超，检查什么尿镉！

我们很火，粉房的人就全部围了过去跟她吵。

12 其它多篇报导称尿镉超标人数115名，应是包括了此前验出超标的人数。





粉房也罢工，但没有罢多久，因为上面答应检查了，只是没定下日期。8月14日，等其它全部都检查完尿镉，我们才检查。¹³

后来的尿镉检查结果同样是疑云重重。

早在5月13日，医院和厂方安排的尿镉检查的结果就很有问题。当时厂里安排4人到惠州市卫生局防疫站复查，陈金凤检查尿镉完后，第二天和丈夫去广州再做检查。两个结果一对照：惠州防疫站出具结果为1.9微克 / 升，广州的则为8.07微克 / 升。¹⁴

工人自己说道：

我们在同一家医院化验的结果尿镉很高，而厂方给我们的化验结果就很低。医生说是检验器材出了故障。有时则说“检查结果会有波动”。问题是，为什么波动的结果总是一面倒，倒向偏低，倒向有利于厂方。我们就不相信厂方。报纸也登出来厂里检查的结果是假的。……广州有一家十二医院（也是市职业病防治医院），我们去检查，结果超了。我们怀疑厂方与广东省职防院医生勾结。我们拿了十二医院的化验报告回厂里，证明了厂里的结果是假的，引起厂里的轰动，就出现了罢工。¹⁵

-
- 13 超霸厂工人访谈记录
 - 14 《百名员工疑镉超标 惠州GP超霸电池厂事件迷雾》，2004年7月18日，中国经营报（田彦红 张鹏）
 - 15 对超霸住院工人的访谈记录





■ 第四章 ■

先进厂工人罢工

超霸厂的镉风波从2004年2月份开始就把先进厂的员工卷进去了。消息的传送是通过两厂的老乡。

小金口的超霸厂是新厂，有很多员工是从我们老厂（先进）过去的，所以两个厂的员工很多都有联系。因为超霸那边偏僻，员工不愿意过去，厂里给的工资就比较高。3月份的时候，超霸的人说车间有毒，当时就走了很多人。老厂员工就有人知道。4月份的时候厂里找拉长开会，要她们留意员工的动静。¹

5月份，也是粉房员工先体检，是粉房的头头给他们闹的，结果90%以上都是“正常”，没有超标。有没搞鬼都不知道。超标的马上就走了，个个都说怕，说报纸上讲：日本有人锅中毒死了，埋在土里，长出的草牛吃了也会超标，人吃了牛肉，一样又超。所以就怕了。有的接近超标的也辞工走了。²

5月23日，超霸厂停止生产镍镉电池，将之转到先进厂去做。5月间，有多名工人自费到广州体检，有人检查出超标。当更多的工人前去省职防院，超霸厂的“镉风波”已经把医院

-
- 1 先进电池厂员工访谈记录
 - 2 先进电池厂员工访谈记录





和医生变成了惊弓之鸟，就不肯再为工人做自费的镉检查。

3月份我们听说超霸厂里的事，那时是半信半疑的。超霸厂粉房的人检查出来都是超标的，我们就更加怀疑这个问题了。到晚上（星期六、星期天）我们上夜班，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跟拉长说：两三年没有加工资了，我们这工资没有达到劳动法的规定。那时候我们才三百多，要加到四百嘛³。厂里说：工资没得加，你们做就做，不做就算了。我们还说：那个纸口罩，挡口水都挡不住。我们要有防护罩的那种。那天晚上他们叫我们开工，我们没开工。我们在车间讨论这些事，最后结果，第一，要求加工资；第二，要求检查。厂里没有答应给我们加工资，只答应给我们做职业病检查。

促成先进厂工人罢工的原因，并不只是为了要求体检，而且首先要求的是加工资，至少是加到法定最低工资的水平（超霸厂一直违反法律，没有给工人最低工资。关于这点，下一章再谈）。她们也要求体检和分发劳动保护用品，但是这些要求是列在工资之后的。可见提高工资待遇的斗争在工人心目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而超霸厂工人也是这样。此外，对工厂管理压迫的怨恨，也激发了工人的抗争。

另一位先进厂员工谈到：

6月份，工人提出要体检。厂方从做了十年以上的员工里抽出五六人，说如果检查结果不超就说明其它人都不超。工人意见很大。……那时，康浩章⁴到厂里来看过。有工人担心镉感染会遗传，他回答说：对子女没影响。据说他回香

3 先进电池厂员工访谈记录。400元是惠州市当时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4 康浩章，香港派来先进厂的经理。2004年9月份曾代行超霸厂的经理之职。





港的时候，告诉许永新说：先进厂没有闹，很平静。到了第二天，先进厂就罢工了。⁵

6月11日发工资。工人中间颇有不满，“因为有些人有加工资，有些人没加”。更确切地说：大部分工人都没加工资。许多人工作五六年下来都没加过一毛钱工资，到离开厂的时候，每日底薪仍然是16.5元。5月间工人向厂方提出加工资的要求，被一口回绝。厂长徐万杰拍台：“想加工资？免谈！”⁶这样，工人便开始酝酿罢工了。

发工资是星期五，本来说好了第二天一起罢工。但是一部分工人反对：

礼拜六礼拜天不要罢工，假如没钱，划不来。所以到礼拜一晚上（14号）才开始罢工。二拉先罢工，她们拿到工资单就说很不公平，拉长有偏袒，加了那些跟拉长好的。一拉就和二拉一起罢工了。⁷

江小眉说：

我们拉上每个星期开早会，就是上班前开会，讲产量和质量问题。那天晚上，开会回来，看到二拉根本没做，然后一拉跟着二拉一起不做。三拉刚好在转料（做完一种产品，收拾机台，换另一种型号的产品做），别的人就以为三拉的人也不做了。就这样，全车间近五百人都不做了，罢工了。

工人商量好罢工，主管来说服工人上班，三条拉的工人都被说通了。第二天上午，他们都上班了。（再罢工的）事

5 先进厂工人访谈记录

6 有员工说：真正讲这句话的，是人事部经理叶广添。

7 先进厂工人访谈记录





情出在二拉。中午，有一个小时休息，我吃过饭躺在纸板上睡觉。醒过来的时候，看到他们都罢工了。原来二拉的工人不想做，早上又互相串联好，把另外三条拉的人又带动起来了。二拉的工人很不满她们的拉长陈晓燕。他们说：“你们那么积极有什么用，这又不是你的钱。”

我那条拉上的员工很听我的，别的拉上都罢工了，她们不知道怎么办好。我跟她们说：不要跟我啊，你们跟大家。（这话是向工人暗示要跟随其它拉工人行动）

工人心很齐，说打卡就一起去打卡，打完卡，说回宿舍，就一起回去。

超霸厂罢工，（大老板）许永新马上到。先进厂罢工了很久，许永新才到。可能厂里把事情瞒着。他到厂里的时候，被员工围起来。那时很多工人的老公都到厂里来，把厂门堵住了，喊“还我老婆健康！”。那许永新躲在楼上办公室，根本不跟我们说话，也没给我们解决问题。⁸

管理层慌了手脚，开始恩威并施。有拉长（方丽珍）去逼迫那些胆小的员工：“你做不做！你做不做！”但是对于胆大的工人，却完全是另一副脸孔：

主管老是来劝：你们做啦，做啦，求你们啦，你们带个头啦。

我们拉上的人就说：我一个人带不起来啊，你叫她们做，我们就做喽。全部人叫了做我就做，她们不做我也不做。

杨小丽（拉长）还去宿舍叫：你们戴手指套去工作啦，





你们戴啦。我们也不理她。她对着我叫：你听到没有啊？我说：我听到啦！

就这样，没人回去上班。

罢工从6月14日（星期一）持续到18日。“厂方发出通知，指工人罢工是违法行为，会追究刑事责任，并向工人发出八十元表现奖作为安抚，罢工行动在三日后结束。”⁹。不过，“表现奖”本来就是工资项目之一，平均在50元左右，所以“发出八十元表现奖”确切的意思就是“加发30元表现奖”。

罢工迫使厂方答应工人的体检要求，6月21日，厂里组织装配部约480名工人抽血。

“她们比我们还要猛！” ——从罢工到堵路

一名先进厂工人感慨地说：“如果我们厂工人能够齐心，就不会被赶出来，现在肯定还会在厂里上班、拿工资。”同样，超霸厂和先进厂工人没能尽早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也是一个遗憾，虽然超霸厂工人有过这样的打算：

在惠州市中心医院住院的时候，我们常跟住在中医院的工友约好，绕着西湖，各走一半的路，在一个地方碰头商量事情。我们手头有资料，关于镉啊职业病啊那些资料。有人提议，把这些资料复印了拿到先进厂的门口去发。还没实行，就有16个人被弄出院了……7月12日，我和另外3个人

⁹ 《惠州又一电池厂 130人镉中毒 同属港上市公司金山工业》，苹果日报，港闻A12，2004年7月19日。





被转到广州，住进省职防院，就更难联络先进的工人了。听说先进厂的人去堵路，闹得比我们还凶。

体检结果出来也不发给先进厂工人。工人就去上访。后来厂里才发了指头宽的小纸条，夜班先发，工人看到发的是这个，都不干，说：“你们的报告就是这样一张小纸条啊？”

为了拿到医院出具的正规的体检结果，6月29日，先进厂工人发起第二次罢工。

6月中发生在超霸厂装配部的戏，在先进厂又重演。为什么厂方不肯发正式的检查结果给工人？显然是因为检查结果很不妙。

我们说这结果是假的。厂长说：不是假的，有底案在那里。我们要求原件。他说：原件存入档案，厂里留底，你们只能复印，原件绝对不给你们。

我们都不相信，去找他。那厂长叫我，神秘秘的样子：你过来看，这是你的不是？他给我看厂里打的表格（意思是：表上的数字跟发给你的小纸条上的结果不是一样的吗？）。

我说：这为什么不能公开啊？

他说：让很多人知道谁谁谁有病就不好了。他说的样子好像我们是传染病一样。

工人普遍相信，这些检查结果是造假。“如果不是假，为什么不把原件给我们？那不是更简单吗？”这种怀疑合情合理。从检查结果之破绽百出来看，更使工人无法相信厂方。而据先进厂的江小眉说，后来有办公室人员碰到她说：你们的结果都是假的，是我们编出来的。





后来金山集团发表声明否认工人指控，说“不可能存在任何隐瞒事件的情况”。

厂方一直把工人当作不开窍的傻子来糊弄，直到跌了许多跤，才学得聪明一点点。管理层非常明白地意识到政府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于是更不把工人当回事。很可能，惠州市政府之介入超霸厂，不是使工厂管理层（包括金山集团高层）感到事情闹大了，相反，觉得更安全，更无后顾之忧了。

我们拿到这张纸条，都不知道是什么。问厂方，他们说：这是血镬。我是190，太高了。有人还达到300多。之前厂里贴出过通告，44.5以上算超标。我当时看了这张条子，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我们不服，就继续闹。厂方就给我们发了一张医院的检查单，但是没盖章的。我们又闹，后再再给我们一张盖了章的。

厂方的拙劣手段连累到了省职防院。这次发下来的结果，仍然是复印件，但盖了医院公章。也许因为赶得太急，差错不少：

编号都不对，医生签名写错，日期也错：9号留尿样，8号出结果。这个是怪不得员工们怀疑。

工人怀疑，发到装配部工人手上的、医院出具的“原件”可能是假的，第一次血镬检查结果真正的原件还收藏在工厂人事部那里。在中国国情下，工人要获得真相当然是不可能的。

至于这次被工厂定为血镬超标的员工，总数有130名。

拿到这张结果单之后，按厂方自己的霸王规定（即血镬超标才可以检查尿镬），就该安排检查尿镬了。然而厂方却在不断拖延。于是工人发起罢工，但是厂方不理。7月2日早晨，对工厂的敷衍塞责忍无可忍之后，部分工人自发前去堵路。





早上七点多钟，正是上班时间，交通繁忙的时候。工人一个跟着一个，陆陆续续往马路上走。去拦路的绝大部分是外省人，据估计才100人左右。厂方发现工人去堵路，赶紧把大门一锁，车间里的和宿舍里的人统统不让出来。因为人少，她们在马路中央手拉着手，站了两行。厂方还派了两个管理层去登记堵路员工的名字，以此威吓她们。参加堵路的人少，不只是因为厂方把大门锁上了，还因为其它工人表现得非常落后：“好多员工站在路边上看热闹，还笑话我们，把我们气死了。有人说让她们去争，争到了也有我们一份。”路堵了不到半个钟头。交警最先赶到。接着是麦地派出所的前来赶她们，叫了便衣——身上挂着工作证，有工人说，那是麦地派出所请的外面的杂痞¹⁰——抓人，“还打了杨××，把她抓到派出所关了几个小时，后来送进医院，就赔了她一点医药费。”

堵路不够成功，因为事先没有商量好：

我们堵路是临时临急的，想搞到多一些人知道，引起市政府注意。如果说早搞好的话，就不会成这样子。

虽然没有周密策划过，但堵路终究比罢工更有效：拿到“正规的检查单”之外，还安排血镉超标者当天留尿检查，官员答应送尿镉连续两次超标工人分批住院治疗。政府怕罢工，更怕示威游行和堵路，它会把工厂里的冤屈和愤怒传播到社会上去，得到“舆论”的了解、同情和支持。

那天上午市里的人就来了。在车间里开员工问答大会。副市长，劳动局的，卫生局的，还有公安局的，全是科长级以上的人物，都来了。场面很轰动。员工拿凳子坐在车间里。

¹⁰ 这也可能是当地的治安联防队员。





后来又开过几次问答大会。那个卫生局的每次都在。还有那个劳动局局长，除了法律，多一句话他都不会跟你讲。来来去去就是“证据给我啊，我就给你办”。还要我们拿出法律，第几条第几条，拿不出就不用跟他说。

他们叫了专家来给我们讲镉的知识，说外面的人也有镉超标的，海鲜吃得多了，烟抽得多，也会镉超标。专家还说，体内的镉可以怎么怎么排，很容易排的，不要怕。就这样安慰我们。

还有工人气愤地说：

他们说话屁用啊！他们都跟厂里说话，哪跟我们说话。我们跟他说什么都没用。他们就答应给我们检查身体喽，去广州职业病医院检查。还有“一年检一次”喽。

诚然，政府和工厂都远没有答应工人的所有合理要求。工人取得的“胜利”是很有限的。除了拿到“正规的检查单”之外，还安排当天留尿检查，官员答应送超标工人住院治疗：“我们拦马路那天检查尿镉，如果不拦，他们不会给我们检查尿镉。”

一名在省职防院住院的超霸工人，听到先进厂工人堵路的消息，忍不住笑起来：“哇，她们比我们还要猛啊！”不过也要看到先进厂更多的工人表现出落后的搭便车心态。超霸厂也一样。基本上，只要没有很直接影响到自己，工人都不会想到什么反抗和集体斗争。所以，在这两个工厂，即使有时出现上千人的罢工并有时维持一个星期，但是也有工人一直袖手旁观。一个当时被管理人员利诱隐瞒检查真相的工人后来这样说：

我是1998年进了这个鬼东东厂。

我是一个大老粗，没有什么文化，当然我的证件也是假





的。我老乡请管理吃了一顿饭，不费周张的，我就进了这间厂。其它的情况就跟大家差不多。

当我进了车间的时候，整个车间有一种酒的味道，那是一种米酒嘛。当时我还狠狠的吸了几口气，后来才知道那是天拿水的味道。拉长那个吊猫，带我到车间转了一圈。那时车间到处都是红红的粉，我看到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她穿的是白裤子，裤子上面是红色一个印，我还以为是她的大姨妈¹¹来了。想去提醒她一下，可是我是刚来的，所以只跟拉长说了，那拉长说：“那是粉尘，经常是这样，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后来我也被分到那个工位，那时我才知道，我做的是磅片的工种。现在我好后悔，当初我真是被鬼用布缠了脑壳，蒙头蒙脑的进了这个鬼厂，真的是好后悔哟！

我就干那个破玩意儿，一直干到2004年。那时听说有锅超标，我自己去检查了，结果是超了标。

这时那个管理就把我叫到办公室。

“××××，我对你怎么样？”

“嗯，还可以吧！”我还能怎样回答。

“那你现在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个要求？”

我没有吭声，用眼睛瞪着他。

“听说你去检查了？”

我点了点头。

“你不要把你去检查的事，去检查的结果，告诉其它人，那么我考虑给你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11 意指女人来经。





都怪我当时一点都不了解编的危害性。而且我磅片磅了那么多年，确实想换一个好的位置。所以我就答应了。

过了几天，就跟我换了一个工位。刚开始没有达到产量，那个鬼拉长就天天逼我产量。逼得老子火起，跟她吵了一架，我就辞工了。

我辞工出来没有多久，厂里就开始罢工，那时我回了家。以后的事都是我老乡告诉我的。

像我这种情况，要是去找厂里的话，他肯定不会认的。听说有人去找了，都被打了。

我感到非常后悔的是，当初不该听那死主管的话。我受不了一点别人的利诱，可能是我书读的太少了，只看到眼前一点点光。我还感到后悔的是，不该那么早的辞工，那么我也会同他们一样坚持到最后。

他妈的，弄到现在这个下场，而且我现在身体也出现了像她们所说的症状。经常头痛，腰痛，而且大把的掉头发。

每当在商场里看到“GP”两个字的时候，老子都非常恼火。真想把它砸个稀巴烂。

如果下次你们有什么行动，别忘了，我也算一个。老子现在看透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如果我们不去争取的话，只有等死了。

此外，工人对拉长们也不无抱怨：

我们去堵路的时候，他们躲在上面不敢出来。我们罢工的时候，他们还骂我们呢。

其实拉长当时也要求检查。但是她们一日未检查，一日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超标，所以不会有抗争的打算，还是按以往的





习惯压制工人。后来工人为了争取真实的检查结果而再发动罢工时，拉长就没再劝阻工人了，但多半不积极参与工人的行动，只有那些也发现镉超标的拉长站到工人立场上去。

如果说在中国的私企和外企中，民工还太缺乏反抗意识、觉悟、经验和传统，那么，上述少数挺身而出为民工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不是显得更可贵，更值得我们肃然起敬吗。

比较和总结

发生在老厂和新厂的罢工，两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但恰巧都发生在6月中，同时结束。但是，两厂工人之“同时”行动，很可能是惠州市政府决定介入的原因。

总的来说，镉事件在先进电池厂的发展，比起超霸厂来要慢一拍。

这首先是由于事件起于超霸厂，其次则由于两厂工人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并且同样地缺乏组织和集体行动。直到6月中，为了拿到血镉检查结果，超霸厂的全体装配部工人第一次发起无组织的罢工。而此时，先进厂的装配部工人还在争取体检的权利。

超霸厂106名尿镉超标的工人因此得以住院。而在先进厂装配部，血镉检查才刚刚开始。后来检查尿镉的权利，则是通过一部分工人勇敢地站出来手拉手堵路才争取到的。

在初期，先进厂的工人不仅缺乏组织，也缺乏领头人。工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大，即使在罢工后很长时间里仍没有达到意见和行动的一致。“那时工人分成一帮一帮的，你不服我我





❖ 遭受女工维权史 ❖

不服你，没有头头。后来打官司才搞了几个头（代表）。代表都是拉长，我们也都相信她们。¹²”



12 先进厂工人访谈记录

67





■ 第五章 ■

官商勾结

在大陆，包括医院和卫生部门在内的各级官员与违法企业勾结，当然不是甚么新闻。但是要找到证据，就难于登天了。但从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可以看到在这个领域的官商勾结之烈。张海超因工患上尘肺病，但是老板与当地卫生部门勾结，不让他得到职业病的诊断。最后他只好“开胸验肺”来引起注意。由于事件受到广泛报导，上级单位河南省卫生厅不得不把新密市卫生局副局长为首的几个高级官员撤职，同时也取消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三个职员의尘肺病诊断资格证书。¹但是，奇在这份2009年7月28日由河南省卫生厅发出的通报，竟然不提一句他们为甚么受罚。不过读者都心知肚明：一定是收了好处费。

我们曾经收到一份材料，是一家大型集装箱制造厂的内部文件，题目是《2006年春节各个部门对外关系赠送礼品汇总表（补报）》，其中详列工厂送给省级、市级和区级的职防院、卫生厅（局）、卫生监督所总共19个官员的礼金，少则800元，多则2000元。数目不算甚么，当然啰，那只是节日的礼金；如果要当官的为你办事，就远不止这个数了。

回头再看超霸属下的电池厂，上一章谈到工人怀疑医院与

1 <http://nc.people.com.cn/BIG5/61877/9740609.html>





厂方在检查上做假，而金山集团否认。我们无法找到医院做假的证据。但是细细分析所揭发的许多不正常情况，的确有足令人怀疑的地方。

做假的嫌疑

第一，根据我们的调查，工人的第一次尿镉检查和第二次即使相距只有10天，尿镉水平可以相差几十倍！最严重的女工HYY（代号）相差183倍（请参阅本章附录）！如果医院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去作化验，这么短时间内的尿镉水平不可能相差那么大。我们咨询过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局的一位专家Sherry Baron的意见，她说：

“如果血镉或尿镉水平波动很大，那就需要重复所有测试，对（病人）进行身体检查和研究其病史，再根据所有临床情况作出医学判断。”²

但是超霸厂没有这样做，而是一见第二次检查“恢复正常”，就不理两次之间的结果的巨大差异，也不理工人自检的结果，就停止再为工人检查。

第二，在2004年7月以前，广东省职防院规定要血镉超标才能验尿镉，但这根本违反法律规定。正当的做法应该是两者都要检验（请参考本书第一章）。医院这个违法规定，可以被厂方当成一道关卡，用来阻挡那些血镉正常而尿镉超标的工人要求体检，这样就降低了实际受镉影响的人数。更为可恶的是，当一些血镉超标的工人要求住院的时候，医生又说，根据

2 作者与Sherry Baron的通信，2008年5月18日。





国家标准，血镉超标不能作为“镉中毒”的依据，重要的是尿镉。你们都只是血镉超标，因此不能作为职业病患者来治疗。总之，医生利用专业知识来糊弄工人，也不管怎样自相矛盾。

7月以后，才按法律统一检测程序：测试尿镉，如超过 $5\mu\text{mol/mol}$ 肌酐，再测试尿 $\beta 2$ -微球蛋白及尿视黄醇结合蛋白含量。它自然不会解释为什么之前非要工人先检查血镉不可。

即使这样，尿镉检测的结果在超霸厂，后来在先进厂、捷霸厂和东莞超霸的历次体检中，正如最初的血检一样，往往破绽百出，疑云重重。关于这点，我们下一章再谈。

第三，厂方在开始时不发检查原件给工人，又不承认同样出自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法律规定有资格作出职业病诊断的医院）的、工人自费检查的结果，是不当甚至违法行为，引起工人怀疑也是自招。

第四，工人的尿镉检查结果差异太大，除了有作假嫌疑之外，还有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医院早期竟然沿用1987年的旧诊断标准，没有按照2002年《职业性镉中毒诊断标准（GBZ17-2002）》的规定，对尿镉的诊断值加以肌酐校正（creatinine adjusted）。这可能是医院疏忽——反正只是民工，干吗要那么认真？但是，单纯测量尿镉含量是不准确的，因为只要病人检查前多喝了水，镉相对于尿液的含量就会暂时大幅度下降。要纠正这种偏差，就需要以肌酐校正。肌酐就是肌肉酸。肌酐校正就是拿尿镉含量同肌酐比较。由于肌酐比较稳定，这样的比较就不会出现因为多喝水而使到尿镉含量发生不正常的波动。可是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一直到2004年5月底之前，都是采用未经肌酐校正的 $\mu\text{mol/L}$ 这个单位来表示每公升





尿液含有多少镉。直到工人从该院网站下载那份2002年的新标准，了解到自己的检验报告上的诊断单位与法律规定有所不同之后，向院方提出质疑，院方才在6月中的检查报告上，开始采用肌酐校正，诊断单位也从 $\mu\text{mol/L}$ 改为 $\mu\text{mol/mol}$ 肌酐。可是医院是永不认错的，就像官员从不认错一样，所以从未向工人解释，结果就更加深双方之间的矛盾。当工人忍无可忍而采取行动的时候，无论是医院，工厂，还是当地政府，就只知道欺蒙与压制，结果不断激化矛盾。

2004年9月7日，金山再发出声明，针对有关医院和超霸厂涉嫌在检查上作假的报导，强调“不可能存在任何隐瞒事件的情况”，所有检查与工人进出医院都是“依法依规地进行”。

但是对作伪嫌疑的所有报导，内容都是非常具体，而金山的澄清却空洞无物，如何能服人？其次，如果“不可能存在任何隐瞒事件的情况”，为什么每次检查都是工人罢工抗议逼出来的？

官员玩忽职守

工人一直向许多政府部门投诉，包括惠州市政府、劳动监察部门、卫生监督部门，还有人大，但都对工人爱理不理。工人都怀疑他们已经被买通。我们无法证实这点，但是种种迹象都表明官员偏袒工厂。例如那位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的陈嘉斌主任就多次把工人中毒的责任推到工人身上。7月10日广州日报报导他的谈话：

“该厂的工人之所以会镉超标，首先是在车间进行操作时口罩没有戴好。广东地区夏季天气炎热，有的工人没有按有关





的防护规定正确佩戴口罩，所以在接触一些氧化镉片时，会将镉尘吸入。另一方面，这些工人都是计件取酬的，为了能加快自己的动作，多赚点钱，他们有的人索性把防护的手套脱下。这样一来，他们的手上沾了镉尘，下班吃饭前又没有养成洗手习惯的话，很容易就会把镉尘吃进去。据介绍，目前这批镉超标的工人中已有22人尿镉恢复正常，并已经出院，其余住院病人除个别自称出现骨痛外，大多数没有明显的症状。……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发现得早，按照国家有关的诊断标准，这批工人目前还只是镉超标的医学观察对象，他们的肾功能是正常的，远未达到慢性镉中毒的程度……³”

然而，早在7月6日，省职防院为一位姓曾工人打印的一份检查报告，就已经显示他的尿 $\beta 2$ -微球蛋白含量达到 $30.04 \mu\text{mol/mol}$ 肌酐（中毒标准为9.6），表示肾功能已经受到损害，达到中毒程度（8月2日，医院再正式发出诊断证明，确诊为职业性慢性镉中毒）。为什么陈嘉斌主任在7月10日还讲出不符事实的话？难怪工人读了陈嘉斌的话都非常愤怒。

2004年8月，《中国新闻周刊》访问惠州市卫生局副局长长喻超英，他说：“2002年12月该局对超霸厂检查，即发现空气中镉浓度超标，并建议整改；2003年年底的复检显示正常；2004年5月再次检验，又有5个检测点超标。”⁴

他的发言似乎想说：超霸厂不是年年都镉超标，而我们一直有好好监察。但我们有证据证明喻副局长没有说出全部真相。超霸厂其实在2003年还是超标！我们得到一份由惠州市疾病

3 《尿镉超标：痛痛病阴影笼罩电池工人》，广州日报，2004年7月10日。

4 《惠州：镉中毒后的劳资紧张》，记者：刘英丽，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8月9日出版 29/2004，总第191期。





预防控制中心在2003年3月3日发出的〈卫生评价报告〉，检验对象是超霸厂，检验日期为2月23—25日。这份没有公开的报告明确地指出：超霸厂空气中镉浓度超标10倍！原文是这样：

“根据GBZ2-2002《工作场所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氧化镉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限值为0.02mg/m³，本次检测的配浆车间送粉处氧化镉浓度为0.204mg/m³，超标10倍。本次检测的8个氧化镉作业点中有2个作业点氧化镉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超标率为25%；有2个作业点氧化镉浓度在国家卫生标准值上限。”

根据喻超英和上述资料，证明超霸厂至少在2002到2004年三年期间，年年镉超标，而卫生局除了检查和最多劝告其整改之外，完全放任工厂持续毒害工人！

按照中国《职业病防治法》，“发现用人单位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卫生行政部门有责任“及时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包括“责令暂停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的作业”、封存相关材料和设备、控制事故现场，为从事有毒化学品作业的员工进行体检，也有责任要求工厂送受害工人就医。卫生局早在2002及2003年就验出超霸厂镉浓度超标，不更应该勒令厂方整改，而且在工厂拖延的时候就更应该处罚它。但是结果工厂既没有整改，而卫生局也没有给予厂方任何处分。当局甚么也没有做过来保护工人，连要求厂方送工人去做镉的检查也没有！非必等到工人病倒——体检——发现镉超标——回来跟工厂要求体检——不果之后发起罢工，等到事情不可收拾之后，卫生局才勉强应付工人。地方官员之一面倒向资方，不是明如白昼吗？

根据《安全生产法》第77条第3点，如果有关官员对于“





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而……不予查处的”，就应该给予行政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可是至今也不闻有任何惠州官员因此被处分过。

那么，金山集团方面的责任又如何？当镉毒事件在7月初为香港媒体所揭发时，金山工业集团的第一反应是发出一张公告，为自己辩护：“惠州超霸于2001年已获国际认可的ISO14000（环境）认证，……证明工厂无论在安全、和排污等各方面都符合国际要求。……所有生产程序及安全管理均遵照中国国家及惠州市之法例和规定。”

上面的材料已经说明，至迟到2003年3月，惠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查出超霸厂的镉浓度超标10倍。工厂方面对于这个〈卫生评价报告〉不可能不知道，因为这个报告上面就盖了惠州超霸的印章！明知而故犯，什么ISO14000认证，什么“所有生产程序及安全管理均遵照中国国家及惠州市之法例”，不是遮羞布又是什么？或者超霸厂的头头没有报告大老板金山集团？这并非不可能。即便这样，金山集团也难辞其咎。

深圳捷霸厂的情况也一样。我们找到一份该厂在镉害爆发前的一次生产安全会议的记录。会议日期是2002年7月19日，也就是镉害事件曝光前差不多两年。记录上说：

“二. 监察情况汇报

詹副总汇报了7月12日市卫生监督所5人来我厂的监察情况。此次监察很是详细，被监察出有6条违反行为：

1. 工作场所不符合职业卫生要求：使用有机溶剂的场所无与其相适应的防护设施；
2. 二楼沥青房工作场所中，未为劳动者提供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3. 一楼厂房嘈杂机和其它使用有机溶剂工作场所，未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4. 违反有关职业卫生培训的规定：未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
5. 未组织劳动者进行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
6. 其它：电解液和湿浆工作场所使用的化学品无中文说明。”

原来不论是深圳市卫生监督所还是捷霸厂的高层，早就知道捷霸厂的生产并不安全！而卫生监督所居然没有更全面的调查工厂，也完全没有通知或警告工人！更奇怪的是，文件没有提到镉。不知道卫生监督所是有检查空气中镉浓度，而这位詹总遗漏报告，还是卫生监督所根本没有做检查。如果卫生监督所有检查，那么应该发现到空气中镉浓度超标，因为甚至在2004年爆发镉害之后几个月，就是同年的10月，那时已经整改过，可是空气中镉浓度依然超标。如果发现镉浓度超标而不去制裁工厂和严令整改，当然是失职。如果它从头起就没有作镉检查，同样也是失职。

这些事例说明，GP超霸的镉毒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与超霸厂相比，先进厂的情况更为恐怖。惠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04年1月8日，即超霸被工人揭发镉毒事件不久，到先进厂采样检验空气中镉的浓度，1月15日发出〈卫生评价报告〉。检验的结果是7个作业点中，有6个氧化镉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其中一个超标35.5倍！同时超标的还有噪音，在18个样本中有16个超标，合格率只有11.1%。

即使在超霸厂整改和停产镍镉电池之后，惠州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在5月21日的采样中，仍然发现有2个作业点镉超标1.1倍，另2个作业点噪音超标。再到11月25日的检查，镉与噪音没有超标，但是就轮到镍超标。

2004年8月9日，惠州市政府宣布根据《职业病防治法》，要求两厂立即停止镍镉电池的生产，责令其整改，并以16万人民币的罚款。这样大规模的毒害事件，没有一个管理人员受到任何刑事检控，只是罚款，而且是——16万。

大概丑事难掩，罗仲荣终于在2004年9月22日在报纸上承认“珠三角厂房高速增产、管理阶层疏忽，是导致意外的主因。”但是他继续辩护：“集团在内地共设有17家工厂，除两家工厂发现问题外，其余厂房员工并无出现同类状况。”⁵两家？错了。深圳捷霸工人，早在9月初已经发现镉超标了，虽然拖到10月才向工人公布。究竟是下属隐瞒了真情还是罗主席贵人事忙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工厂明知故犯

至少在镉毒事件之前，超霸 / 先进厂在有关劳动管理上也会有很多违法地方，但当地政府置若罔闻。

我们工作两班倒，早班工人从早上7:00工作到晚上8:00，中午12:00—13:00是休息和吃午饭时间，其它时间都得手不得闲地工作，没有时间喝水，上厕所。晚上工厂没有时间吃饭，工人得等8:00下班后才吃晚饭。晚班工人就更辛苦，从晚上8:00工作到第二天早上6:45，中间只得30分钟

5 信报，2004年9月22日。





的‘夜宵时间’。⁶

除了吃饭，工人每天12小时呆在车间里干活。

超霸厂实行的是两班倒，每月轮一次班，每月只放一天假。这样，早班工人一周工作84个小时，晚班工人一周工作77个小时。但是，根据劳动法，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⁷。这表示超霸厂像大多数大陆工厂一样，是违法加班。虽然是计时工资制，但每天的产量定额像鞭子一样催迫着工人：

他们那样定产量，手脚快的还好一点，手脚慢的人，一天到晚十二个小时都没得休息；产量是很高的，紧张得连上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去洗手了。

完不成定额的员工被命令先去打卡，再回来把剩下的工作补完。这段时间的劳动，厂方是不付工资的⁸。或者，如果你达不到产量的话就扣你的加班费。中午你没做完，就吃了午饭后再过来，加中班把它做完（但没有工资）。

不同工种的产量定额分别制订。但是怎么个订法，说来可笑，就是由管理者观察现场后，算出工人每分钟可完成的产量，再用简单的算术求出一整天的产量。主管们当然不会烦心去观察、研究坐在流水线前的工人跟机器有什么分别，所以举

6 超霸厂工人访谈记录

7 《劳动法》第38条：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劳动法》第41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8 在大陆，这种情况叫“补班”，不叫加班。





凡上厕所、休息的时间都压缩到最短。何况“观察”的时间是在早晨刚上班不久，也就是工人精力最好，效率最高的时候。⁹工人呢，当然没有商量余地。为了赶时间，有的工人甚至把午饭带到车间去吃，喝水也不离开岗位。夜班加餐自然更是在车间里完成的。先进厂也是如此。后来工人告诉记者：

“更让工人们想不通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可能致命的中毒餐饮方式，非但没有来自工厂管理层的制止，反而还被变相鼓励，因为厂里要求工人只能在车间里吃夜班加餐。”¹⁰

在工资方面，一名老员工说，较其它企业，该厂算是“工资高、福利好（买了保险）”。到2004年，一般工人的月收入达到千元以上。2004年9月以前，很多工人都没想过要解除劳动合同离厂。一些住院女工曾告诉记者，为了养家糊口她们仍愿回厂上班。

不过，高工资主要是靠加班，并非因为基本工资高。相反，两厂长期以来都不给工人最低工资。2004年惠州的法定最低工资是400元，可是当年超霸给工人的基本工资只有380元，也是明显违法。后来工人在斗争及谈判中成功迫使厂方补回一部分被骗去的最低工资差额。这是后话。

工人的加班收入一般是基本工资的两倍半至三倍。这种靠加班来获得较多工资的状况，客观上也等于增加资方的权力：工人不听话，就不让他们加班。在2005年惨淡的日子里，由于

⁹ 先进厂的产量定额也是用相似的方法制订出来的。参见下面先进厂员工访谈。

¹⁰ 先进厂工人的陈述。见〈重庆民工广东镉中毒事件：65名受害民工今起诉〉，重庆晨报，特派记者：夏显虎，2004年10月14日。。





镉事件影响，厂方把生产线转移到内地其它城市，厂里无班可加，“老工人”的月收入就只剩五六百元了。深圳捷霸厂的工人也是如此：没加班，就只能拿到600元左右。

我们详述超霸和先进厂的具体情形和运作，虽然足以说明大陆工厂里剥削与压迫之重，但不是要拿它作为一个最恶劣的典型。相反，工人说，“该厂的工资待遇在当地还算不错”。碰到法定节假日，超霸厂是给工人放假的，而更多工厂一年到头几乎没有放假。不过，超霸 / 先进厂只是并非最坏而已，完全够不上一个“好”字。要说好，至少要做到完全不违法。它们连这点都做不到。





[附录]

2004年先进和超霸员工体检差别表 (1)

尿镉单位: $\mu\text{mol/mol}$ 肌酐

代号 事项	YHG	HYY	YCX	HLY	RGG
性别	女	女	女	女	女
厂名	超霸	超霸	超霸	超霸	超霸
第一次尿 镉检查时 间及结果	2004年 6月21日	2004年 6月21日	2004年 9月13日	2004年 8月11日	2004年 9月23日
	248	292	5.9	1.8	11.6
第二次尿 镉检查时 间及结果	2004年 7月1日	2004年 7月1日	2004年 9月22日	2004年 9月13日	2004年 10月26日
	2.9	1.6	0.37	11.9	2.6
时间差	10天	10天	9天	33天	33天
检查结果差	差86倍	差183倍	差16倍	差7.3倍	差4.5倍
备注	观察对象 小孩超标	观察对象	在职工人， 肺部纹理增 粗、咳嗽、 有血尿， 厂里不给检 查。	一次超标， 没有复查机 会。	一次超标， 没有复查机 会。



2004年先进和超霸员工体检差别表 (2)

尿镉单位: $\mu\text{mol/mol}$ 肌酐

代号 事项	YL	XYC	RZC	FST	HQX
性别	女	女	女	女	女
厂名	先进	先进	先进	先进	先进
第一次尿镉 检查时间及 结果	2004年 8月18日	2004年 7月15日	2004年 7月15日	2004年 8月27日	2004年 7月15日
	274.4	15.6	21.8	22.7	13.5
第二次尿镉 检查时间及 结果	2004年 9月16日	2004年 8月5日	2004年 8月9日	2004年 10月13日	2004年 8月5日
	9.3	1.6	2.6	1.4	25.8
时间差	29天	21天	25天	49天	21天
检查结果差	差29倍	差10倍	差8.4倍	差16倍	差2倍
备注	观察对象 一次超标, 没有复查机会 一次超标, 没有复查机会 两次超标, 厂方要她放弃一次, 只承认一次超标, 2007年1月30日在广东省职防院自费查超标。后起诉公司。 观察对象, 离开厂后, 镉含量越来越高。				



第六章

血汗工厂的一天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一度流行这样的观点：当代资本主义的讯息革命，已经使它日益脱离物质生产，日益网络化，虚拟化。物质生产和产业工人阶级一样，都变得不重要。其实，到大陆的血汗工厂看一看，就会知道事实的另一面。上述那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它只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并且仅限于西方国家的局部现象，忘记了网络世界本身也要建筑于无数硬件之上，忘记了在这些国家仍然存在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¹，但更忘记了资本主义是世界性体系，忘记了这个体系下，21世纪的网络世界和19世纪式的血汗工厂，二者并存的必然性。不过，这种视而不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工厂制度下的真正生产者——工人——是几乎被完全消音的，被迫做“沉默的大多数”，而掌握着“话语权”的，却是那些骑在工人头上的大老板、大官员，后者可以随心所欲地为毫不人道的工厂制度涂脂抹粉。几乎只有在爆发罢工、堵路的时候，人们才有机会看到“科学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这些名词背后的辛酸冷酷。试问，如果不是镭害事件被揭露，有谁会怀疑金山主席罗仲荣在年报中所标榜的冠冕堂皇的辞令？——“集团一向视员

¹ 2003年，美国仍然有1600万制造业工人，同1961年时差不多，但比1979年下降了500万。如果看制造业工人占全部劳动人口的比例，则前者在1979年是20%，2003年是11%。





工为最宝贵的资产，致力缔造一个理想的工作环境，令员工感到备受重视和赏识，增加员工对集团的归属感。”

这一章我们由超霸 / 先进厂工人现身说法，道出她们对工厂生活的感受和见闻。第一篇是一位女工亲笔所写，第二篇是访谈记录。从中可以读到她们的爱恨，她们的实际上或精神上的反抗，反抗这个非人道的工厂制度。

宿舍，工会与基层政府

超霸的员工宿舍与车间是并排的，两栋楼只有几米之遥。两栋房均在厂区内。员工吃饭通常是在宿舍吃，一边吃饭一边可以听到机器声。

员工宿舍有五层楼，每层有11间房。每个房间放了上下床，共12张，一般每个房间住七八人。整栋宿舍就一个楼梯口。澡堂在宿舍后，共十来个澡堂，有好几个还是坏的，因员工太多，冬天员工下班洗澡排队，有时几个钟都排不上。

员工宿舍是早夜班混在一起住，上白班的同事每天中午休息，说话声音大，会吵到上夜班的同事休息。相反上夜班的同事如提前下班也会影响上白班的同事休息。每个房间有两台小型风扇。遇到天热的时间，两小型风扇根本就不够用，很多地方扇不到风，所以房间很热。特别是五楼，夏天显得特别的热，很多人就用席子直接铺在水泥地上睡。工人都觉得在厂宿舍住不安静，条件不好，休息不好。宿舍不干净，有很多蚊子。所以就到外面





租房住。有的员工是有配偶在惠州，所以也在外面租房住²。如果厂里老多多，也可以几个老乡合租一套房。

在宿舍里住一个月每个员工要扣45元，因为这一点，很多工人也选择在外面租房住。

2001年初，有一个孕妇因感情受挫，从宿舍的五楼跳楼自尽。吓得很多员工（特别是和此孕妇住同一宿舍的工人）都搬到外面去租房住了。因为此事，超霸厂在事发当天还请了巫师驱邪。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超霸 / 先进厂都有工会，但是几乎所有私营企业的所谓工会一样，完全只是空架子，用来应付官儿的文牍游戏。超霸工会的主席是谁？是人事部经理陈建芬。会员是谁？你去问问超霸员工知道不知道厂里有工会，大部份都会答不知道。如果工人连有无工会都不知道，谈什么会员？所谓会员，其实不过是由上面挑部份积极的拉长充当，每月扣除0.5%工资作会费，一年参加一两次联谊活动，如此而已。就像那些生产安全委员会一样，工会纯粹是不起作用的招牌而已。

在大陆，任何一个“单位”，即使是私营的企业，它也要负担种种政府所委派给管理层的任务。“计划生育”就是一项。超霸厂里从开厂就一直在执行“计划生育”，就是说，女工不能生第二胎。

谁生了第二胎就违反计划生育，就要处分，如果是普工，就不准调工位，是拉长的就要打下来做员工。我们员工也觉得有道理：谁叫你生第二胎啊。

2 跟许多工厂宿舍一样，超霸没有夫妻房，结了婚的只有在外面住。没有钱在外面租房子的话，就只能忍受夫妻分隔。这个问题在出口加工区很普遍。





梁卿的知识比较广，她本来是拉长，后来因为生了两胎，上面也看她比较“刁”（跟上司说话没有很客气），被打下来，调到粉房做员工。梁卿把自检结果交给厂方以后，厂方只是说她那没问题，不理她，把她当作异类，说最刁的人才去检查，把她调到顶组合。梁卿自己也有很多顾虑：生了第二胎，老公在TCL做机修，等等。所以也不敢太闹。

为了能够“管好”民工，像检查暂住证，贯彻“计划生育”等等，工厂所在的基层政府，例如村或街道办，或者更上一级的镇政府或区政府，它们不时都要派出治安队去工厂检查。这类检查也常常成为基层官员和治安队发财的机会（因为动不动就向工人罚款）。治安队特具中国特色，并且一旦同户口制度结合起来，就成为对民工的强大的社会控制的工具。表面上，治安队是中国基层群众自办的民防组织（主要是从本工作单位抽调人员进行业余巡防），所以没有执法权。但是，至少从1980年代起，治安队实际变成由基层政府所雇用的职业化队伍，并且在没有宪政基础上被赋予执法权。他们完全不具有公务员资格，待遇也比公务员低得多，主要是从当地的闲散人口甚至流氓招募。这种杂牌军的素质当然不会好。2003年在广东打死孙志刚的就是这类治安队。由于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一旦打死打伤了人，事情闹大了，他们也很容易给公安当作牺牲品。

曹梦华说：

2000年，小金口镇的计划生育办公室曾经开面包车到厂里抓人。凡是怀孕的女工都要带准生证，没有证的统统抓到镇里去，要罚一两千元。后来，厂里工人为了搞超标的事情





而闹起来的时候，计生办也来抓人，分明是威吓工人。

此外，村里的治安队也来过厂里检查暂住证。没带证或者证件过期的，也要罚款。它们都是等工人下班时，堵在厂门口一个个检查和抓人。

这些证件是通过工厂统一办理的。每个工人把准生证、暂住证交到厂里，再由厂交到小金口镇，盖章。不过关的话（就是证件过期未办理年审），罚款100元。

超霸的一天

作者：李小鱼（原超霸厂装配部门员工）



A、起床的钟声响了……

“该死的闹钟又响了……”我把被子蒙在头上，嘴里唠叨着。自从进了超霸厂，睡觉成了我唯一的爱好，每到放假就是我睡觉的好时机。然后听到宿舍里的人穿过来穿过去的，阿春在叫：“有人看到我的工衣吗？”“请人让我拿一下脸盆好吗？”这是阿风的声音，这真是叫声、骂声、询问声、声声入耳啊。过了一会，终于安静下来了，我把被子拉下来，呼了一口气。唰的一声，我的床帘被拉开，我们宿舍出名的爆破音在我头上炸起“你这个懒猫还不起来啊，还有十分钟就迟到了，你是不是不想活啦！”她是忘记拿厂证倒回来的，发现我居然还在床上梦游，所以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拿起钟一看，乖乖隆里咚，真有十分钟。我用手在头





上插了几下，算是梳头（自从我进了超霸，我把我心爱的长发剪了，是为了省几分钟多睡一会儿）。然后，拿毛巾跟脸来一次亲密接触。一只手拿着工衣，一只手提着一个袋子。袋子里面装的是袖套、要带回去洗的手套（自从厂里搞了ISO14000环保认证后，为了节约能源、利用资源、扩大再使用产品，我们每天一双的手套改为两天一双。没办法我们只有拿回去洗了），然后百米冲刺往车间跑去。

B、在车间里……

到了车间，随着我的脚步刚走到工位上，上班的铃声响了。我一边擦拭头上的汗水说好险，一边看了看周围的工友，都在工位上开始工作了。唉，这些工人真是可怜，为了达到产量以免又要做义务加班，早早就来到车间干活了。

义务加班顾名思义就是免费加班，没有钱的。厂方在计算工资方面本来是按时计酬的，再具体一点就是每小时有一定的产量，其中还应包括喝水上洗手间的时间。厂方为了增加产量就减少工人喝水上洗手间的时间，在每小时规定达到多少任务才能完成工作量。至于产量，某位生产主管有一句口头禅“产量是无限的，没有所谓的最高产量或标准产量，压力越大动力越大、生产力也就越大”。于是在装配部最重要的就是提高产量，如果不加产量，那么就打卡不下班，继续留下来做到规定的产量。有的工人不愿意去打卡，拉长就抢过她的厂牌去帮她刷卡，工人就扣留在车间继续做。

也许有人会问，我有过这种情况吗？我是没有过，一来





我是开机的³，如果我惹火了故意怠工，或者机器出现故障，那么修理的时间就会要一到两个小时，在线就没有料供应。再一个我们全车间开这种机器的人较团结，都不愿意加上去，在时间方面控制的较适当，给管理无机可乘。就算是这样，我们也加过两次产量，但比起其它的工人又好多了。

废话说了一大堆，现在言归正传。就在我戴上拉长给我发的口罩后，一下子看到坐在我对面的工友，脸上挂满了泪痕。我大吃一惊，赶忙问是怎么回事，她只是哭不说话，后来是旁边的工友给我说了原委。

原来是拉长给我们发口罩，2003年非典之后我们开始用3M口罩，一个礼拜两个。口罩发到我工友手上的时候，带子有点紧，她就拉一下，孰料带子就拉断了。她去找拉长要求换一个，拉长说“我这里没有，你去找总拉好了”。总拉是一个出了名的泼妇，这名工人胆小就不敢去问要。后来总拉经过，看到她还没有开机，就说你为什么还不开机？工人说，口罩带子断了，那总拉就破口大骂：“谁叫你不小心！你知不知道，一个口罩多少钱？这样就被你浪费了……”。直骂得那工友泪水往下掉。看到我的心也酸了，我走过去帮她擦眼泪，说：“别哭了，为这事掉眼泪，会让人把你看扁的，我帮你去问问。”于是我就走过去，去跟那拉长说：“阿玲，麻烦你帮换一个，好吗？”那总拉看着我，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是没有办法啊，你知不知道，上面对口罩控制的很严啊，我们拉长是四天一个。”我说“即使是这样，你

3 “开机”就是负责机器运转，而不只是将机器做出来的半成品、成品进行手工的整理或加工。开机需要一定的技术，对机器的运转就有一定的控制权。





也不应该那么凶嘛，都是在外打工的，你又何必做的那么绝呢？”后来总拉去了那工友那里，安慰了她几句。但是依旧没有给换新口罩。结果我想了一个办法，在口罩边打了一个孔，用橡皮筋给他系上，才算是解决了吧。

为什么我提到这些，总有些心酸的感觉，总有种不愿去回首，不想再去触动那根伤感的神经？

还是少发那些感叹了，就在我边做事边梦游的时候（我从来都是在上班的时候想很多的问题，或者在回想我看过的书。我的个人观点是：我的身体出卖给工厂，但我的思想仍是我自己的！），突然听到旁边的工友阿霞大叫“完了，完了！”我丢给她一个疑问的目光，她连忙说：“时间到了，我要下去了。”原来她给小孩喂奶的时间到了。我们厂的女工有许多都是在工厂里结婚，然后怀小孩，大着肚子上班，请产假回家生孩子，假期满了再带孩子回来上班。在固定的时间里，由家人带来孩子，自己每天下去喂奶，去一次大概要花半小时左右，一天要用去一个多小时。但是在这一个小时里的产量是要照常交的，为了这份工作，这些妈妈们常常要用中午的休息时间来赶产量。

一年后，当我从资料上得知，镉可以通过乳汁传染给小孩，当我得知有些小孩去医院检查，尿镉超标的时候。请大家能够谅解我这多愁善感的心，涌上心头的是一阵阵心酸和悲凉，为这些可怜的妈妈，也为这些无辜的小小生命。

紧张而又忙碌的上午终于过去了，久盼的铃声在车间里回荡，我暂时收回了我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是向那些资本家出租自己的身体，收取廉价的租金。有一件很好笑的事，





我的同学刚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进了这间厂。人虽然离开了学校，但脑子里还停留在学校，每当下班铃一响起，她就会大叫“啊，下课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她瞪着眼睛看着大家，还不知怎么一回事呢？

C、吃饭时……

再说我们吃饭吧。我们排着队下班，排着队打饭，一切都是井然有序，其中免不了有一些小插曲。饭菜也算一般了，在工厂几乎都是这样廉价的食物。然后我们就找各自熟悉的老乡工友，围在一张桌子上，边吃饭边谈我们的欢乐和忧伤。那时我们上班的工衣，下了班以后一直穿在身上，也不知有多少镪粉，沾在衣服上，然后掉进了我们的碗里。

中午休息了一会儿，下午又要开始了我们身体的出租工程。情节与上午差不多，每天也是差不多。让我在这里引用一位拉长开会的发言吧：“我们的工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是的，我们天天都是那个种萝卜的，挖的是同一个坑，天天看到的是我们在动，但却不知道种下多少个萝卜。不同的是拉长说的是我们的产量问题，而我说的是我们的劳动与得到的报酬。

D、下班以后……

八点钟到了，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依然是排着队下班了。下班，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意味着我们可以放下一切，开心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了。但事情往往没有结束，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吃饭只有半小时，如果不跑快点，不跑到别人前面，那么就没有什么好菜留给你了。我采取的办法





是到外面的饭店吃，虽然贵些，但免了拥挤之苦。吃饭是可以到外面去吃，但冲凉就麻烦了，全厂一千多名女工，浴室只有十多个。吵架是难免的。为了避免同别人吵架，我常常是九点半才下去冲凉。那工厂是九点半就关热水的，我每次都是最后一班车。在冲凉之前我在干些什么呢？我通常是在床上小睡一会儿，然后等同我一样的人叫我去冲凉。

冲了凉后，我们这些较喜欢看书的人，就在床上看书了。有些比较爱玩的，就找几个同道人去火车站逛逛。有的就同男朋友去玩，逛花园。厂门口还是比较热闹的。自从厂里发生编超标事件后，厂门口就没有那么火了，为啥？有一好事者是这样说的，以前厂里没有发生编超标事件前，超霸厂的女孩子很红，下班来厂门口接人的，自行车，摩托车，还有几辆小车，真是多得不得了啊，现在那些靓妹中了毒，那可是不敢惹了，说不定会带一个麻烦回家。说的是有一点夸张，许多女孩子检查出超标后，男朋友跟其分手。结了婚的夫妻感情不好，回家找对象的也难找，这是事实。而在下，就是其中受害者之一。

我在先进厂的日子

作者：江小眉

1990年5月，我进了这家厂。后来又调到装配部做拉长。我什么都做过，四条拉都管过。

我做的是卷装，做了五六年以后，才开始发口罩。厂里





那些外地来的工人很多是十五六岁。刚开始工资是4.9元一天，每年加一点，从5.2元到5.8元，到6.2元。一个月放假三四天，跟现在相比，那时很少货做。车间里两条拉，93年后增加到四条线，一条拉50个人。

起先厂里是固定班，分白班和夜班。外省来的都争着上夜班，因为有6块钱夜班津贴。后来改成了轮班。

“×××，死人婆！”——车间的劳资斗争

90年卷装工人曾经罢过工，罢了两三次，因为发给她们的物料数量太大，她们不肯做。厂长亲自下来请她们做。工人大多来自四川和湖南，那时候还没有适应这里的工作，不会忍耐，总是“做就做，不做就不做（走人）”。

2000年初，三楼的磅片组闹事，因为粉房很脏，工人有5块钱的补贴，而磅片组没有。磅片组的工人认为自己的工序不比粉房干净，要求至少加两块钱，还拿出法律，要求厂里周六加班按两倍的加班费算。白班的员工写了一份申请书，都签了字，要仲裁。叶广添去找工人，要他们撤诉。有些人怕，就撤了。没撤的都给炒掉，包括工程部的电工。○○也撤了，他还想做，说他那份工（岗位）干净一点。夜班的员工也写了一份，还没签名，所以没炒夜班的人。

可以说，三楼的车间是比粉房更脏，灰尘更多。粉房人少，自由，阿头对他们也好，活干完了可以玩两个钟。粉房的人都不肯调去三楼。

从锅事件以后，慢慢地这些人就没心情做了。

车间里厕所的墙原来有人头高，后来谢启将说工人在厕所里看书、偷懒，还有员工把（超过厂所规定的废品率的）





废品丢到厕所里，把厕所堵住了，清出来一堆……于是就把厕所的门拆了，把墙也拆到只有一半高。搞得这样子，我们怎么敢上厕所哦。

一直到发生事情以后，车间才改造过，装修得跟宾馆一样。我们从医院回到厂里，跟政府的人开员工问答大会的时候，我们说：享受一下宾馆的厕所先……

95年厂里做镍氢电池。原来镍氢、镍镉都做，后来超霸开厂，做镍镉，我们就全部做镍氢，因为镍氢比较难做。到2002年又转回来。上面有人说我们产量低，超霸厂的产量高。我们重视质量，好做的先转给他们，派管理员过去教他们。他们拿两个厂来对比，这样就把我们害死了。超霸厂报废率高，报废的料可以压成一堆，报表上记的很少。我们上司老是说他们好，问我们为什么。我们去新厂的时候，就问他们的拉长和员工，他们告诉我们：厂里报废的料每天一盆一盆这样倒。

2002年4月薛佩琼任职车间主管，到车间里来的时候戴五个口罩，实在很夸张。做了一年以后，因为黄疸性肝炎住院，说这里很毒，后来走了。

薛佩琼上任以后，不断测试各工序员工的每个动作，搞标准化，提升效率。她拿个秒表站在你背后测验产量：一分钟做多少。你想想，一个人刚上班一两个小时肯定是刚睡醒最精神啦，但是越做越累，越做越累……还有，这个星期如果心情好，工作肯定会比较愉快，心情不好会影响工作的，但你还是要做那么多。一个人不可能360天状态都很好的，是不是？可她不管你这样算。





我当时就这样分析给上面，给徐万杰听。我死缠烂缠过几次，说产量定得太高。但没用，他说我老是偏帮工人。

她挂出来一个榜，把产量最高的和最低的几个的名字写上去。就那两三天时间，产量飞机一样飞起来。当然，谁都不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产量最低”的榜上面。产量高的人奖100块，产量低的就扣钱，扣表现奖。谁做工不想多拿这一百块，是不是？厂里一分钱没给，就是把一部分工人的钱扣掉发给另一部分工人，还赚取了高产量。也有的拉上自己内部说好：谁都不去抢第一，产量做到中间。你八千，我也八千，一样。

那块榜其实薛的前任、姓王的主管已经做好了，只是还没挂出来。不过，产量虽然飞上去，但质量差了很多。下班的时候，拉上写报废单，手都写酸了。

还有评表现奖。那些在干净岗位上的不超过50块，岗位肮脏的不超过60块，但我评给员工的每次都超过。徐万杰也很不高兴。

做拉长很辛苦。要写报表，要培训员工，事情很多。后来还要开工人会议，要我上台演讲，我上去都发抖哦。每次有人来厂里检查，原来的报表数据都要改，不然厂里过不了关。我就抱着一大堆报表回家改，也没加班费的。有的拉长就很聪明，把报表发给员工，让她们做。我们这条拉从卷装到压片是一条拉，很脏，只有做顶的那一组干净点。所以拉上很少老员工，工人嫌脏，呼吸不过来。结了婚妇女还无所谓，女孩子就受不了，做不久就走。我一天到晚忙着培训新员工。我是最傻，员工做不到就自己顶上去做。





厂里逼得很死，产量安排太多。拉长对员工就管得很严。员工上厕所的时候就在墙上写“×××死入婆”之类的话。有时候很恶毒。拉长之间常常开玩笑：“你今天有没有上报啊？”就是说：今天有没有有人在厕所的墙上写你的坏话。后来有一次，××拉长看到了，很气，叫她拉上的员工全都在纸上写字。最后还是没有抓到是谁写的。但那以后就没人再在厕所里写了。

以后我们要再到工厂，做员工可以，拉长肯定不做。我们这样年龄也找不到什么好工的啦。

办公室的都看不起工人

以前厂里是很好招工的，尤其是过年后，最多的时候来应聘的有上千人，整个操场看过去黑压压的。员工里有些是办公室管理人员或者海关部门介绍进来的，有很多根本不适合做，我们不敢对他们怎么样，上面有人关照的。

招聘是人事部负责的。有人会向要进厂的人私下收介绍费。我拉上有一个女孩子，我怎么教她，她都不会做。我说：你不适合在这里做。她就求我，说她要是没得做了，连进厂的介绍费都赚不回来，她给了人事部的人800块钱。我跑到办公室去，对人事部的人说：你们谁收了○○800块钱，自己退还给她，人家打工的，800块钱好赚吗？⁴

办公室的人看不起车间的，跟我们说话用的都是命令式。我跟人事部的人玩得很好，所以敢这么跟他们说。过两

⁴ 据工人说，工人罢工期间，三楼招人进来还是得缴介绍费1000块钱，结果新进来的员工还做不到两个月，因为罢工，都走了。她们的介绍费也没得退。





天，那个妹仔来感谢我，说那人把钱退给她了。

2003年底，徐万杰（科文）说：劳动法改了，做10年以上的员工辞退不用补偿。厂里就这样解除了50多个人的合同，有工程部的，有工人，有表现不好的，有工龄长的。工程部辞退的有六七个，都在厂里做了八九年，四十几岁了，再找工作已经不好找。那个×××听到解除自己的合同，全身都在发抖。他本来就怕厂方辞退他，家庭困难，又在建房子，还带小孩。他很怕老婆，老婆好吃懒做。他的工资也不高，跟我差不多，作为一个男人那工资是不高的。他越怕，偏偏就越是他轮到。

那时德赛和TCL也这么做：把做了十年以上的员工炒掉。那些员工要求赔偿，听说打官司还赢了。

厂长经常换。上面怕厂长做太久，得人心，会把人拉走。最后一个新厂长是原来的品管部经理，才做了一年多，碰上这种事，算运气不好吧。

2003年底金山集团接管了新时代厂。2004年初我们过去搞庆祝活动，还唱“我们走进新时代”。没多久先进厂就关了。





■ 第七章 ■

看得见的拳头 ——围绕调解方案的较量

2004年6月下旬，工人千辛万苦争取到住院，以为会得到有效的治疗。然而，他们很快失望了，因为他们很快就被赶出院，甚至想按法定权利得到诊断书都难于登天。

工人不断地追问医生究竟何时才能排清体镉，医生无计可施，就随口说：可以排，但要一两年。“那我们就等到完全排完再出院，”工人说。医院方面呢，当然不依，并把他们强制出院。¹工人拒绝出院，医院就报警。住院工人李彤谈到当时的情形，还愤愤地说：

去了广州以后刚刚一个礼拜，厂里就来接其中4名工人出院。那时真是缺德呀，跟医院一起来搞我们，找了公安，持着枪啊，把人赶出去。陈嘉斌叫护士把病床全部拆了，不让那几个人在里面睡觉。他说（她们的体镉）已经排干净了。

那时我的眼泪都出来了。我们得了病的人，这么可怜喽。不但说没药治疗，还给赶出去。某某就来劝我，说：“李彤啊，人家没动你，你哭什么哦？”我说：“大家人心都

¹ 住院工人认为，虽然厂方组织的血镉和尿镉检查结果往往是有造假之嫌，但在医院里得到的检查结果应该都是真的。





是一样的。如果被赶出去的是你和我又会怎么样？人家（病）好了自然就会出去，没好怎么出去呢？”医院里隐瞒得我们好紧，什么都不让我们知道。

劳资在传媒上交手

6月29日，4名工人拒绝出院，而厂方管理人员的响应竟然是“干脆让车都撞死算了，了不起每个人赔10万块钱”²。住院工人感到人人自危，又是愤怒又是焦急。她们给广东省内（包括深圳）以至中央的媒体打电话、写信。媒体呢，避之则吉。这样，资方打压，官方偏袒，传媒袖手，工人已经走投无路了。

这个时候，香港一个民间团体全球化监察得到了消息，决定发起声援，首先把消息透露给香港传媒。想不到第二天，即7月3日《东方日报》登了头条〈GP镉电池厂镉毒恐慌〉，说“孕妇体内镉超标60倍”，又引用中文大学生物化学系及环境科学课程副教授陈竟明的话：镉可长时间积聚在人体内（“今日吃一斤镉，三十年后仲有半斤在体内”）³。其它各报也有报导。

接下来，香港记者纷纷前来广州及惠州采访。香港的连番报导也促使大陆各省市的传媒（惠州除外）争相报导，不少比较客观公正。中央电视台的报导也是这样。结果给市政府和金山集团不少压力。7月6日，金山集团在香港各报刊登了一份〈澄清声明：非工业中镉毒事件〉的广告，强调“公司的安全管

2 超霸住院工人的公开信：〈致中国版记者——有关金山集团超霸电池厂工人镉中毒事件〉

3 〈GP电池厂镉毒恐慌〉，东方日报，2004年7月3日，要闻A1。





理及安全教育完全按照国际认可的ISO14000认证标准”，劳保用品亦合格；资方“主动派车送工人到医院检查”并承担住院期间的医药费和工资云云。7月5日，工人覆信媒体，逐点批驳金山集团。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工人只有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迫使资方做有限的让步。更多的时候是工人只有默默挨打的份儿。在这个时候，香港团体的声援多少有点打气作用。全球化监察在事件得到报道之后，一直和其它团体开会讨论声援工人，包括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中国劳工通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职工会联盟、街坊工友服务处、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等等。大家决定在7月23日这一天发起行动。行动隔天香港《新报》报导：

“不要血汗电池、赔偿工人损失、超霸要对受伤工人负全责！”多个工会组织联同全球化监察成员一行逾四十人，昨日高举抗议横额，呼喊口号，前往金山集团位于葵涌总部抗议，代表抵达金山总部后欲冲入办公室，但职员阻止，双方一度发生冲突，代表即场上演街头剧，讽刺金山集团为求赚取盈利，不理员工安全，扰攘逾半小时后，金山工业派出集团副总经理李黄玉环、董事庄绍梁接收请愿信后，代表和平离开公司。”⁴

香港团体的声援，多少鼓励了被迫出院的工人。

7月28日，厂里为了要我们出院，让医院停了我们的饭。阿辉就去砸医院的牌子，说：你们有没有医德，这样对待病人？！我们决定明天去抢饭吃。

厂长在广州呆了一夜。夏丽华医生找我们开会，说要讲

4 新报，2004年7月24日，港闻，A06。





道理什么的。

我们的检查结果出来，尿锅还是很高，有波动。

医生说：你们饭都停两天了，不走，也没意思了。

我们说：管他有没有意思，我们就是要住院，治疗。

厂长到楼上来，说：今天跟我一齐回去，该给安排什么工作就安排什么工作。当时陈嘉斌等几个医生都在。我骂了陈嘉斌，我说你这样对待我们太可恶了，出去要被车撞死。我还问他：你收了厂里多少红包啊？他气坏了，说我们诽谤，要告我们。

第二天上午他把我们还有（厂长）谢启将叫去办公室谈判。他把录音机摆在高高的地方。达光看到了，轻轻捅我一下，我妹也看到，瞟了我一眼，小声叫我“注意哦”。谢启将还是说昨天那些话：一定不安排你们上车间，不接触锅，让我们去饭堂做，或者当保安，工资跟原来一样。

我们说：超标的有200多人哦，你们厂里要几个门卫，几个在饭堂啊？

谈到后来，谢厂长听说有个录音机放在那里，吓得直打抖，嘴巴“呵呵呵”说不出话。我和阿红笑得要死。

他们实在接不走我们，下午就离开了。⁵

但是这个胜利维持不久。几天之后，他们也被迫出院了。

钦差来了！

工人的抗争，和境内外大量的报道，终于惊动了中央有关部门。

5 超霸厂员工访谈记录

100





8月2日，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教授黄金祥为组长的国家卫生部专家组5人“抵惠指导”，由省卫生厅副厅长黄飞及省、市专家陪同，“深入惠州超霸电池有限公司和惠州先进电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和医院，实地了解情况。专家们认为，惠州市政府及各有关职能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及时采取了相应措施，使该事件得到基本控制。”⁶

专家组建议，“由于目前无特效的驱镉药物，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对177名尿镉超标的员工每年定期复查一次；二例诊断为职业性慢性镉中毒者，应调离接触镉及其它有害作业，安排其它工作；依据《职业病防治法》和《有毒有害作业条例》，做好工人作业环境的监测和劳动保护。”⁷

专家组还“检看了病例、实验室的情况和有关资料，认为：一，诊断两例轻度镉中毒是正确的，鉴别诊断是准确的；二，对177例详细查看了检验结果，确定177人连续两次尿镉血镉超标者列为观察对象。”⁸

第二点颇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上文已经交代过，不论是工人的血镉还是尿镉的检查结果，都有很不正常的波动，这些专家没有理由看不到。除非是医院手握两本帐，假的给工人，真的给专家。即使这样，难道专家就不看看境内外有关报道吗？如果看了，难道不应该检查真相，把177人的尿样全部重检，并与院方的检验结果单核对？可是这个专家组却只是查看了医

6 《卫生部专家组抵惠指导》，惠州日报，2004年8月4日。

7 《2人镉中毒177人尿镉超标 惠州通报镉毒事件最新情况》，深圳特区报，2004年8月4日。

8 《惠州：2人镉中毒 企业表示要负责到底》，广州日报，2004年8月5日。





院出具的检验结果单而已。这好比校长翻看一位涉嫌舞弊的教师所批改好的试卷：60分以上？哦，没错，是及格。57分，哦，对，是不及格。至于试卷中的分数是否加错，或扣错，甚至试卷的设计本身或考试过程有无作弊……那当然不是这位校长要操心的事。

但是对惠州市政府来说，应当如释重负：国家卫生部的专家和省卫生厅副厅长都莅临指导过，并对“惠州市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予以热情的肯定，那还用说么，事件当然已得到控制。

那么，后来工人到北京上访，终于徒劳无功地折回来——其实结局早已“注定”了。因为“上面”早已经为事件做了定论。假如工人竟然推翻了它，那不是等于往“国家卫生部”和“省卫生厅”的脸上摔了个重重的耳光？

8月3日，由政府出面，召开了媒体见面会或曰新闻发布会。两间工厂的董事长许永新“当场表态：我们会承担所有的责任，社会及法律责任我们会全部承担起来”，“对两名患者和其它尿镉高的职工进行精心治疗和定期检查”。⁹

“厂方表示要负责到底”。但真是这样吗？首先，超霸、先进两厂的主要职业病危害，除了氧化镉之外，还有镍化合物，然而不论是惠州政府还是决心负责到底的金山集团，除了镉，什么都不管。再者，对于镉，它其实也只是马虎地管。所谓魔鬼在细节，官商是否真的依法办事，还得看看细节呢。

9 《惠州：2人镉中毒 企业表示要负责到底》，广州日报，2004年8月5日。





“一切都是逼出来的！”

金山集团当时还有一个辩解，就是镉超标不等于镉中毒。这种辩解实在非常搞笑¹⁰。上文提到，不久之后，最迟8月2日就证实有2个工人中毒了（以后陆续增至22个）。不过，这是后话。即使当时看来，这个说词也不过是诡辩。表面上，镉超标当然不等于镉中毒（请参看第一章有关段落）。究竟是哪一种，第一，要再检查尿β2-微球蛋白含量。但是，工人当时就投诉医院和工厂迟迟不为他们作这样的检查。7月5日，工人发出一封公开信：

“公司口口声声说我们是镉超标而非中毒，可是根据镉中毒的国家标准，尿镉5μmol/mol肌酐已经是慢性中毒的下限，可是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达到了10以上。而且做职业病的检查，必须做尿β2-微球蛋白或尿视黄醇结合蛋白的检查，为什么公司一直没有给我们做这个检查？为什么没有这个关键的检查结果就得出结论说我们不是中毒而是镉超标呢？我们查找了大量资料才明白，公司根本没有给我们及时有效的治疗与诊断！”

第二，如果证实工人尿β2-微球蛋白含量超标，就要由医院作出职业病诊断。但是工人申请职业病诊断，要得到工厂和医院的配合，由它们提供所必需的文件（见下表）。按照法律，后者当然有义务配合。然而，如果医院和工厂有意刁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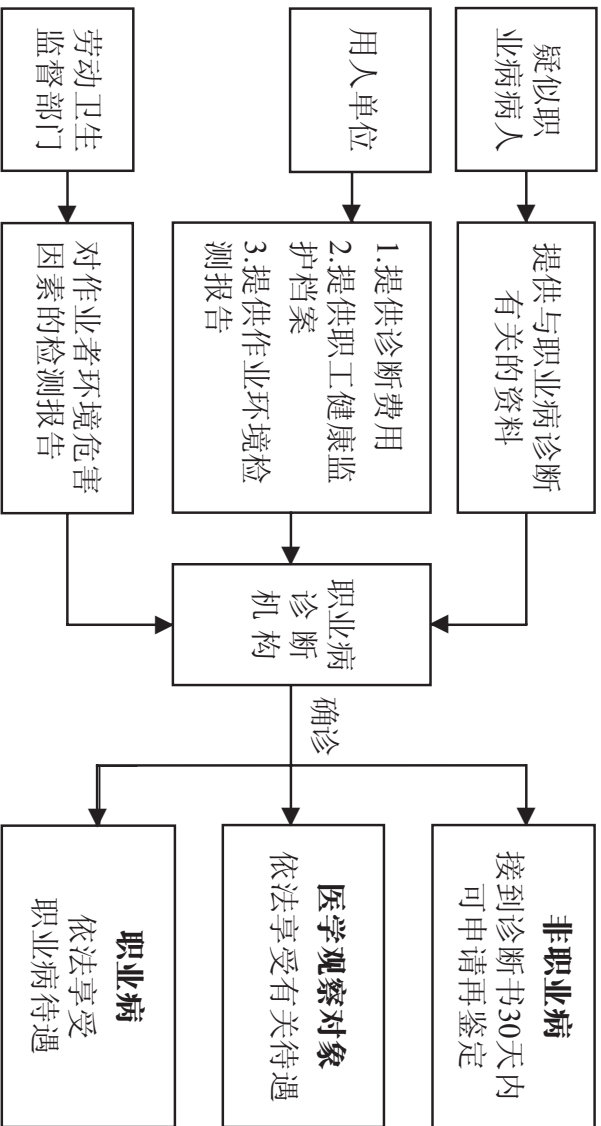
10 正如陈竟明教授所说：“是次事件是否‘非工业性中镉毒’应由当地政府调查后提出，而不应由肇事单位单方面提出，否则根本没说服力。”《惠州直击GP超霸电池毒工厂》，壹周刊，2004年7月8日。至于工人是否达到中毒，则应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专家库中随机抽出的专家组成“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来审核。





工人，只要不断拖延处理，就很容易令到没有拖延本钱的工人放弃。而一天工人由于有关方面刁难而拿不到诊断书，一天厂方都可以说工人没中毒。

申请职业病诊断程序图（由左至右）



早在4月间，就有住院工人申请诊断。这需要工厂提供材料，包括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和工作环境检测报告。工人问厂方，厂方说提交了。问医院，医院说没有收到啊。如此反复多次。

5月24日，5名情况较严重的工人填写了职业病诊断申请书。一等又是50多天。

工人天天催问医院。直到7月间，医院还是说：工厂还差职业接触史没有提供。工人又是打电话给工厂，还找了政府：

政府说要我们先找卫生厅。我们去了卫生厅，那工作人员不管。我们就说不管的话我们就去北京告。那些人说，你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告。



拖到7月24日，才有个别工人拿到通知书，说可以做诊断了。8月2日，才有两个工人拿到诊断，确诊中毒。一直到10月间，也就是拖延5个月之后，尽管至少两厂已有500名工人住过院，却只有5个人拿到职业病诊断书。还有一些工人想先递交申请，医生竟然欺负工人不懂法律，说：如果诊断出来不是职业病，那么诊断费用1500元就要工人自己承担。工人听了，就更不敢申请了。已提交申请的两厂工人，则都迟迟拿不到厂方提供的材料。

于是，工人为求得职业病诊断，又变成另一场斗争。对超霸工人而言，如果不是走投无路，鬼才会去斗，因为每走一步都要斗争，实在非常累人而又高风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不少工人还是放弃抗争，有些虽然坚持，但是后来回想总有不堪回首之感。正如超霸工人所说：“一切都是逼出来的！”

组织起来与官商谈判

2004年7月9日超霸厂63名超标住院女工出院之后，从7月中到8月9号厂方第一次拿出方案止，出院工人初步组织起来，展开同厂方的谈判，以及筹备其它行动，例如上访广东省政府。

超霸厂的程湘回忆他们怎样组织起来：7月9号，我们63人出院，厂方叫我们先休息3天再上班。但是我们对厂房的环境卫生有很大顾虑，而且需要研究怎样解决我们的健康问题。因此我们中有40多人就开会。我们在（惠州）火车站大草坪上开会，决定要跟厂方谈判。

这时刘右君的劳动合同到期了。厂方看他是这次编事件





中工人的领头人，就不与他签合同了。他只好离开厂里。没有新的领头人，我们很可能就会散掉。刘右君不愧是我们工人的代表，为了让抗争能进行下去，他就着手物色人选去当个头。当时我们的行动常常有人跟踪，为了避免让人跟踪，我们得选出多个代表。大家提议，选出两个主代表，六个副代表，六个副代表各负责9个工人。两个主代表决定的事由副代表传达给员工。因以前的资金管理不善，到我们出院时，发现资金已全部用完，所以又要重新集资了。

7月27日晚，开会选代表，由员工投票，员工认为自己信任谁就投谁，票数最多的是主代表。于是当场选出了两个主代表，六位副代表，表决用举手方式。在超霸编辑事件中，关于八大代表的传说就是这样的。我们吸取上次资金管理不善的教训，选出了两位专门管帐的人员，一个会计，一个出纳。代表只管做事，不能管帐。当时出院大家都没有钱，集资很困难，为了节约开支，代表办事能走路的尽量走路，原则上不能坐出租车。代表报账要凭票据，通过出纳核实后，再由会计审查，方能报到帐。这次通过内部的重新管理，我们集资的一千多元钱用了几个月还有结余。我们8个人常开会。开会的前后常有人跟踪，都是政府的便衣。

她们选举代表时戏称在组织工会。在那个时候，工人正式选举代表，又集资做维权基金，本身已经是一种初步组织了。虽然这时大部份工人还在观望，没有参加，但是在这8个代表的协调下，63个工人的行动却变得更有效率。她们每天进厂，但不上班，而是聚在会议室里，商量如何与工厂谈判。厂方无可奈何，只有把她们同车间工人隔离开来。





看得见的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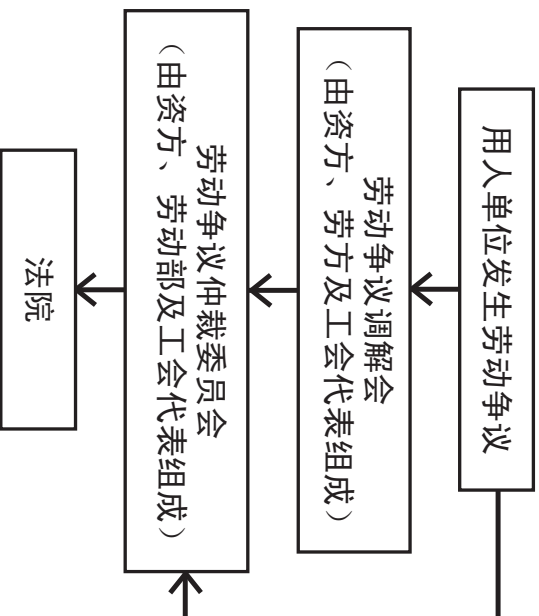
但是她们很快发现谈判对手不只有厂方，还有惠州官员，而且他们才是主要的谈判对手，厂方反而退居二线了。原来，在劳动市场上，除了看不见的手，还有看得见的官员的拳头呢。

惠州政府决定从不同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惠州市处理工人镉超标事件领导小组直接派驻工厂来协助厂方。程湘说：

政府的工作组来自市政府、劳动局、市外经贸委、信访办、卫生监督局、工会等等。它每天派出三四人，同工人周旋，谈判。我们代表常跟厂方见面，但是见得最多的是政府的工作组。

这个领导小组其实名不正，言不顺。根据劳动法，政府在劳动争议中，根本不是成立什么领导小组，而是先由劳资双方所成立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来调解，而在劳动者一方，要包括职

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图





工代表和工会代表。调解无效，再交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部门代表、同级工会代表、用人单位代表组成。劳资任何一方不服仲裁，可向法院提起诉讼。¹¹

市政府一脚踢开法律，连表面上的中立公正也抛开了。这样它就可以为所欲为，根本不理工人，甚至连市的工会也可以置诸不理。

有一天，被派来跟工人谈判的是两名市级工会的人，据工人说，他们的口气比其它官员要好些，说了几句同情工人的话，似乎还暗示，这样拖下去对工人不利，市政府在搞车轮战，拖时间。不知是否走漏风声，总之，那以后政府不再派工会的人来了。

领导小组包括了一些与劳动争议无关的政府部门，例如外经贸委，代表它的是姓叶的某书记。工人们“心理压力有点重，语言有点激烈”，这当然大大冒犯了这位叶书记。她大怒道：你们是不是要存心闹事，如果是存心闹事的话，就叫公安局的人把你们抓去！

谈判从7月15日一直谈到8月第一个星期，期间官员用尽威逼利诱。李小鱼回忆道：

在24号那天，惠州市卫生局的一名科级干部刘劲芳找邓美斯等几名代表，说要谈谈，我们就去了。

我们工人有9个人，从晚上八点半谈到十点半。开始，她跟我们攀亲弄故的，说他自己是非党派人士。最后她说，你们的命比狗还贱，如果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有一天如果被车撞了，在地球上消失，都是很正常的事。后来又装模作样

11 请参看《劳动法》第79、80、81条。





的给厂方打电话，又跟我们说，跟厂方说好了，每人给一万元走人，否则后果自负。

在25号又发短讯给邓美斯，叫不要闹，也不要去上访，更不要去北京静坐，否则对你们很不利等等。迫于无奈，邓美斯只好跑到其它的地方暂避风头。

27号那天，我们跟厂方要求在厂里吃饭，厂方拒绝。在31日市政府带了一批公安，到超霸厂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到厂里吃饭可以，但必须分开吃，并由厂方送到固定的地方用餐”。厂方这样说，引起了大家的极大愤慨，编超标又非传染病，这样隔离摆明了是歧视病人，故意刁难，更不如说是一种施舍。在大家的反对下，厂方才答应可以到食堂吃饭。

另一个工人则说：

有一天晚上，工人代表李青收到卫生监督所一个负责人发来的手机短信，内容大概是：“你们不要再闹事了，最好接受我们的方案，拿一万多元钱回家，如果再这样闹下去，随便安一个罪名给你们，就说你们搞法轮功，把你们抓起来，让你们从地球上消失。或者制造一点车祸，也是很正常的事。”吓得我们好些天不敢出门。

这个时候，工人代表也常常被神秘人物跟踪。程湘回忆：

8月5日晚八时左右，我刚要出门办事，只见一个同事匆匆忙忙走来，对我说：厂门口有几个鬼鬼崇崇的人在打听你们8位代表的住处，她们都躲藏起来了，你快点躲一下吧。不一会儿，我的房东也来了，很为难地说：今天晚上，你们最好别在这里住，很危险。当时我们这里每天都有很多工人出入。因为人太多，可能引起厂方和政府的注意。有一位代





表建议我们俩去老乡那里住一晚。但没有联系上。我们只好连夜赶到惠州河南岸我一位老乡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才敢回住处。

这几位“身份不明的男人”最终找到一位代表的住处，问她：你是不是叫某某。那代表就问他们是谁？有什么事？他们答是便衣，要查暂住证，查这查那。代表说：“我们又没犯法，我们只是病人，要求给我们公道而已。你们找我们做什么？”他们回答说：“是来保护你们的”。

自从7月间谈判陷入僵局，工厂寸步不让，代表们商量要去北京上访。知道这件事情的人比较多，可能传出去了，那以后附近总有些便衣出没。

商量之后，大家决定派我和另一个工友去小金口镇的派出所报案，我向办事人员讲述了事情经过，说害怕那些人把我们杀掉。

科室里接待我们的一个胖胖的家伙凶巴巴地说：“光天化日之下，哪有人会杀你们呢？那几个人对你们又没怎么样。”

我们就答：“是不是真的把我们杀了你们才管？”

胖胖的科员说：“我们小金口的治安非常好，到处都有治安，保安，还有便衣。你说说对你们不利的是什么人？”

我们指着办公室里的两个人说：“好像就是他们。”（原来，进办公室以后，她们认出了这里有两个人就是昨天跟踪过她们的。那两个人听到，赶紧溜出去了。）

第一个方案

8月2日，两名工人拿到轻度镉中毒的职业病诊断。





8月9日，超霸厂和政府的工作组联合打造一个方案，并在会议上向工人宣布。工人一看就感到厂方太小器，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方案的要害其实是引诱他们赶快离职。

这份名为《惠州超霸电池有限公司2004年8月9日员工答问大会》的文件，后来也塞给了先进厂工人，只是换个厂名，改了日期：8月17日。

该方案含6份文件，主要内容是：

甲、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补还工人2年的基本工资及加班工资的差额；

乙、承诺对镉偏高、观察对象和诊断为职业病患者：

1. 按劳动法雇用至法定退休年龄；调离接触镉的岗位；

2. 每年安排职业性健康检查；

3. 可申请“一次性补助金”，镉偏高者3000元，观察对象8000元，职业病患者“个别处理”。条件是：15天内复工，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否则按自动离职处理。

4. 解除劳动合同者，给予经济补偿，按每一年工龄补偿一个月工资；此外补6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提供观察对象每年复检的相关费用。

5. 对诊断为职业病患者（镉中毒），依法给予工伤待遇。

3000元或8000元的“一次性补助金”，成了金山集团时不时挂在嘴边的遮羞布：“厂方提供了高于国家法规要求的补偿。”好像是恩赐给工人似的，只字不提这些钱究竟能抵得受





害者及其子女多久的营养费、医药费，这还不算工人早先自己看病的花费，和自检费用。

而且，由于厂方和医院私设筛选机制，而预先把许多可能合乎资格的工人都筛选掉了：血镉超标后再检尿镉；或者尿镉超标较高者先住院；或者是医院发出“尿镉水平恢复正常”的出院证明，或者干脆不开出院证明。这些工人连复检的机会都没有，最后只能列入“镉偏高”，领取3000元补助之后走人。两厂工人之中，都有许多这样的案例。

工人拒绝这个方案，谈判陷入僵局。8月24日，工人再到广东省政府上访。省政府给工人答复是：工厂逼迫工人在15天内选择是否解除劳动合同，这样的限制不合理，必须改正。这就给了工人多一点时间去继续抗争。有位工人这样总结这次旷日持久的谈判：

在谈判的时候，厂方喜欢用的招术是：

一、拖字诀。管他工人怎么说，尽量往后面拖，一来可以争取时间想好对策，去打通各种关节。二是拖的工人最好两个月，那么时限一过，到劳动部门投诉也没有用啦。

二、厚黑学。开始对工人感情拉拢，我跟你们是朋友，我非常同情你们，我愿意为你们效劳，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我跟老板是朋友，我去做他的思想工作。然后就是，你们太过分了，太让我失望了，你们根本不把我当朋友，我非常非常的伤心。（此为丁总的看家本领，我算是领教过了）。

三、双簧戏。此乃厂方与政府常用之道也，相信众人都深有体会，我就不一一言表，全靠自家心领神会。

另一方面，先进厂的斗争方兴未艾。





先进厂包装部工人为体检而堵厂

在先进电池厂，管理层的拖延战术越来越激发了工人的愤怒。8月13日傍晚开始，五楼组合部四五百名工人也开始了要求体检的集体行动，上晚班的工人最早罢工。

厂里有两辆大货车正在装货，准备出车。员工把工厂大门堵上，像原先装配部的工人一样，把食堂里的长凳全搬了出来，一张张迭起来，垒得好高，比厂门还要高。

装配部员工们在大门外边，目睹了这个几乎是壮烈的场面。

先进厂的厂房还有其它工厂租用。有一辆运泥巴的车因此也给堵着，出不了厂。司机跟工人商量：“耽误了时间，要罚很多钱。”工人就给运泥车放行，可是这就给先进厂运货的司机有机可乘，用绳子把货车跟那辆运泥巴的车绑在一起。最后，工人决定：一律不放行。

几乎所有的五楼员工都参加了行动，除了“当官的”：“拉长没有参加，她们还骂我们呢。”

当地公安局来了，他们从铁门爬进去。可是公安不敢硬来，工人们冲他们“阿Sir、阿Sir”地叫着。只要公安一凶起来，板着脸吼叫着“让开”，工人中间就传出话来：“拍他”，“把他拍下来”。公安便不大敢动了。原来工人们早已准备好不知是相机还是可摄像的手机，对准了这些公安。

市政府的人也来了，包括副市长许光、卫生局局长等人。

这一堵就是十几天：“三楼罢工的时候他们还没那么怕，因为他们把电池拿到其它厂加工。等五楼包装部罢工，那就做不下去了。”





“不这样堵，厂里不会给我们体检的”还有工人这样说：“大家都知道，所以很齐心。”这不禁让人想起那条语录：“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厂方只好答应了工人的体检要求。五楼工人体检时，不像三楼员工那样先检查血镉了，而是直接做尿镉检查。事实上，后来组合部以及充电房的员工同样验出来大批镉超标。

后来，当工人被迫陆续离职之后，厂方特别盯死了当时4名堵厂门时“最刁蛮的员工”，对她们百般报复、刁难。她们把尿镉超标的材料交到厂里，厂方不予理会，不肯给她们办理离职和补偿手续。

在这段期间，工人曾经将金山集团的几位管理人员拦在厂内，要求解决完问题再走。工厂当即以此为借口，关上谈判的大门，声称工人危害工厂管理人员安全。所以先进工人连谈判的机会都没有。

8月17日，政府的工作组召开员工答问大会，提出一个同超霸厂差不多的方案。但先进厂工人一样不接受。





■ 第八章 ■

千里告御状

2004年8月11日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节目为工人们带来希望和信心。但一回到谈判桌上，工人发现，厂方的态度一如既往，只是本来强迫工人15天内接受方案，现在延长到“9月1日之前”。

迫于无奈，超霸厂工人组织起来到北京上访。

我们40几个出院工人开会，多数人赞成去北京上访，有几个人因为担心费用而反对。在8月24日下午，我们一行20多人坐上火车去了北京，开始了为期10天的上访之路，自此跟厂方的协商就告一段落。

在车站窗口，负责买票的工友听见售票员议论说：最近有超霸工人要去上访，所以上面通知到北京的火车票要控制销售。也就是说，一次最多买两三张。连火车是否卖票给工人，当地政府也要插上一脚。

工人只好分头到全市各售票点买票。8月26日下午，28名工人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超霸厂的李小鱼把整个上访经过很生动地写出来，读者可以追随她的足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管窥一下其中的神秘。

背景

8月24日，距超霸召开的编超标员工问答大会15天。也是





在问答大会上，厂方给员工规定，必须在半个月內做出选择，要么继续上班，要么辞职。半个月內未有选择者，也视为自动离职。工人不满这个方案，向厂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在24日上午，厂方代表丁总扬言：“必须上班，否则走人”。

有管理人员大放厥词：“如不服的话，有本事去北京告啊！超霸厂有的是票子”。

去找政府，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去北京上访，看他政府管不管！”大家这样天真的认为。

于是在8月26日下午3点10分，我们上了从深圳开往北京方向的火车。

火车上 我们被软禁在车厢

我们的座位都在二车厢。事情看起来很顺利，我们非常高兴，但也不免纳闷：“这政府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

到了晚上11点钟左右，有几名警察走进我们车厢，要我们出示身份证。当时我们就不肯，问为什么要查身份证，我们又不是犯罪分子。那警察就说，把你们的身份证拿出来就是，我没有理由给你们解释为什么。大家就不理他们，后来有两个人害怕，就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他们了。

他们一看名字就说：“对了，就是她们”。

这时我们就明白了，政府怀疑我们来上访了，但是不能肯定。然后，他们把每个人的车票收了上去。

我们就跟他们争论，那两个人的态度相当恶劣，当时我





就想了一个办法，拿着没有装胶卷的相机对着他们拍照。他们说不许拍照，于是我就收了相机，不过他们的态度也好了一些。

接着，那两个人就说你们把身份证给我看，我们说没带，他说你没带就把厂牌给我看看。没有办法，最终还是让他们查明了我们的身份。然后他们也不查其它的人了，就走了。

过了大概十多分钟，来了两名乘警，说是叫两名代表谈话。我们就问，你们叫我们去谈是代表谁的立场？那乘警说，是代表惠州政府。我们就说，你们不用跟我们谈代表政府，政府对我们的事都无能为力。那乘警看到我们不动，就说，麻烦你们配合我们一下，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上级要我们这样做的。我们后来考虑了一下，去看看也好，看看他们到底在卖什么药。于是我们就挑了两名代表跟他们去了。

那两位工人去了以后，我们担心的要死，恐怕她们会遇到什么不测。再加上同车厢的人，又在跟我们说许多地方的人去上访的遭遇。我们担心火车会不会被卸下来，我们不能去北京。又担心那两个代表会不会被扣做人质，逼我们返回惠州。我们给那两个代表打电话，但她们没接，挂掉了。我们更担心，一时也惊慌起来了。

这时，有人下车了，原来是到了江西。这下我们好了些，出了广东省，政府就没有那么好控制了。那两个代表也回来了，说乘警是奉政府的指令，劝我们不要去上访。但现在出了广东省，他们也徒唤奈何。我们在想，政府现在可能会对我们做些什么呢？

就在我们猜想的时候，乘务员过来了，把我们车厢来了一次大清查。要是非超霸上访工人的乘客，叫他们搬离此车





厢。我们就更加感到惊慌，他们究竟要把我们怎么样呢？

看着人越来越少，我们就要求剩下的旅客不要走，给我们作一个见证。免得我们集体消失了，到时连一个知情人都没有。在大家的一致反对下，乘务员停止了驱人。但剩下的也不多了，大概只有七八个非超霸的人吧！

当时，我们想了各种可能。那些有幸留下来的乘客也在纷纷表示，出了站后，如果政府对我们动粗的话，他就帮我们去报警；如果政府动用北京的警察的话，他们帮助我们去寻找媒体。有的人还把他的手机号码和电话号码留给了我们，说情况紧急的话，就去找他们。但是到了梦萦魂牵的北京后，迎接我们的将是什么呢？

如影随形，我们享受前呼后拥的待遇

到了北京，下了火车，我们被面前的景象呆住了。惠州市政府开了大队的人马过来了！原来他们在惠州赶乘飞机来北京，比我们更早到了火车站，在恭候我们呢！我点了一下，我认识的有：惠州信访局的许某（男性，副局长，此次行动组的组长）、劳动局骆某（女性，副局长）、卫生监督局的喻某（女性，副局长）、经贸局的叶某（女性，副书记）。还有披着卫生监督所制服的我不认识的，一共有十二个人。那些穿着便衣的我就搞不清楚了。

一下车，她们就拦住我们：“跟我走！跟我走！”并拉住一些工人的手，这些工人把手一甩，就挣脱了。

于是有些工作人员就叫“局长，我们拉不住他们”。

那叶局（长）指着其中的两名代表说：“那是头头，跟





着她”。

我们终于冲出了包围圈，与我们同一车厢的乘客看到我们摆脱了政府的拦截后，就放心的走了。

我们暂时跑到了外面，政府的人没有拦住我们，但还是边跟着我们边劝我们跟他们走。“你们要上访可以，我们可以帮你们找地方住”。

不理他。

“你们要去哪里都可以，我们带你们去，那些地方是很难找的，我们可以把你们的上访材料递交上去”。

不理他。

“这外面很乱的，很复杂，我们担心你们的安全问题”。

一边去，还是不理他。

慢慢地我们的人就分开了，政府的人就在叫“他们分散了，我们顾不过来…”。

最终政府的人也放弃了，那叶局（长）说：“他们喜欢走，让他们走，我们不管了，看他们如何找地方。”

我们就冲了出来，并在车站附近会合了。这时我们向着羊纺店的方向走去（我们早就有了准备，住宿是不会成问题的）。我们到了那旅社后，由于我们的人太多，一下子安排不了。那工作人员还是很不错，帮我们联系了其它的旅社，是在前门（真是太好了，前门就是在天安门的附近，政府也决不相信我们能在前门住宿，我保证。）而且住宿也不是很贵。于是我们就在前门附近的一家旅社安顿下来。

妇联门口





我们的第一站是向妇联进发。

来之前我们对上访也有一些了解，多少在心理上有了一些准备。妇联的办公楼是在一个地方，而它的来访接待处又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去的那些部门都是这样，暂且就不去谈论这个问题。

那一天我们很早就兵分两路出门了。我们首先派两个代表去妇联接待处递交材料，其它的人一起到妇联静坐。

妇联有三个门，大门一般不走，职工上班都是走侧门。

我们就来到侧门，大家穿上工衣，开始静坐。过了几分钟就有保安来问有什么事，我们就说是来上访的。门卫就拿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妇联上访接待处：××胡同×号”，对我们说，你们要去上访就找这个地方，这里是办公的地方，不接受来访。我们说，我们已经派人去了，但材料无法递进去，所以我们要见吴仪。

门卫说，“领导还没有上班，你们回去吧。”

“那她什么时候上班，我们见了她就走。”工人说。

“我在这守门几年了，都没有见过她呢，你们还想见她。”

在九点钟的时候，开来了一辆小车，有工人就大叫：“你们看！车牌00000005，至少也是一个国家级大官，说不定就是吴仪哦！”

我们围了上去，“我们要见领导！”

“领导！我们好冤啊，惠州市政府不是人！”

“领导！我们要治病！”

随着车门的缓缓打开，从上面下来几位女人，走路婀娜





多姿，举手投足间极有气质。看到我们堵了上去，一边摇头一边不停的摆手。

“我们不是领导，我们是来做客的。”

然后就进去了，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她们消失在我们的视野。

过了半个小时，有一个女同志下来问了，我们就把情况告诉她。她说我给那边的人打个电话，叫他们先收你们的材料。你们先回去吧。然后就上去了。

过了半个钟，又下来了，看到我们还坐在那里。她就说，你们在接访处递交材料的人已经进去了，那边的同志已在接待你们的来访了。你们还是先回去吧。我们仍然站着不动。

过了一会，在接待处的同事发短讯过来了，说已在跟领导反映情况了。那女的又在劝我们回去，说：“你们还是回去吧，天气这么冷！”

我们说：“我们要等那边的同事反映好情况后再走。”

等到大概十一点多钟，办公的人员开始下班了。这时的天气有点冷，有的工人已经受不住了。我们想再呆下去也没有用的，所以就回去了。

全国总工会

在惠州时，工会是不为工人说话的，不知全国总工会是不是这样？但总之我们决定要到全总去送材料。经过商议，大家都叫我和阿华去。

我们坐104路车，很快就到了复兴门外。下车后，我们东张西望，也不知往哪里走。这时迎面走来一位60来岁、干部





模样的大伯。我们向他问路。他对我们看了又看，说：“你们找总工会做什么？”我把事讲给他听。他说：“现在来北京告状的人很多，其实温家宝和胡锦涛是很重视职业安全的，但是你们的材料递不到他们的手中，在半路就被人卡了。前次东北的工人400多人，为了工资的事来北京，他们拉横幅标语，在大街上游行示威。后来这事闹得很大，很多外国的报社也报导了，这批人在北京解決好了才回去。你们就这几个人……。”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全国总工会，把材料交给了接待人员。接待人员看后，也没多问，就说：“你们的材料我会向上反映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但你们的事情，终究要回广东省解决，北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们还是回去吧……”

我们原以为全国总工会与惠州不同，会提一点意见给我们的。哪里知道，说来说去没两样。我们只好就这么回到住处。

永定门甲一号

在北京找地方的时候，听说有一个上访村。是专门上访的人住的，而且房租住宿都相当的便宜，有五元一晚的房子。我们动了心，这次来我们是打算多呆一段时间，直到问题解决为止。而且国务院来访接待处是在永定门甲一号，也是在附近。所以我们就派了几个人，一是去国务院信访办探路，二是去上访村看看，能否找到合适的地方住。

我跟同事一行几个人，从前门坐车到游泳池下。到了游泳池站后，我们却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永定门。后来问了路，我们往永定门方向走，走了大概有五六百米远的地方。





看到好多车，旁边的马路上坐了好多人。

我问阿英（与我同行的工友，后来我们都怀疑她被收买了）：“这么多人在干吗？”

“可能在举行什么活动吧，反正北京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她答道。

我们一直往前面走。一边走，边在寻找“永定门甲一号”的门牌号。十五号，十四号……七号，六号，五号，四号，三号，二——号。咦！怎么到了尽头？也许是我们走得太快了吧，我们又倒了回去。也是没有找到，又倒了回来，这样往返了几次。我说看来不问路是不行了，我就到旁边的商店买了一瓶水（在广东的经验是你不买东西，你不会得到满意的答案）。

然后我就问：“请问，永定门甲一号在哪里啊？”

“前面就是啊！”

“我们找过了，没有啊！”

“就在前面了，好多人那里。”

“怎么没看到门牌号啊！”

“是不会有门牌号的，一直都没有。”

我们就到了人最多的地方，还真有一条路，是一条像山沟里的泥巴路。两边站了很多，我们装着没有看见，就往里面冲。

“干什么的！不许插队！排队！排队。”好几个人在那里吆喝着。

我们没有出声，直接的往里面走了，那些人也沒有阻拦。一路上的人，看到我们都问：“哪儿的！哪儿的！”





我们一直没有吭声，也很纳闷：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多人。我们想倒回去，但又不甘心，走到底再看看。

走了大概四百米左右远的地方吧，看到一铁门是关着的，只开了一个小门。上面旁边有一个小木牌写着“永定门甲一号。”就是这里了，我们高兴的要命。

但是有一个军人在把门，我还是不大敢进去。透过小门望过去，依稀看到挂了一个牌子——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看到有人进去了，那军人没有阻拦，我们也大胆的进去了。

走进大院，我脱口而出：“啊，火车站。就跟我过年回家时的火车站差不多，人多而且杂乱。我好像闻到了火车的味道，仿佛要被这气息淹没。恍惚间，我好像要踏上回乡的归途了。

走进大厅，简直就是一个售票厅嘛。整个大厅有许多的窗口，每个窗口前面有铁栏杆护着，窗子的上方都有一个横牌，有的是湖南，有的是四川等等，反正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份。

在窗口排满了人，他们的脸上写的是沧桑，还有一种急切盼望。我发觉，东北三省的最多，其次是河南山东，再次就是湖南四川，广东的最少。是不是广东没有人上访就代表广东是最好的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广东是最有钱的而且是最没有人性的地方。

我们就问了那民警的基本程序，然后就由阿英去排队。去窗口拿顺序号，然后又到一个会议去等待。大概半个小时后，轮到我们进了，里面又是一个小室，有两个工作人员记录。问你从那里来啊，什么事啊，然后就说，好了回去等通





知吧。问什么时候有结果，回答的是一般三个月。

我们走出了大厅。

这时阿英说：“你看那个人。”

我掉过头去看了一下，又赶快扭回来。那是一个中年妇女，裸露着上身，有一个乳房已经没有了，只是还有一个黑洞，仿佛在嘲笑这个世界，黑洞里灌满了脓。她的面前地上放了一张纸，上面写的是什麼，我已经不敢去看了。

依然穿过密林的人群，来到了大街上。街两边坐满了人，停满了警车，上面的车牌号显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我们就在旁边休息了一下，也顺便看了看周边的人，再说我们还要问问路，去上访村看看。



国家信访局接待站



派人探好了到国务院信访办的路以后，我们再次出发，去碰一下运气。听前去探路的同事说，那个地方很糟糕，必须要男同事一同去才行。我也不知道是怎样的糟糕，就叫上了长得人高马大的男同事——小朱，也是上回去探过路的——与我同行。我们早早出发，凌晨7点10分就到了“游泳池”站，下了车，看到公路两边停了很多警车。我们沿着停警车的路一直往前走，越走越偏僻，越走路越窄，越来越难走，我都怀疑是到了乡下。“还有多久啊”，我禁不住问了起来。小朱指着前面说：“就在前面”。我睁大眼睛望去，依稀看到前面堆了一大群人，好象是在打架。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大娘，身上的衣服破旧得不成样子，被一些中年汉子推过来又推过去。老人家的脚没站稳，一头





栽倒了，坐在地上又哭又骂：“你们这群流氓，不得好死！我儿子死得好惨，你们不让我告状……”只听人群中有人高呼：“把她抬走！”随着呼声，老人家已被几个五大三粗的中年汉子抬着走向了警车……。

我们继续往前走，突然被人挡住了去路：“你们是不是截访的”？我第一次听到“截访”这个词，觉得很新鲜，就问：“什么叫截访？”人群中马上有人叫嚷：“挡住他们，他们也是上访的”。马上有几个中年汉子过来把我们拦住：“你们是什么地方的？”我仗着自己有理，说：“是哪里的与你有关系吗？”接着人群中就有人在敲我的头。我还没有回过神，又被谁推了一掌。小朱人高马大，站在人群中比别人高出了整个头，他一手把我拉到身边，说：“她是与我一起的，我们是广东省的”。

“是广东省的，你早说嘛。”

人群让开了一条路……

挣脱人群，我们继续往前。这一路，两旁坐满了中年男人。他们坐的凳子是我们家乡补靴用的小板凳。我正纳闷，小朱指着前面说：“你看，已经到了。”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看到的是只在电影中才见过的悲惨画面：如春节时火车站一样的场面，人山人海，全部是40岁以上的，没有一个年青人，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沧桑和无奈，衣衫破旧，时不时飘来一股难闻的臭味。不远处，又有人在打上访的人，那挨了打的发出悲惨的哭泣声……还有很多已经排好队了。队伍旁边有一块巴掌大的牌子：“国务院信访接待室，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





站在人群中，我和小朱是最年轻的，而且在上访者中算是穿得最体面（其实我们穿得很普通）。可他们都是多年上访者，身上的衣服都穿得破烂了。难怪那些拦我们路的人认为我们是截访而不是上访的人。我们排到队伍后边，前面是个大娘，约60来岁，一脸的饱经风霜。她告诉我们她上访的经历：“我是湖北人，我女儿被当地公安局长的儿子强奸，然后自杀了……当地的司法太腐败。整整四年，为这事，我已经倾家荡产了。”后来她又谈到进信访办这条路两边的警车，原来是全国各地驻京办的警车，专门抓那些从当地到这儿上访的人，强行把他们遣送回家；至于坐在信访办路边的那些人，就是全国各地方驻京办的人，也就是所谓截访的人。今天还算人少，因为快国庆了，北京地方公安正在把那些上访者驱逐出北京城，已经清出去很多，要是不排队都排不到。她说她住在上访村，问我们有没有地方住，如果没有，可以跟她一块去上访村住，很便宜。她都住两个月了……。

上班的时间到了，信访办的门打开，人群如潮水般涌进去。一个钟头后，我才得以进到门内。里边分了很多窗口，每个窗口前都排满了人。我们找到了广东省的窗口排起来。还没站稳，就有几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冲过来问：“你是哪里来的？”上回吃了亏，这一次，我没有顶嘴，就说：“我是中国的。”

“中国的不许在这里排队！”

那几个人气势汹汹地吼着，把我推出了队伍。有一个还举手要打我，我大喊“救命”。小朱赶紧把我拉到他的前面排队，说：我们是一起的，是广东省的。那几个人看到足足





高出他们整个头的小朱，不敢惹，悻悻地走开了。现在我才知道探路那俩同事说的话，真是很有道理，没有男同事一起去不行。小朱这次真的立功了，没有他，我们这些女流之辈还没办法到国务院信访办来递材料。

好不容易轮到了我们。但填完表，又得重新排队。排到窗口时，已是上午10点了。我们被告知在第8接待室，飞奔到目的地，在这里又要排队。我们在8接待室外坐着，一直等到10点45分，一个40来岁的中年妇女才接待了我们。

我们递上材料。她一脸不耐烦：“什么事？快说！”我就把我们的事讲给她听，她不时打断我：“快下班了，长话短说”。我只好大概地把事情说了一下。说完，她眼皮也没抬：“回去等消息”。

回来的路上，听到旁边有个截访的人叹口气说：“我想申请提前退休算了，这样的工作真是难做。不这样对待这些人，上面又压我们。如果这样对待，心里又过不去……”是的，这些所谓驻京办的人，在不知情的人们眼中，都以为干的是多么体面的工作。但是来上访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工作多么可恶！可不做的话，又会失去工作。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甚至有的人已经麻木了。我们的心情也很沉重。

没有想到，这次上访北京，竟然是如此糟糕。

国家劳动部接待站

上午去过国务院信访办后，下午我们就往劳动部去。我们坐上110电车。在和平里火车站下了车，便直奔劳动部接待站。





劳动部的工作人员看了看我们的材料，说：“你们多少个人过来的？”我答：“就我们两个。”这时，一名40多岁的男人走出来，大声叫道：“二十多人的代表请进来。”我们随他进了接待室。那个男人满脸不高兴地冲我们说：“你们不知道上访的人不得超过5个？你们来了二十多个，这是犯法的！”我心里奇怪，到劳动部来的就只我们两个，他怎么晓得我们总共有20多人来上访？看样子，惠州市政府的人已经事先跟他们沟通好了。

他把我们的材料翻了翻：“这事情，你们只能找当地政府解决，怎么找到我们来了？我们又不能在北京给你们解决。再说了，你们也只能找卫生部门处理这事。”

从劳动部回来，我们的心更沉重了，不知道应当找谁好。

上访村

这次北京之行，最让我难忘的不是天安门，不是中南海，而是上访村。最难以忘记的是在上访村里的那些访民。

我们顺着一条小沟往上访村走去，天是蔚蓝色，水是清澈见底的，一阵清爽的秋风吹过来，带着阳光的味道，似乎冲淡刚才的不快。我们穿过一个桥洞，那里铺了几张席，放了几个碗，还放了几个锅。锅的旁边是棵白菜，摆着一副憔悴的面孔，在向我们的注目礼。我们也不感到诧异，反正这种情况见多了，我猜测，可能是丐帮的人住的地方吧！

过了桥，出现了岔路，我们又开始迷糊了。这时，从我们后面匆匆走来一个妇女，我就叫住她，并向她打听情况。她停了下来，并且非常热情的给我们介绍这里的情况。





当知道我们是来上访的，就更热情了，她说她也是上访的。听说我们要去找五块钱一晚住宿的地方，她说是有的，不过太贵了。像她现在还好，住的地方不要钱，一个月就花点生活费才几十块钱。

我就问：“那你住在那里？”

她朝我们刚才来的地方一指，“就是刚才你们经过的呀！我看见你们走过了。”

原来是我们经过的桥洞下面。我就问，那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她说，我的材料已经送到国务院了，现在我们在等消息。我说要多久啊，她说要三个月。语气里洋溢着如释重负的轻松。说话间她到了地方，我们就此告别，看着她的背影默默的为她祝福，祝她如愿吧！虽然现实是残酷的。

看着前面的大街小巷，我们一条一条的穿过，到处寻找那五块钱一晚的佳境。一路上看到许多旅社，我们问了价钱，跟我们住前门的差不多，都觉得还没有在前门方便，所以就放弃了。

不知不觉中，就来到了一条小巷，人看起来很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就跟家乡以前开社员大会差不多。有的人在前面地上放了一张大纸，写的是自己的冤屈。有的人在向别人询问，互相交流经验。

我们在一人前面蹲了下来，上面写的是医疗方面的事。

我就说：“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到卫生部投诉。”

“那卫生部在哪里？”他赶快掏出一支笔出来。旁边有人看到我们在谈话，就纷纷围了上来。

“帮我看看！该去找哪个部门”

“劳动部在那个地方？...”





一下子递过来了好几份材料，我们还真忙不过来了。

我就问：“你们真的不知道去哪些部门吗？”

“是啊，北京那么大，好难找的，我们只知道去国务院就行了。”

“那你来北京的时候都没有准备好吗？”我同事问道。

“我只知道来北京，什么都可以解决的，哪知道这么难啊。再说又没有多少钱跑，我来的时候是把家里的老母猪卖了，才凑齐路费的。”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现在还搞不清哦，反正是告不倒就不回去，这样回去会被他们整死的。你们是领导吧！”

“哪里哟，我们也是来上访的。是在广东工厂打工，职业病中毒，政府不管，我们只好来上访了。”我们苦笑着解释。

“那你们要小心一点，听说广东人坏的要死。”

有一位妇女拿了好几封信给我看，一封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收》，另一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胡锦涛主席收》。还有几封是国家其它的领导人，只有一个名字，什么地址也没有写。估计她认为那么大的官是不用写地址的，谁不会认识那几个领导啊。字写得苍劲有力，看得出是请了乡里有名的秀才写的。

我问：“你写这些信他们收得到吗？”

“不知道，不过只要收到一封，那些坏人就死定了。”他很有信心的样子。

也许他们不知道，听说信访局每天都要烧掉几大麻袋的信。都是从全国各地发来的投诉信，更别说他那没有地址的信。也许有那么一天，会出现奇迹，来一个现代版的康熙微





服私访记，那么她的冤屈或许有一些希望。

说了那么久，我们看到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就从人群中抽身，去寻找那五元一晚的地方，这才是我们要来的目的。

在他们的指点下，我们来到了挂着“有房出租 五元一晚”的房东那里。房东是个老北京，非常的热情，问我们有什么事。当我们说了我们的来意后，他上下打量了我们一下。

摇着头：“那不是你们住的。”

后来在我们要求下，带我们去看房。

拐过几条小巷，来了一间低矮的房子面前。“喏！就是这个。”我伸头朝里面看了一下，吓得我把头又缩回来。里面一排溜的铁床，上面睡的全是男人。这根本就是在广东建筑工人的翻版嘛！不同的是他们脸上是无奈，又是写满了等待。看到我们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了头。不像在广东，相当一部分的建筑工人，只要一看到女孩就会调侃几句。

“那边还有三元一晚的，你们要不要去看看？”

看到我们的神情，老板试探着问。

“要的，带我们去看看。”

反正我们已经来了，去看看也行啊。

老板就带我们走向另外一间房，里面没有人，一股浓厚的酸臭味飘了过来。我捏着鼻子朝里面看了一眼，整个一个房间是一个通铺。分为上下两层，席子也没有。给人的感觉就像在菜园子里种大蒜。

“老板，那到哪里上厕所啊！”

虽然知道自己不会到这里找地方住了，还是很好奇的问了一下。





“那边有一个公共厕所，很方便的。”

老板指了一个方向。我们有一位男同胞说要去看看。

我们走了大概有三百米的地方，在一个垃圾堆旁边，有一个厕所，上面歪斜着粉笔字“男”、“女”。那男同胞就忙跑了过去，几分钟后回来。

我问：“感觉怎么样？”

“可能会三天吃不下饭。”

说到这里，可能大家会认为我有点离题了，怎么好像是说别人上访的事。更有的人会认为，我们这些人是小题大做。是啊，在那几个小时里，我们都忘了我们是来上访的。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好像幸福多了。但是两年后、五年后、十年后，运气好的话，十五年后，当“痛痛病”在我们身上肆虐横行的时候，我们敢说我们是幸福的吗？

时候不早了，我们准备回程。走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没有那么强烈。吹来的风还带着丝丝凉意，真担心在桥下住的那些人今晚会不会冷。天依然是蓝色的，水也是清澈见底的，而我的心是沉重的，只想骂几句粗话。但我只能对着这如斯美丽的河山，张开我的双手，大声喊道：

哦！伟大亲爱的祖国！

哦！多苦多难的百姓！

到卫生部的第一次

那天我们坐了车回到前门。在离旅社三四百米之处，我收到一条短讯，说是现在有警察查房，叫我们暂时别回去。我们只好在外面等着，大概两小时后，又来短信说警报暂时





解除，可以回去了。

进房间时，她们说警察刚刚走。我们商量着要搬地方。

老板看起来有点舍不得这份生意，说：

“现在你们政府知道你们在这里了，不管再搬到哪里都是一样。计算机上一查就知道了。还不如就住在这里，我们会尽量优惠给你们。”

我们想想也是。再说刚才警察查房的时候，工友也派人去其它的地方找了房子，都差不多。反正政府都会找到我们的，还不如就住在这里，老板也可以照顾我们一点。

第二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卫生部。头一件事，仍然是派人到卫生信访办送材料。送材料的事派到我和阿英头上。我们找到了卫生部的信访办。

在卫生信访办的门外，坐着一个40多岁的男人，脚已断了一只。他也是来上访的，胸前挂了一块大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他的冤屈。他对我们说：“我的儿子因医疗事故而死，在当地无法解决，我已上访三年了，为了告状，我现在一无所有。当地政府为了阻止我上访，把我的腿都砍断了（他指了指断腿）。你们要小心一点，那么年轻，不要被政府的人害了……”

我们把材料交了上去。接待员还是那句话：这件事情我们会反映上去，回去等消息吧。

我们毫无办法地又回到住处。

怎么办？要等多久才有答复？想来想去，我们决定去卫生部静坐，也许他们会早点回复我们吧。

像上回一样，我们身着工衣，来到卫生部门口。那个断了脚，胸前挂着牌子的人仍坐在那里。我们也不找那些保





安。大家就在大门口的一侧坐下。

很快，路过的行人纷纷驻足下来看着我们。没多久就是一大群人了，都在问：“咋啦，咋啦。”有人凑近来，看我们的厂牌：

“惠州超霸电池有限公司，是哪个地方啊！”

“是广东省。”

“从广东来，真远哦！”

有的工人把自己的病历给他们看，有的在给他们讲镉对人体危害；有的人在说厂方对这件事的冷漠无情，有的说地方政府的腐败袒护；情绪激动一点的就在旁边掉眼泪。

这时保安出来干涉了，我们就把材料给了他看。他就拿了进去。过了半小时多一点，看到卫生部门口来了一辆车，惠州政府的一班人马出现了。看到我们，装着没看见就往前走。

我们就围了上去：

“你们来干嘛，是不是抓我们啊！”

“是不是又来给卫生部送钱啊！”

有一个工人说：“你们看到我们为什么不给我们打招呼啊！是不是心虚？”

这时那卫生局的副局长大人终于回头了：

“我不跟你打招呼，你又想怎么样？要我赔偿你们的损失吗？”

然后就进去了，我们正准备追上去。这时保安叫我们过去，要派几个代表反映情况。我们派代表去了一下，也是象征似的登记了一下。

我们继续在外面等着，这时我们看到市政府的人了。他





我们不敢从大门出来，从后门溜了出去。

我们在外面坐着，看到中午又到了，可能也没有什么指望了。

我们就坐车去羊纺店，在羊纺店医院和旁边的一个花园之间，就是《今日说法》的办公场所。因为《今日说法》对我们进行采访的时候，说了对我们会跟踪报导的。我们希望能找到为我们报导过的记者——孙婧梅。也许是怀着一点希望吧，我们又是在那大门口站着。

保安来问了我们，我们就把情况跟他讲了。然后就有一个女同志下来了，我们就说要找孙婧梅记者。她说已经去外地采访去了，又让我们派两三个人去谈，其它人就在旁边的花园里等着。

于是几个人上去了，那女同志很和气的问话。这几天我们到处受白眼，一下子听到这么温柔的话语，简直就像春风一样，弄得大家的鼻孔痒痒的。当说到这几天的遭遇，说到将来，说到情急的时候，大家都哭了。那女同志也在陪着大家哭，然后她就把媒体的难处也跟大家说了。最后就说，你们回去吧！我会把这些情况向上面的人反映。

于是我们把大家叫上，就坐车回到前门了。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接待室

今天已是来北京的第六天，该去的地方都去了，事情仍没有一点进展。我们把地图拿出来，这里瞧瞧那里瞧瞧，发现还有国家安监局还没有去。大家决定这回派我和阿芳去。

从前门走路到北京饭店，在那里坐上1044快车。到兴化





路下车，远远看到“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牌子。保安说：“信访办？哦，在那边。这里是办公的。”幸好“那边”没隔多远，我们很快找到了信访接待室。

接待我们的的是一个40多岁的男子，姓李，他很和气地为我们倒茶，亲切地问我们是怎么回事。这几天看惯了接待人员的嘴脸，心里很失望，这位却非常和气。我们的心里不禁又感动起来。我从头到尾说下来，当讲到“我们刚走上社会，就进了这家厂，那时是多么健康的小女孩。我们为超霸公司服务多年，献出了青春和热血。现在，却变成了这样体弱多病……”我和阿芳禁不住掉下了眼泪。那接待员竟也跟着我们哭了。

没多久，惠州市政府的人赶到了，一进门就冲着我们说：“你们真的很厉害啊，这个角落你们都找到了，我们开车找了很久才找到……”

那接待的人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告状都告到北京来了！你们要多为工人想一想啊，她们是很苦的……”惠州市政府的几个人连连点点头：“那是，那是。”接待员回过头跟我们说：“如果惠州市政府没有给你们解决的话，请打电话给我。”于是让我们抄下他的电话号码。

回到住处，一切还是原样，惠州市政府并没有让步的意思。

想起国家安监总局那位接待员说的话，第二天，我们又一次找上门，找到昨天那位接待员。这次，他也是一脸无奈，说：“你们要回当地去解决，在北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们还是回去吧……”也不听我们解释，他就忙别的去了……我们只好失望地回到住处。





政府出现在我们的房间

到了旅社，冲好凉，吃过饭，大家围坐一起，讨论明天该上哪里去。

这时有工友说：“市政府家伙来了。”

我们朝窗子外面看，真的来了好几个人。过了一会儿，就来到了我们房间。走在最前面的是许某，然后就是卫生局的，劳动局的，那个经贸局的叶某走在后面。最后是一个男的，我不认识，因为他不大爱说话。我们以为是一个司机来的。后来回到了惠州，才知道是惠州市公安局的李科长。

这时那个信访局的一进来笑嘻嘻的说：“哈哈，你们还好吧，找的我们好辛苦哦！”

大家用眼睛瞪着他，没有人搭话。

这时，那叶某进来了，一声不吭。

阿芳叫了起来：“啊，你又来了，是不是来抓我的啊！”

那人怪有点不好意思。

这时，那喻某走上来说：“啊，阿芳，你的鞋好靓哦，多少钱买来的？”

阿芳这两天鞋子都跑烂了，去买了十块钱一双的绣花鞋。

劳动局的那一个拉着阿芳的衣服：“你这件也很好看，哪里买的？告诉我，我也去买一件。”

他们左一个靓女，右一个靓妹，弄得阿芳骂人的话也骂不出来了。

那叶某给阿芳灌了一大堆迷汤，然后就在那里说：“我





还以为你们没地方住，想不到你们找了一个好地方嘛！”

这时我们的工友开始向那徐某开炮了：“你们来干什么？谁叫你们来的！”

“我们是来看看你们有没有地方住，有没有钱用嘛！”

“是想来抓我们回去的吧！告诉你们，事情不给我们解决好，我们就到天安门静坐。”

“你们要去哪里上访，我们陪你们去。天安门很复杂，你们千万不要去那里静坐。”

“有什么事，回惠州解决，我们政府一定会帮你们的。”几个女领导也在说。

“要解决就在北京解决，解决好了我们自然回去。”

“在北京肯定不行啦，人家厂方又不在。”那女人说。

“那你们叫厂方派代表来北京谈！”工人的态度很是坚决。

“那好吧，我们去向市长反映一下，然后再要求厂方来谈。”

这样政府一直守到8点钟然后就回去了。

第二天晚上，他们又来了。一个人去一个房间，来各个击破。那徐某来到了我们房间：“嘿嘿！你们今天去了那里啊！”

“去了哪里，你还不知道吗？不是我们去了那里，你们就跟到那里吗？”我没好气的回答。

“喂！老家伙！你是不是收买了我们的人，做你们的内奸？为什么我们去哪里你们就跟到哪里？”我们的工友开始向他开炮。

那老头只是笑。





另外几个人就去找三个广东籍的工人，力求他们回去。那三个广东人就跑了，躲到别人的房间里去。于是那个叶某和喻某就坐在她们房间的沙发上，来一个守株待兔。还有一个劳动局的路某，就在另一个大房间里进行攻心战术。

那天晚上，到了11点钟那些人还没有走。我就说：“哎！各位亲爱的领导同志，你们还不走，可太晚了哦！”

那徐某说：“没事，现在我们搬过来了，离你们不远，可以随时照顾你们。”他们现在从王府井搬到前门来了，但不敢靠我们太近。

“是随时抓我们吧，随便了，大不了去天安门静坐。”
“看你们说到那里去了，好吧，你们好好休息，我们明天再来看你们。”于是他们终于走了。

第二天，同样的时间他们又来了，还增加了几个人。是韶关办事处和连平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这次他们的重点是把那几个广东人先弄走。

他们一来就把房间堵住了，大概到了12点左右，终于把他们接走了。也是安排在旅社里面，不过是高级的，而且在我们返回的时候，我们坐的是火车，而她们坐的是飞机。

接走了几个人，我们的军心也开始有点动摇了。而且我们的财政也出现了危机，在广东省职防院的工友筹了一点钱，才让我们暂时渡过了难关。

把几个广东人弄走后，他们就开始向我们这些人进攻。在那个比较大的房间里，我们开始了。

首先是骆某发言：“你们说要厂方来北京谈，厂方不答应。”

“不会是你们政府的说法吧！”





“你们不是同厂方穿一条裤子的吗？”

“嗨嗨！看你们说到哪里去了，我们一直站在你们工人的一边的啊！”那徐某打着哈哈说。

“那你们说如何办，这个事情可得你们政府处理才是。”

“我们政府一直都是在跟你们处理啊，你看我们不是跟你们来北京了吗？”

“你是来帮我们处理吗？你是来处理你们的事情吧！你们怕你们的事暴露了，官帽子就会丢掉。”

这时那路某发言了：“你们最好提一个方案，我们发到惠州去，让他们考虑一下。”

我们就拟了一份方案，他们就带走了。这天那喻某跟叶某很少哼声，估计是不想跟阿芳交战。

这两天我们中间有一位代表没有同我们一起出去，说是男朋友来了。至于到底去了那里，我们并不知道。只是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我们中间的人出了问题，但究竟在那里，我们一下子也找不出头绪。

第二天晚上，那些人如约而至。那路某拿出我们的方案说：“你们的方案太高，厂方不同意，你们能否降低一点？”

我们就说：“已经够低了。”

有工人就说：“那你帮改改看。”

于是那人当场就在那里改了，并承诺应该可行的。

但是在他们走后，打电话来跟我们说，那方案不行，惠州政府和厂方已经出了新的方案。但我们问是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案，他们不肯讲，要我们回去一切就知道了。





雨和泪，卫生部第二次

这几天，可以跑的部门都已跑过了。我们派人到北京的职防院做尿镉检查，但是这家医院以检查材料需要到美国进口为由，拒绝了我们的申请。

我们在前天晚上，做了一点准备。拿一块白布，标题是——镉侵入我们体内，我们不能坐着等死。写上我们的基本情况，打算到卫生部去静坐。第二天，我们全部都去了。跟上次一样，穿上工衣并戴上厂牌。

我们来到了卫生部门口。这次我们也没有去找保安，直接坐在大门口旁边。两个工人站在前面，一人拉着布的一头。那天是一个阴天，我们感觉到的是丝丝寒意侵蚀着我们的心。

我们站在那里没有多久，就涌来了一大群的人。半个小时后，惠州市政府的人就来了，还加上惠州驻北京办事处的曾某。

我们的那块布也放不了多久，就被保安收走了。

没多久，来了一个警察，拿出笔来，问我们的名字，说要登记。我们都不肯说。我问：“为什么要登记我们的名字？”他说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

市政府那些人把我们的名字一个一个全说出来了。他们笑嘻嘻的站在那里，每个人找几个对象搭话。我们都不理他们。偶而有一两个人跟他们搭腔，别的人就盯着她看，她明白过来，也就不理那些人看了。

那些人觉得很没趣。

这时，有一位女同志到我们这里来，问我们是什么样的





情况。这个女同志看起来倒是蛮有气质的，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说真的，我真希望能有一个现代版的康熙微服私访记。我们就给她说了我们的情况，并且拿出资料给她看。

那几个政府的人开始紧张起来了。

他们嘀咕了一下，由那个曾某去跟她对话：“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干什么，跟你有关系吗？”

“把你的工作证给我看看？”曾某问。

“凭什么要我拿工作证给你看？”

“那你不要在这里呆着。”

“我在这里呆着，管你什么事？告诉你，我最恨广东人，广东人坏得要死。看你那双眼睛，就知道你不是好人。”

确实的，那个姓曾的眼睛是我见过最毒辣的。就像眼镜蛇一样，如果他盯着你的时候。即使他笑起来，也是闪着寒光。

我们就跟曾某吵了起来，最后那女的走了。临走之前对我们说：“你们要坚持到底，广东人最坏，你们要保护好自己。”

起先市政府的人非常担心，怕那人是某个部门来了解情况的，或者是记者。后来他们在那里哈哈大笑：“我原以为那女的挂的是工作证，原来是月票，害得我们虚惊一场。”

看到他们那得意的样子，我们更是恼火。

这时，卫生部出来一个人，通知我们工人派个代表去反映情况。大家都选我去。





接待室里有三个接待员。市政府那边有卫生局副局长、劳动局的副局长、信访办的局长共三个人。接待员中一个40多岁的男子凶巴巴的对我们吼道：“你们这么多人在卫生部门口吵什么，你们知不知道这样影响很不好！说吧，什么事？”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说出来，并且拿出市卫生局2004年6月2日的卫生评估报告给他们看。一个女接待员很不高兴地说：“这里只有几个地方超标，其余都合格，应当不会影响到你们。”

我说：“我们就是在这几个不合格的地方工作。”

那个接待员没话说。她们就回头数落惠州市政府的人。因为我们几次在卫生部静坐，已经让这个很爱面子的卫生部对惠州市政府颇有微词了。可是，关于这份有几项化学超标卫生评估报告，接待人员竟认为“是很正常的事”。唉，我们真不知该怎么办。而到了最后，他们留下的，还是别的信访办人员每次都说的那句：“事情是要回广东省去解决的，在北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又一次无可奈何地走出接待室。

回原地绝对没有我们的好果子吃，我们也明白。

但没有办法，我们真正的完全失望了。

天开始下起蒙蒙细雨，洒在我们的头上，洒在我们的脸上。慢慢地，形成涓涓细流，顺着发梢，滴了下来。

开始有人在哭泣了。

“天空下着雨，我的心在哭泣……”我虽然没有流泪，但好像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唱着。

那门卫好像有些不忍心，来叫我们：“你们不要在这里





哭了，情况你们已经给领导反映了。再说你们政府的人也走了，你们在这里没有用啊！”

听到他的安慰，我们哭得更厉害了。

另一个门卫又说：“天气这么凉，你们可别感冒了，你们的事我们也很同情啊。你们不要站在雨中嘛！这样对身体不好的。”

我们就站在门口。这时有个工人提议：“你们拿我们的那块布呢？快还给我们，我们下次还要用。”

有一个保安答应帮着找找。但他们已交过班，换了新门卫，说不知道。我们大家叫着：“还我们布，我们要布。”

最后来了一个官员模样的，谁知道是什么级别的，反正北京的官最多：“你们的那块布被你们市政府拿走了。你们回去吧！他们答应回去给你们解决的。”

想到这次来北京的遭遇，再想想要面临的将来，我们都忍不住又哭出来了。我本来是没有哭的，但这次却也是如洪水般倾泻。这是绝望的声音，我们除了到北京上访，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一直充满信心的我也开始绝望了。

下午五点钟，人家都下班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只有回去了。

回到旅社，还有一块白布，我们又继续写了同样的一张。打算在最后关头到天安门静坐。

无奈之下我们返回了

当时的情况已非常艰难，身上几乎都没有钱了，大家跑了几天，信心都已耗尽，个别的人开始说着要回去了。阿英





站出来游说大家回去（后来我们都认为她是叛徒，给市政府收买了）。当时我们一点没有怀疑她。她呢，还一直在说另一个人有问题，说得我们将信将疑。

有好几个人想坚持，但大家都人心惶惶，一时控制不了局面。最奇怪的是，政府的人天天来，今天却不来了。第二天，有人向他们报信，说我们都打算回去。

政府的人高兴死了，来了。却故意毫无表情的说“我早就叫你们回去，你们要赖，现在要找我们了吧！”

直气得我们牙根痒痒的；“那就算了，我们明天去天安门静坐。”

现在是那李某打圆场：“那就回去吧。你们整理好东西，今晚就走。”

我们垂头丧气的走着，每隔几个人就有政府的人跟随着。一个政府的人带着几个工人打的，然后就到了火车西站。

到了火车西站，我们在等火车。那叶某：“告诉你们，其实你们是上访的人当中最惨的一个，你们知不知道，人家上访都是政府出钱的，你们倒好，自己出钱。”

“我以为你们来北京，会有……，原来是这样，我们虚惊一场。”那喻某也不甘落后。

这时那徐某跑过来了：“没有卧铺了，你们坐硬座算了。”

我们不答应，那叶某：“是你们要求回来的，我又没有叫你们回来。”

真把我跟几个工友气得要命；“那算了，我们回旅社





去。”然后就把我的包拿了起来。其它的工人也纷纷拿了包。这时那徐某说：“不要那样嘛！我再去问问。”

在他走的时候，那几个女当官的又来调侃了。首先是跟

阿芳：“靓女，你回去准备做些什么啊！”

“又能干吗呢？我中毒了，那里找到事做啊！”阿芳看到她就是气。

“你这么靓，到时找喻局没有问题啦！”

这时那叛徒也插了进来：“那我呢？”

“你也没有问题啦，你身材那么好，到时叫她们给你找个部长千千。”

这时，那徐某回来了：“到时间了，你们跟我们上车吧！”

我们在那些人的押送下，上了车。上了车后，那几个女领导就下去了，她们要坐飞机回去。我们没有用政府的钱回去，而他们却是“你们不用，那只好我们用了”，用公家钱住高级宾馆（据说几百元一晚上），回去坐飞机。

上了车，每到一站的时候，那徐某就跟李某把我们看得死死的，生怕我们中途下车。这时鸭子说：“我要下去买东西。”

那李某就说：“你要买什么？我帮你去买。”

“嗯，不知道。”

那李某就下去了，帮买了一些零食和水。反正就是不让

我们乱跑。

有工人问：“李科，你说，我们回去后，政府会如何对待我们？”





那李某略停顿了一下：“如果是我，肯定会报复的。”

那徐某也来跟我们搭腔。他们就说：“徐老头子，我们回去后，你们如何对待我们？”

“肯定是帮你们啦！”

“少在那里吹牛，我知道。到了惠州，就是——我的地盘，听我的！”我在那里咬牙切齿。

那两个人在那里听了哈哈大笑。

最烦的是我和阿芳了：“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回去。”我说。

“是啊！我都不知道如何跟厂里面的人说，唉！”阿芳也是垂头丧气的。

一夜无话。第二天下午我们回到了惠州。

我的地盘 听我的

在9月7日晚上，我们来到了厂方会议室等候。到了八点半，市政府终于来人了。是那徐某同据说是市政府的一位秘书长。那几个人的脸像被雷击似的黑的要命。

一进来，那秘书打开活页夹，就开始宣读一份由市政府和超霸公司联合打造的一份方案。我们一听简直是气得要命，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被他们捏在手里的蚂蚁。

我们问那徐某：“那我们8月份的工资怎么算啊！”

“没有啦！”那徐某大手一挥。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那我们一年后的检查……？”

“那是厂方的事，你们来找厂方就行了。”

他们把活页夹一合，就走了。





第二天，我们就陆续同厂方解除了合同。

不解除没有办法啊！别人都解除了，就除了我们这些去北京的坚决分子。那些人生怕厂里不给他们钱，听说我们要解除合约，他们就先去解除了。而且厂方还造谣说我们去北京的，每人多给了五万元。

有一个男工看到我，招了招手。我跑了过去：“干吗？”

“我对你还可以吧！”

“还过的去啦！有什么事？要借钱吗？”

“那你老实告诉我，你们拿了多少钱？”那人一副很神秘的樣子。

“能拿多少？还不是跟你们一样的吗？”我没好气的说。

“我不信，你们没有多拿钱，会从北京回来吗？”那人啧啧的声音真把我气得要命。

这些真是的，每次都是我们拼死拼活的跑前面。他们但不支持，反而从各方面配合厂方牵制我们。现在还怀疑我们拿了多少好处。那厂方就是把钱丢到太平洋去，也不会给我们这些工人做治疗用。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只是机器。机器坏修不好了，或者修的成本很大，那么宁愿把它丢在外面，让它风吹雨淋，自然风化。

我们解除了合约，就开始向厂方要求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9月15日，我们继续同厂里谈判，但丁总说：“哼。我们的协议你们都让别人知道，是不守信用。我们现在不会跟你们谈了。”我们只能进宿舍，厂区根本不让进了。而且7、8月份的营养费和8月份的工资，厂方都没有给。





到了晚上，我们回宿舍的时候，那宿舍的门口贴上了我们的名字。上面大意说，我们这些人已经解除了合同，所以现在不准进宿舍。也加了两个保安。当我们要进厂的时候，被那保安拦截。同保安争执中，差点打起来了，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外面租房的老乡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去找厂方，才得进厂，但只能住到拿到监护档案为止。

在这段日子里，我们去找了市政府。当我们去找那徐某的时候，他没有出来，只来了一个妇女。

当她得知我们是超霸来的，就凶声恶气的问：“你们来有什么事？”

“我们是来找徐局的。”

“他不在！”

“那他去哪里了？”

“去外地培训去了。”

“到哪里培训去了？我昨天还看到他在超霸呢。”

“人家领导去哪里培训，是不会让你们知道的。”

由于我们找不到那徐某，所以就出来了。当我们走路到云山路口的时候，有一辆小车停了下来。我吓了一跳，一看原来是押我们回来的李科。我们就说我们找徐某，他打了一个电话给那人，说：“待下他会来接待你们的。”

过了一会，我们见到了那徐某，我们把我们的担心说了。主要是一年后复查的问题。因为都没有一个方案详细的说明，我们一年后来复查的车费问题，以及相关费用的问题。

他说：“你们找厂方嘛！”

“到时厂方不负责怎么办？最好有一个方案在那里。”

“到时有我们政府嘛！”





“谁不知道你们跟他们是穿一条裤子啊！我们到时找谁啊，现在找你都那么难。”

“叫你们不要跟厂方解除合同，你们不信，现在好了吧！”

“我们要见市长。”

“见市长是吗？你们这一辈子都别想见到市长。”那徐某发出了冷笑声。

“我们一年后来复查，不知道政府还在不在哦！”有一个工人在那里轻轻的说。

“是啊！不在了，你们到月球上去找吧！”那徐某疯狂起来，还真像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哦！

这次能有什么结果呢！双方大吵一顿，然后我们就返回了。这次去北京上访就此结束了。

但我们的心情一直没有平息下来。

政府，曾经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模糊的概念。

但是现在越来越清晰了。

一切——

尽在不言中。

后附

前次“神六”发射成功，我同全国人民沉浸在欢欣鼓舞中。事后一拍后脑勺才想起：当初忘记叫宇航员帮我们捎一个信儿给呆在月球的惠州市政府，叫他们在“日理万机（验钞机）”中下来一下。

后来又据报载，胡锦涛主席跟宇航员通话。那时我就想





托他带个信儿给惠州市政府，希望他们坐顺风车从月球上来一下，看看我们，实现他们的承诺。

可是……

所以我们只能远远的望着那月亮，想象着惠州市政府的样子。

很遗憾，真的。

到了这一步，工人已经走投无路了。有帮过工人的记者对他们说：“我们能帮的都帮了。《当代工人》和《今日说法》也播了。全国各地都知道了你们的事，但还是没解决，你们想想……”惠州市某局长大人则对工人们这样说：“广东省你们走遍了，北京也去了，除非告到天上……”



■ 第九章 ■

灾祸在扩散

上访北京的工人无功而返不久，超霸厂其它部门的工人还在为拿到体检结果而跟厂方斗争，最后演变为全厂工人大罢工。

“我们不理那么多了！”——超霸全厂大罢工

由于了解到工作环境中除了接触镉、镍、钴，还接触正己烷、苯、铅等有害化学品和重金属（例如焊锡组工人要接触铅和锡等），早在2004年5月初，就有工人致信惠州市卫生部门，要求做苯、铅等其它化学品 / 重金属以及噪音的相关检查。此外，工厂的几个车间没有彼此隔离，存在交叉污染的危险，装配部以外的其它车间的工人也加入了要求体检的行列。

9月7日下午，超霸厂粉房和装配部员工把人事部经理叶广添围住了，问他要复查结果。曹梦华说：

超霸管理层不跟工人谈，每天前来对付工人的是驻厂“霸事件领导小组”，也就是政府的人。第二天，9月8日，超霸员工在会议室里跟卫生局的人吵起来。那人拿凳子朝工人摔过去。

当时我就火了，带了一班人冲到人事部去。我们不从楼梯走，而是分成两批，通过车间上去，有人从二楼车间穿过去，有人从三楼车间过去，就是为了要在那些还在上班的员工中间引起骚动。我们还没有走出三楼车间，人事部他们知道了，把门锁起来。我说：蔡春桥，再锁我就砸门了！





那天晚上就全厂大罢工了。粉房和装配部的工人要求拿结果，其它车间部门的工人要求检查。我们不理那么多了。在事件初期，都是员工闹闹闹，拉长呢只有几个参与。到这一次，拉长开始参与策画了：你这批员工拦哪个地方，那批员工拦哪个地方，哪些人拦在前面，哪些人拦在后面，哪些人值白班，哪些人值夜班，哪些人去饭堂吃饭……都搞得有条有理，一清二楚——这跟安排生产是一样的！装配部的妹子们看到这样，高兴得命都没有。她们五月份罢工那次没罢工。员工说：唉呀，拉长加进来就是不一样！

拉长们自己也有分工，哪些人守这个楼梯，哪些人守那个楼梯，全部都围好了。那些办公室的管理人员就都上不去，那个谢启将都上不去啦。连电梯门口也给我们守住了。守电梯的妹子这样跟我说：阿华，你放心哦，我把电梯都锁了，他们出不来的。

当时整个三楼只有装配部科文王丽曼一个人进去（充电池到晚上8点要卸下来，不然会爆炸）。

我们四个人是值全勤的，晚上要守夜。楼上的员工把纸皮和棉被搬到车间楼梯口那里睡。我们有三个人都睡在粉房，晚上冷得要死。

那时，三楼还有机器要开工，还有品管部的人，他们那天要赶着出货。我们把他们挡住，就是不让他们出货——出了这批货厂里肯定再也不理我们了！我们计划好哪些人围在哪里，那个晚上我们熬夜。几个货仓门口全部被我们堵住，都出不了货。车子开不进去，开进去也出不来。全给我们围着，车随便一开动就得死几个人。饭堂的那几张大桌子都被





抬出来，堵在所有的门口那里——只有员工可以出入。这一招还是从老厂（先进厂）那里学来的。他们在厂里闹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饭堂里的人帮我们抬桌子。因为饭堂就在粉房后面，排气扇正对着饭堂吹，他们也是吸了镉粉的，看到这么多人检查超标，他们也很害怕。

当时保安也支持我们，因为他们老婆在里面，他们自己也想检查。粉房的门是不关的，门口就有一个岗亭，保安们轮着换班，也是吸了粉的。现在厂里的保安换了很多。他们的老婆也走了。

我们是被逼得没办法。

9月9日，罢工第二天，厂方贴出的通告，上面加盖了惠州市卫生局的公章：“8月11、13、16、30日在惠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体检的情况，于今天下午4时在厂内分两个窗口公布……”

那次的名单有127人超标。到处都是哭声。那肖经理还来安慰我们。

到了10月份，拿结果，也是一次大的行动。厂方还是那样子，不让我们住院，说一住院就接不回来。当时很多高层的管理人员都问过我：你有什么打算？我说：没打算，就想住院。他说：拿了钱走了吧。我说：我就是想住院，就是想治疗，没其它的。我不跟他说那么多。

之后厂里就送我住院了。

事情到了这里，并没有结束。拿到8月中旬体检结果的200余名工人——工龄都在5年左右——发现有140名工人尿镉超标，其中有60名尿β-2微球蛋白检查亦超标。工人中间立刻掀





起轩然大波。因为该厂还有500多名工龄5年以上的老工人，他们在6、7月份的检查中血镉与尿镉并没有超标，或超标很少，但现在那些工龄比他们短的工人竟然连尿 β -2微球蛋白也超标了，因此他们要求再检查一次。工人还听说，工厂打算等这些5年工龄的工人一到期就解除他们的劳动合同，这让他们更加担心。

侮辱性的检查程序

全厂大罢工之后，官商被迫答应工人的体检要求。9月11日，惠州市疾控中心发出通知，陆续安排超霸/先进厂其它员工体检。

为了报复这群反叛者，又炮制了一套侮辱性的“检查程序”：由“工作人员”全程监视工人脱衣、洗浴和留尿样。

许多女孩子，一辈子没有在陌生人面前光着身子，有的干脆拒绝，有的无限委屈，边洗浴边滴泪。曹梦华说：

前三个体检的员工知道体检要被监视冲凉留尿，非常气愤，就不检查。我是第四个，我也知道那程序，但就是想有意把事情闹起来。我登记好以后，开了门进去，就转身出来了。我出来对员工说：他们要监视洗澡，大家愿不愿意？大家都说不愿意。这样就闹起来了，闹得很凶。

但是，工人不论怎么抗议，仍然无用。

官商自有说法。他们私下跟工人说，因为有工人作假，把镉粉丢到尿样里，才实施这个程序。

问题是镉在水中基本上是不可溶解的；在尿里的溶解度也很低，只有在微酸中才可以溶解。其次，氧化镉是红色的粉





末。这两个条件加在一起，使任何人把镉粉丢到尿里作假，都很容易被发现，根本不用采取这种离奇的体检方式来杜绝作假。

黯然离开

9月3日，“镉超标事件领导小组”和公司联手推出新方案，除了很微小的修改外，跟8月初的第一个方案没有大分别（见第七章）¹。方案给工人两个选择：要么在15天内复工，要么解除劳动合同，否则按自动离职处理；只有在15天内解除劳动合同者，才有年资补偿（每一年工龄补一个月工资）和相等于6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同时厂方管理放风说，过了时限才走就什么补偿都没有。

到了这个地步，工人的选择就很少了。复工吗？但是大家不论是对工厂还是对惠州政府能否秉公办理，已经彻底失去信心。对于工厂的卫生环境也心存恐惧。虽说镍镉电池已经停产，但是厂里还有其它有毒化学品，工人要求卫生部门也针对其它化学品作体检，但是后者根本不理。

工人曾经要求撤销15天的期限，争取多点时间考虑。但是厂方也不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让工人有充分时间考虑，然后诱之以薄利来逼走工人。在这些霸王条件下，工人知道，现在不走，将来厂方还是很容易找个碴把你逼走，而到时一分钱补偿都没有。其次，如果复工，就要有继续斗争的准备。但是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撑腰的厂方，根本有恃无恐。后来先进厂五楼组合部的工人检查出大量尿镉超标，厂里根本不理，不肯送她们住院，只是逼她们快点签《职工自愿解除劳动合同协议

1 主要是是给列为“镉偏高”的离职员工增加医疗补助费。





书》。所以很多人都不想复工，只好拿钱走人。其实工人着眼的，不是那三千或八千元的所谓一次性补偿，而是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和相等与6个月的医疗补助费。假设工龄为5年，这两项相加，工人可拿到等于11个月的工资。许多工人一向薪金微薄，一下子有一、两万人民币，对他们来说是不不少的。

对于那些受辐射影响不深的工人，拿钱走人可能比较划算。但对于受辐射影响较深的工人而言，不少人后悔了，因为他们日后花在医疗上的费用远超离职补偿。而且，他们离职之后才发觉，厂方所谓的“负责到底”的承诺，是多么不可靠：光是要厂方兑现每年回来体检以及负责种种费用也非常困难。

平情而论，对于被列为观察对象的工人而言，如果当时选择不离开会好一点。按照法律，工厂不能解雇这一类工人。而留在厂内，比较容易继续逼厂方负责。一旦离开就难了。不过当时工人很少想到这点。另一方面，厂方也千方百计逼工人离职。虽然方案纸面上让工人选择是否离职，其实厂方一再利用各种小动作来逼使工人辞职。许多工人是在厂方的一再催逼下签了解除劳动关系合同的。在许多情况下，工厂根本已经准备好解除劳动合同书，盖好章，打好日期，只叫工人回来签名。后来许多工人就这点指责厂方。金山在2006年4月20日的声明回答说：“厂方一直尽力挽留受影响员工，……但有部份工人坚持要解除劳动合同。有工人指被迫离职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只给15天考虑，拒绝安排工人就其它有毒化学物做体检，准备好解除劳动合同书叫工人回来签——这也算是“尽力挽留受影响员工”啊？

9月3日的新方案，末了不忘加上一节“工人的义务”：

“企业员工……不得擅自越级上访、不得煽动工人无理





闹事。9月4日前，公安机关对越级上访、煽动工人闹事者不予追究责任；9月4日后，仍然屡教不改的，公安机关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相应处罚。”

其实，上访自由，包括所谓“越级上访”，都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部分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里“任何”一词表明，公民是可以向任何一级国家机关上访的。²所以，任何地方政府要在上访自由之上增加“不得擅自越级上访”的规定，都是违宪的。不过，宪法对于这些有权在手的官员来说，又算是什么呢？

惠州超霸与先进厂不知羞耻地在这个剥夺工人基本人权的方案上署名。

工人离职之后，拿着“暂住证”，和一身病痛，要在惠州再找到一份待遇和金山电池差不多的工作，几乎不可能了。

那些好一点的厂哪里敢收我们啊！个个都说我们中毒。好一点的厂要买社保，电脑里面一查，就知道我们在超霸厂、先进厂做过……

许多人为了找工作，最后都离开惠州，各奔前程，只有几十个工人留下。这是因为多数人都没有惠州户口，或者更准确地说，都没有城市户口，都是农民户口——尽管他们可能从成年起已经在城市打工，甚至有些人其实一辈子没有种过田。但是一张“暂住证”就是贱民阶级的印记，拿着它，你不能有好的工作

² 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部分又规定：公民“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里的用词是“有关国家机关”，范围很宽，可以解释为包括任何一级机关，至少不能缩窄到变成“只能向同级机关”申诉。





（这些都需要本地户口），你的子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除非你有钱交特别高的学费，或者有幸找到收费较低的“民工子女学校”）。他们永远很难在任何一个城市落地生根。而没有这个基本条件，民工要与无良企业做长期抗争必然非常艰难。

金山的风凉话

2004年9月1日，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强烈指责他们的校董会主席罗仲荣，支持工人的赔偿要求，惹得他非常愤怒，翌日以金山名义威胁采取法律行动。9月10日，全球化监察代表以股东身份出席金山的周年股东大会（该组织事先买好股票，利用这个身份来内外夹攻——场外抗议，场内当面质询罗仲荣），在会上批评金山和支持工人要求。同时，许多国际工会和民间团体响应，他们纷纷写信给金山，表示支持工人。金山呢，很有耐心的逐个回复，使这场笔战从香港打到国际。金山像录音机一样不断重复：这全都是香港团体夸大其词！那400名镉超标工人并非中毒，不须治疗，还“可以过正常生活”！

要知道，镉超标者虽然还没有足以观察到器官受损，但是，这不等于器官没有受损。不仅许多镉超标者有不少身体不适，而且部份镉超标严重者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明显的器官病变。

《职业性镉中毒诊断标准（GBZ17-2002）》认为：“据调查，当尿镉达5-10μmol/mol肌酐时，肾小管功能异常的患病率可达5%—20%，故以5μmol/mol肌酐的尿镉作为现职工人慢性镉中毒的诊断下限值。”（附录A）按此推算，400多个镉超标工人中，将来可能会有20—80个工人会出现肾小管功能异





常。这还未计算十几个现在已经诊断为中毒的工人。

另根据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6位研究员的有关两间电池厂的镉增高事件的报告，“工人尿镉超过 $10\mu\text{mol/mol}$ （肌酐）时，所发生的肾小管损害是不可逆的。”“即使脱离接触，仍可缓慢发展”。³另外，深圳一位公共卫生硕士杨荣兴，对深圳一间出现镉增高事件的电池厂225个接触过镉的工人进行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

“该电池厂镉接触工人白细胞偏低率为5.7%（13/225），血红蛋白异常偏低率为15.5%（35/225），血小板异常偏高率分别为16%（36/225），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镉对血液系统可能有损害作用。……镉接触指标（尿镉、血镉）与早期肾功能损伤指标（尿 β_2 -微球蛋白、尿视黄醇结合蛋白）没有明显线性相关；镉中毒观察对象停止接触镉一年后，血镉水平明显下降，但尿镉水平没有明显变化，尿 β_2 -微球蛋白、尿视黄醇结合蛋白总体水平没有明显变化，但有6.7%镉中毒观察对象出现早期肾功能损伤指标（尿 β_2 -微球蛋白）异常，因此即使镉中毒观察对象停止接触镉，而肾功能损害并没有停止，部分仍可以出现肾功能损害。”⁴（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许多观察对象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腰痛、头痛、背痛、骨痛、脱发、失眠、经期不准等等毛病。这些不适是否都由镉引起，虽然尚待了解，但是这些毛病的普遍性，至少足以令人

3 镉作业工人尿镉含量水平的调查，《中国职业医学》2005年8月 第32卷第4期。作者所研究的两个工厂，有可能就是超霸和先进厂。

4 镉接触工人健康效应的研究，杨荣兴，见TSR学位论文服务系统网，<http://202.116.64.96:8001/xwfw/detail.jsp?searchword=subject%3D2010&channelid=65004&record=43>。这篇论文所提到的深圳电池厂，有可能就是金山电池旗下的捷霸厂。





怀疑它们同镉有关。由于镉观察对象可能发展至中毒，所以，按《诊断标准》，对患者“应予密切观察，每年复查一次”。金山集团却阉割了这些内容，再曲解为镉超标者可以过正常生活云云，实在是误导公众视听。

事实上，2004年只是镉超标的工人，到了2008年已经有22人变为中毒了。

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药可以完全有效而又无副作用地把镉排出体外。但是无药可治不等于“不须治疗”，而是有关医院只能“对症治疗”，也就是针对患者出现的症状给予治疗。其次，即使没有充份有效的药排镉，但是给予观察对象支持性治疗和营养补助，例如补充钙片，咽喉炎时服消炎药（这个病在观察对象中很普遍）等等，仍然是有用而且必要的。只是金山电池拒绝而已。拒绝之后还对人说工人“不须治疗”，请问是否太凉薄？”

事实上，由于离职工人不断争取，金山最后被迫为工人支付营养费。

2005年8月5日，金山集团正式宣布设立金山电池工业安全信托基金。以后每当被人质疑在镉毒事件中不负责任的时候，金山都会抬出这个基金来做挡箭牌，说自有基金来照顾工人。但是这个基金究竟照顾了哪些工人呢？是那四百多镉超标工人吗？事后工人和香港的团体才知道，他们早被排除在外了。这批工人连有关基金的申请方法都收不到通知。基金正式成立一年后，究竟基金惠及几人？根据金山2006年4月20日的声明，是16人。也就是说，不到超标与中毒工人的总数的4%！

一切重演一次：捷霸与时晖





深圳捷霸厂工人镉超标、中毒事件，也是由工人自己曝光的，时为2004年11月中。

捷霸工人早在7月间已从报纸上了解到惠州GP厂的消息，听说还有员工把它复印下来，在厂内流传。

此时，厂里共有5名工人都收到了一封据称寄自惠州，但并未署名也无地址的信。信件谈到惠州超霸和先进厂工人的情况，包括超标工人正在准备打官司的消息，信中呼吁工人们要团结起来要求厂方体检、治疗和负责赔偿，等等。这些信件在工人之间传阅，引起了厂方的紧张。工人在上班时还偷偷传阅有关镉中毒的资料，“像做贼似的”。厂方找了一部分工人，一个个谈话。

究竟捷霸厂什么时候才知道厂房在职业卫生不合格？同超霸厂一样，不论是厂方还是当地卫生部门，一早都知道。我们得到一份捷霸厂2002年7月19日的会议记录，从中可以知道：

2002年7月12日，深圳市卫生监督所5人到厂做详细检查，查出工厂6条违反职业病防治法行为，包括：工作场所不符合职业卫生要求；未为劳动者提供个人使用的防护用品；未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未组织劳动者进行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同日，卫生监督所逐点向厂方提出改进意见。

7月19日，捷霸公司召开“关于落实执行职业病防治法会议”。会上，詹（才宽）副总报告卫生监督所的建议。然后会议决定落实建议，包括“在10月10日前组织服务一年以上的在职员工进行一次体检，……主要分为粉尘、噪音、有机溶剂几类。……詹副总表示这些属职工福利，可以由工会开销。”

事后，捷霸公司进行整改，例如在车间各工序之间砌墙，进行隔离，并发放“合格的防护用品”给工人。即使这





样，2004年10月捷霸厂的一份名为《空气污染物中重金属含量检测资料》的自检报告仍显示：5F工厂办公区空气中的镉含量仍然超标43%，达 $0.0143\text{mg}/\text{m}^3$ （标准值为 $0.01\text{mg}/\text{m}^3$ ）。

2004年8月13日至15日，公司组织全厂员工由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医生进行建厂以来的首次尿镉检查。检验报告单的日期是9月5日，但公司到10月份才告诉工人，还辩称因为受检人数多。检查结果是80人超标。超标最多的工人达到 $37.6\mu\text{mol}/\text{mol}$ 肌酐，远远超过正常范围。捷霸厂镉超标的人数较少，工人分析，这是因为员工流动性大，做了两年以上的工人只有十分一。



2004年9月间，金山属下的香港时晖厂也出事了。香港工人在听到大陆厂出事之后，也担心自己受了镉害，于是有一百多人纷纷要求厂方安排体检，证实3名员工镉中毒，21人镉超标。

根据香港劳工处处长给立法会议员梁耀忠的答复，早在2004年8月，劳工处巡查该厂时，就发现其工作环境须要改善，并发出三张敦促改善的通知书。9月，在巡查其它厂房时，又发现该厂没有依法在危险物质容器上加上标签，也没有确保员工使用护眼用具，所以检控该厂并处以罚款。

金山电池属下四间工厂（惠州两间，深圳一间，香港一间）几乎同时出事，说明金山集团的镉害事件并非单一事件，而是集团，或者至少是金山电池，长期只顾赚钱，罔顾工人健康的结果。

一切重演一次，而下一个又是谁呢？

2004年7月事件曝光之后，惠州超霸 / 先进，以及香港时晖都停止了镍镉电池生产。但是这不代表金山不再经营镍镉电池。

2005年中，香港团体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大陆超霸或者先





进厂工人写的，内容是：金山其实没有停止出产镍镉电池，只是外判给湖南一家私营电池厂而已。这家厂叫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有限公司，信中附上该厂地址。

以下是我们对一名工人的访谈：

我进厂的时候，我们几十位新员工，开始在写字楼的多功能厅接受培训。该厅是一个很大的会场，可以容纳千人。我们整整齐齐坐在前两排位子上。听培训管理侃侃道来，讲的都是什么公司理念、工作纪律、十大禁令、奖罚原则，没有讲过关于职业健康的知识，也没有这方面的培训。茶水间及换衣服的地方与车间分开了，窗户是敞开的，没有空调及抽风系统，污水处理房很少开。我们也不知道工作的岗位是否有毒。（问：口罩呢？）极片与装配车间除捞粉员工戴猪嘴口罩外，其余戴纱布和医用口罩。（问：知道GP超霸工人镉中毒事件吗）不知道。但是知道GP是科力远的重要客户。一样的剧本，一样的情节，一样的人物。或许，结果也一样？

香港团体多次就科力远的生产不安全问题向金山集团提出质询，但是它至今依然置若罔闻。

官司从大陆打到香港

从2004年9月开始，超霸和先进厂的大部分工人在离职后大多还呆在惠州，有的开始另找工作，有的暂且休息。不久，工人就分成两批决定跟厂方打官司。

2005年4月，深圳捷霸工人也照办煮碗。总共有三批工人打官司：





工人类别	代表律师	一审判决日期
第一批65人（超霸 / 先进）	周立太	2005年6月
第二批244人（超霸 / 先进）	梁智	2006年3月
深圳捷霸17人	周立太	2005年10月

第一批出院的超霸厂60多名观察对象在跟厂方谈判的过程中，已经考虑要诉诸法律途径。她们中的多数，是第一批离厂，其中好几位领头的都是原先厂里的拉长，文化水平较高些，能说要写，也有威信。

经过工人代表商讨之后，确定诉讼人数为65人（超霸厂50人，先进厂15人）。每人均摊费用1,500多元，加上工人代表活动经费，每人上交了2,000元。

9月间，周立太律师正式受理该案。10月14日，工人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每人医疗费、就医路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25万元。65名原告共索赔约1,500万元。工人和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合约规定，不论是通过审判还是调解，总之结案后，工人将“按赔偿总额的15%支付乙方律师服务费”。

另一批打官司的超霸、先进工人共计244名：超霸厂120名，先进厂124名。在开始的时候，工人们需要讨论和决定很多事情。每次工人代表召集大家开会（通常在火车北站的草坪上），一坐几百人，密密麻麻，非常瞩目。

这批工人当中，属于超霸厂的部分，当代表的很少是拉长，大多是从“斗争”中涌现的普通员工，因为有口才、敢说、敢做、能写、积极行动或为人踏实坦诚等原因，慢慢得到工人的信赖。





那天我们到河南岸，国贸商厦大门前集合，一下就来了100多个人。惠州这边的员工就选我做代表，总共选了七个代表。让一个拿身份证去银行开户，还有一个管存折，第三个管密码。有一次两个人都忘记密码了，怎么也对不起，只好销户，另外开个户口，7天后才把钱转出来。⁵

她们请了梁智律师代理诉讼（有人找过惠州的律师，许多都不敢接这个案子）。虽然情绪相对乐观，但压力也不小。有家在惠州的工人代表说：

我当代表和收钱的时候，两个亲戚就来劝我不要当：（搞这个）日子不短的，这个案子惠州市不会让你打赢，那是惠州市的企业啊，肯定要拖个两三年。你做不到工，总要跟这件事。

女工们还受到不小的家庭压力。江小眉说：

工人中间，老婆要打官司，老公不愿意她们参加——这个比例很大。

2005年6月24日，第一批工人确定败诉，8月16日拿到了判决书。之后，进入二审，仍然败诉。

第二批员工找到梁智律师，收费24万元，即每人约1,000元。4月30日，惠城区法院正式立案。2006年3月，一审败诉。4月30日，二审开庭，照样败诉。

而在深圳捷霸公司，2005年4月间17名工人决心提起诉讼，10月10日开庭。他们也以败诉收场。据说，深圳的法院不懂得怎么判好，便向惠州的法院调来判决书的卷宗“做参考”。如果传闻属实，结果可想而知……





当地法院的判决是否公正？

每次金山集团被质疑在镉毒事件上不负责任的时候，它都照例引述惠州法院的判决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问题是惠州法院的判决是否公正？

超霸和先进厂侵犯了工人的身体健康权，造成工人在金钱上、健康上的以至精神上的损失，是铁一般的事实。工人根据这点要求厂方民事赔偿实在是合情合理。惠州法院对工人作出败诉的判决并不公正。而且，法院根本抹煞工人的证据。

2006年8月18日，当地中级法院就超霸前女工向智清的上诉，判决她上诉失败，维持2005年的原判，也就是原告无权向超霸索取赔偿。法院的理由是上诉人“尚未达到镉中毒的国家规定标准，并没有被确诊为职业病，……不构成工伤”。但是，事实上，早在2006年2月27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已经发出证明，确认向智清为职业性慢性轻度镉中毒了。法院居然可以完全抹煞这一点。

我们还要考虑一点，就是法院所赖以判决的有关医疗的证明文件，是否真确无误。这是因为，从头起，无论是当地的卫生防疫中心还是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处处令人怀疑它们同市政府和超霸厂有种种隐瞒行为，务求不使真相曝露。

香港的官司

从2004年7月到2006年6月，全球化监察以及其它声援团体，在这两年中对金山采取过不下十次的行动。但是，在较早期，这些团体也并非没有尝试同金山及罗仲荣沟通。他们藉此





向金山转达工人要求，而且不只几次。但是到了2006年初，一切很清楚，金山绝无意愿向镉超标工人赔偿，那时之后，双方就没有再会面，除非是团体去抗议的时候。

2006年全年，大陆工人三次来香港抗议罗仲荣。最大型一次是3月28日，香港各团体乘罗仲荣主持理工大学校董会会议之机，邀请大陆工人来港与理工学生及十几个团体代表向罗抗议。虽然无法接近罗，但根据有份参与校董会的学生代表说，罗听说有人来抗议，非常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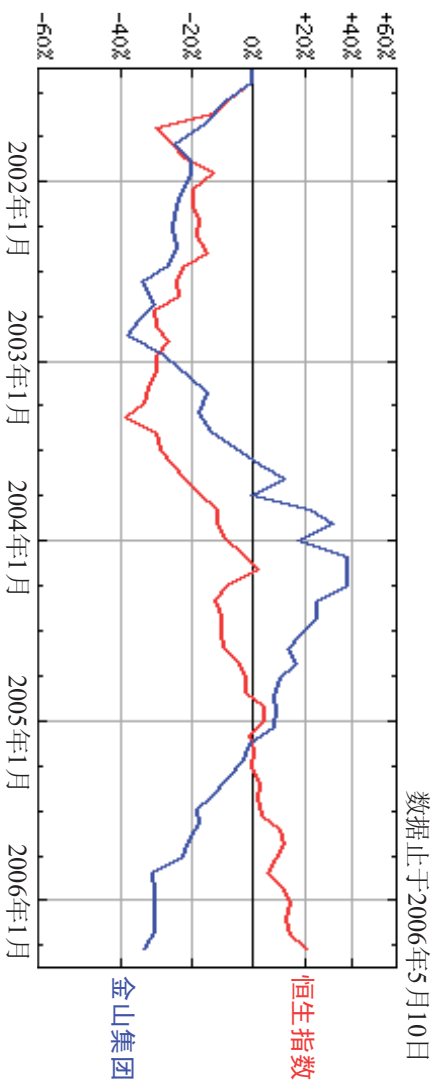
4月20日，这些团体又趁金山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去抗议，全球化监察的代表以股东身份入场，质问主持会议的罗仲荣为何把镍镉电池生产线外包给湖南的工厂，罗以问题与议程无关而禁止该代表发言并把他驱逐。第二天金山发表声明，对这些团体“非常不满”，要“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力”了。

金山的威吓在升级，除了因为民间团体继续追击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金山的股价拾级而下。自从金山镉毒事件后，其股价从2004年初的2.6元，一直下跌到2006年5月初的1.2元。下跌的部份原因是原料、石油价格上升。但是，这不是唯一原因，因为如果拿它同恒生指数相比，可以发觉它完全同大市背道而驰（见表一）。即使只比较工业股，金山毫无疑问也是表现很差。我们挑选4种有代表性的工业股来同金山股价比较，就会发现此言不虚（见表二）。从那些基金评论多少可以了解，“市场”担心的是大陆、香港金山工人的索偿行为。





表一 金山股份与恒生指数走势



表二 5种香港工业股股价比较

	06年5月19日 股价	05年6月1日 股价	06年与05年 的比较
德昌电机 (179)	5.90	7.45	-20.8%
蚬壳电器 (081)	2.90	1.49	+94.6%
金山工业 (040)	1.16	1.62	-28.4%
比亚迪 (1211)	15.0	17.2	-12.8
富士康 (2038)	19.0	5.1	+273.0

另一个原因是金山电池在2004—05年度的净溢利下跌96%! 连累金山集团的净溢利下跌60%。而溢利大跌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镉毒事件造成的额外支出: 这一年金山电池花了2千8百40万港币在医疗和补助上。此外, 集团在2005-06年度仍然亏损。股价大跌, 虽不一定会对公司的经营立即造成困难, 但是集资、借贷的成本肯定要高些。更直接的打击是声名狼藉。谁只要在Google上面搜寻“金山电池镉事件”, 随时都可以找到上百个网





站登载有关消息。中央电视台两次播放事件真相更是雪上加霜。大概大老板觉得，是时候采取更强硬手段来令团体收声了。

2006年6月4日，香港团体派发一张讽刺金山镉毒事件的明信片。明信片上面画了一个骷髅头的工人拿着GP电池，还有一句话：“镉中毒工人向您推荐超霸电池”。据说，金山老板们看了，感到品牌受损，大动肝火。6月28日向其中3个联名团体（全球化监察、职工盟、街工）发出律师信，指责团体诽谤，要求道歉和赔偿50万元。3个团体不予理会，于是金山入禀最高法院控告3个团体诽谤，指责明信片的含意是“所有GP电池都是有毒，并可以令工人死亡”。其实明信片根本没有这个说法。

金山的目的是要使民间团体闭嘴。可是它打错了算盘，反而让人觉得它恃势凌人，无理取闹。首先就惹起了金山工业安全基金的拨款委员会委员庄陈有的不满，宣布辞职抗议。庄是前乐施会总干事，曾经慰问过来港女工。他解释为什么辞职：

“首先我不想被人看成同那种有辱工人人格的体检有任何关联。其次，我无法支持金山要控告民间团体的决定。民间团体不过是为工人说话。这是民间社会的原则。”（原文为英文）

接着，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发信给罗仲荣，批评他的处理手法。同时，香港团体也发起国际声援运动，并得到许多大型国际工会的支持，包括国际自由劳联、国际五金工人工会、荷兰总工会、比利时总工会、国际化学、能源与矿山工人工会、波兰团结工会等等。法国的民间团体“人民团结”发起了一人一信运动，总共寄出二千多封信给金山，抗议其法律行动。

国际自由劳联（现已改名为国际工会联合会）总书记Guy Ryder在信中这样说：

“我写信是要支持你们几间工厂的工人对你们索取足够的





赔偿，以补偿他们受镉超标和中毒之苦。他们是在为金山工业集团工作时接触到镉的。……我们对你们采取法律行动去阻止职工盟和其它团体对工人的支持感到愤慨。被剥夺了结社自由的工人非常英勇地团结起来，争取赔偿。他们理应受理而非被勒令闭嘴。此案已经受到全世界工会及劳工团体的关注。除非金山工业集团兑现其承诺，与工人商讨合理赔偿，否则传媒的注意是不会消失的。”（原文为英文）

罗仲荣充耳不闻。

三个被告团体决定抗辩，并向法庭提出证据，至今还在等待金山排期开庭。

环境污染疑云

直到镉毒事件曝光前不久，金山仍然自我感觉良好：

“公司管理层素来重视工业安全，香港总厂及国内分厂分别成立‘工业安全及环保委员会’（简称为ISEPC），致力提高员工对工业安全的意识，改善机器设计，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给员工。”

这段文字摘自金山集团的内部刊物《时晖通讯站》（2003年12月第9期）。这份内刊正好出版于镉毒风波初起的时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2004年7月4日，《明报》的报导把金山弄得非常尴尬。这篇标题为〈GP电池厂镉毒疑祸及村民〉的报导说：

“广东惠州市港资电池厂工人镉中毒事件有扩散趋势。昨日当地多名村民报称，验身发现尿液液镉含量超标，意味除厂员工外，周围村民也怀疑遭受感染。目前，港资厂所在地的大





批村民及住户人心惶惶，许多人连自来水都不敢饮。惠州政府对此尚未采取特别措施。”

接着，绿色和平开始对先进厂附近的去水渠搜集环境样本去化验。据10月4日《明报》的报导，

“先进电池厂外去水渠的污水、水中沉积物及尘埃样本，均含高浓度致癌的重金属镉，当中污水的镉含量较本港及内地排放标准高出19倍，不排除污染物来自电池厂，要求厂方交代事件。…绿色和平有毒物质项目主任梅家永表示，…有理由相信污染由电池厂造成。但他承认无法证实去水渠是与电池厂连接。”

另据超霸厂一位职员说，工厂的处理废水的机器运作一直低于标准，所以排出的废水含有大量红色的镉粉。⁶

针对《明报》报导，第二天金山发表声明，说“惠州市环保局一直有定期检查和巡视惠州先进的厂房设施，包括工业污水含镉水平。惠州先进的工业废水处理系统及排放均符合相关标准。”

究竟谁是谁非，由于资料太少，难以定论。在绿色和平发表报告后，金山约见绿色和平，表示在未来3个月，会委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对超霸 / 先进厂做环境评估与调查。可是到今天，金山都没有公布过这个评估与调查。我们得到一份超霸厂和生产力促进局开会的会议记录，参加者包括丁总，开会日期是2004年11月8日，也就是整改之后，目的是“实地现场视察PP厂（即超霸厂）的生产流程，比较上次的审核有无改善的地方，在多处工作间抽取经处理及未经处理过之污水，食水，自





来水，空气样本以及粉尘样本，藉以分析及了解厂内每个区域内和每个工序点的空气及水质的污染状况。”然后，在“明天继续跟进项目”一节的第3点中，有这样的话：“由于显示PP的生活污水排放前是未经处理，如洗衫水，所有排放的污水都是最终流进湖泊江河”。

原来至少有生活污水是未经处理的！

电池带来很大的环境危害，但是媒体往往只关注废旧电池的危害，对电池生产过程对环境的破坏却揭露不多。锌锰电池、铅酸蓄电池、镉镍电池、含汞类电池（碱锰电池、氧化银电池、汞电池）都可以极大地危害环境。尤其如果厂家把未经处理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向外排放。

大概在金山镉毒事件爆发的同时，2004年5月，据中新社报导，浙江省长兴县也发生了500个儿童铅中毒事件。经过调查，肯定是附近的电池厂把未经处理废水排出所造成。这种做法，据说在业内是人所共知的行规。⁷

怪不得整个珠江三角洲流域都被包括镉在内的重金属所污染了。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的土壤调查证实，珠三角四成农田菜地土壤被重金属污染。以中山市为例，菜地土壤中，镉、镍、铜的超标率分别高达50%、43%和10.9%。中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该市的市場蔬菜的抽查结果，镉超标率为9.9%。⁸而这些蔬菜都营销于珠三角各大城市。早前，中山市的消费者委员会也发现五种水产品的镉含量超标，它们是河蚬、扇贝、

7 〈中国的GDP在工业污染的阴影中前进〉，天涯杂谈，<http://www.tianya.cn/>

8 《信报》，2006年12月18日。





生蚝、蛏子、墨鱼。其中扇贝的镉含量超标33倍。⁹香港的厂商占珠三角外资的大半以上，所以它们在这方面的贡献也良多。

环境污染疑云

2005年，也就是超霸电池厂爆发镉毒事件后一年，河南省新乡市的环宇集团有限公司的一些工人，看到有关超霸的消息后，自发去新乡市职业病防治研究所检查，检查发现，1,663名工人中有1,020人尿镉超标，其中11人被确诊为职业慢性轻度中毒。

环宇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主要从事电池原材料和镍镉、镍氢、锂离子等电池的生产，是国内碱性二次电池第二大产业集团，年产值13亿元。

据报道，之所以有那么多人中毒，原因是该公司在职业危害防护措施落实中有漏洞，职业危害因素超标，防护措施不到位，未按规定对职工进行上岗前的培训，未按规定组织职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不久之后，这家公司就陆续把受影响的工人辞退，来逃避责任了。

然后，在2007年1月，江苏省无锡市新区的无锡松下电池有限公司又爆出员工镉超标事件。

松下是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开设了许多工厂，生产电子产品。在沈阳、无锡、上海、珠海等地，松下开办了电池厂。无锡厂生产的电池大部分返销日本。该厂有5,300名员工，主要开发和生产镍镉、镍氢电池及锂电池，其中约

9 《明报》，2006年9月27日。





710名员工直接从事镍镉电池生产。日本早就禁止一切含有镉化合物产品的生产。松下公司当然知道。可是，当它到中国投资生产镍镉电池，却明知故犯，漠视工人的劳动保护，以致造成员工镉超标。不只如此，在有着「日资第一高地」之称、据称有千家以上日企的无锡，在这些污染型企业落户之后，无锡新区连一只小鸟都看不到了。

同环宇集团的工人一样，松下工人是在看了2006年12月10日央视播出节目《致命的电池》后，才惊觉自己也可能受到镉影响。从2006年12月14日起，部分员工向工厂提出要知道自己体检结果。

迫于压力，2007年1月4日，厂方把尿镉检测结果的复印件发给员工。员工则发现：复印件里的体检日期与送检日期不符（有的送检日期竟然是2006年5月）；有的体检日期与报告日期不符（有员工体检日期为2006年8月18日，而报告日期为2006年8月16日）；而且，尿镉检查报告的复印件上竟然都是手写体，没有无锡疾病控制中心的盖章，送检人与核对人的名字也都是手写的，笔迹非常接近，同样没有图章；最重要的是——尿镉检验值的那栏也都不是计算机打印出来的，全部是手写的（无锡的医院很早就完成了检测仪器的电子化，所有的化验单据都是计算机打印的）。另有员工也反映报告资料有改动的痕迹。

显然，员工有充分理由怀疑公司造了假。他们向公司讨说法，并要求工厂赔偿，受到管理层的压制。于是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从1月4日起开始集体停工，要求公司给予答复。经过交涉，工厂答应了三项要求：一，改进工人的劳动防护用品，把原来的医用口罩换成5.5元一只的3M防护口罩；二，每天给





每个工人发放20元的营养费补贴；其三，全体员工再次进行体检。但工人依然不满，罢工继续。

1月8号上午，第一工厂一楼5个部门共1,300多名员工全体罢工。情绪激动的员工堵在厂门口8个多小时。工人们选了5位代表与公司交涉，要求到省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复检，没有结果。

1月9日，松下公司拒不承认员工自己到医院体检的结果，声称如果要检查，由公司统一安排检查。矛盾进一步激化了！罢工工人穿着统一的工厂制服，浩浩荡荡，在寒风中徒步十余公里，从工厂游行到市委市政府门口，要求主持公道。政府则派出武装警察去拦截工人。再接下来，警察开始殴打留下来不肯离去的手无寸铁的工人。有三名女工表现特别坚强，结果被拘捕，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工人们在悲愤中被厂车拉回公司。下班前，3名女工被人事部派人保释出来。就这样官商联合把松下工人的抗议压下去了。

大约在松下事件后半年，即2007年7月，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金沙新力电池有限公司又爆发了工人镉中毒事件。同一个剧本，同样的情节，同样的结果。





■ 第十章 ■

维权DIY

这是总结的一章。总结镉毒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总结工人抗争的得失，总结事件的教训。

如果没有镉，就没有这个故事。它到今天仍然大量潜伏在400多甚至可能更多的GP电池工人体内，静静地继续毒害工人。放眼全中国，究竟有多少工人为镉所毒害，谁也没个底。

镉的遗害太大，应该在工业应用上严格限制，在电池制造上禁用。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在GP超霸电池工人抗争事件中，工人的赔偿要求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实现。可能有人会认为香港的团体不够激进，导致工人得不到成果。这个说法需要商榷。第一，香港的团体本来就不是抗争主体，根本难以越俎代庖；第二，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了。珠三角一般劳资纠纷多数只牵涉劳资双方，很少像GP超霸电池这个案例那样，不仅官方一直直接介入，而且在厂内成立工作组来逼迫工人。

另一方面，说工人完全得不到成果，也恐怕失之偏颇。局部成果是有的：争回最低工资的差额及有毒有害环境下的特殊津贴，得到三千到八千的“补助”及相当于平均工资的六个





月医疗补助金；算是不错的终止劳动合同的补偿金；在离职之后，每年的复查又成为一场斗争，而他们也成功争取回复查权利及各种附带权益等等。此外，有两个原先被厂方拒绝返聘的中毒 / 工伤工人，打官司成功获得返聘。如果当初工人不去抗争，或者香港团体没有声援，那么事件大概很快就会以最不利于工人的方式落幕了，就像河南环宇集团镉毒事件那样。

从另一个角度看，甚至可说工人的抗争得到不少成果——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成果，那就是唤醒了大陆以至香港的电池业工人及国人对于镉害的警惕。超霸厂工人的抗争先后启发了先进厂、捷霸厂、香港时晖厂的工人为真相的抗争，继而触发河南环宇集团和无锡松下工人的同样抗争。

回头来看金山电池，经过了事件的教训，惠州超霸厂事后确实多少改善了工作环境。

现在新员工进厂，超霸也还是很坦白地说：“你们到外面有没有听说此厂有毒啊，以前是有毒，但现在没有了，我们现在不做那种毒电池了，你们听到这些之后，考虑一下，想做的就做，不想做的可以走人。”其实，从以前的卫生评估报告中可知，超霸厂除了有毒物镉，还有别的有害物，如：天拿水（含苯）、清洗济、油墨、氢氧化镍、噪音等。究竟现在是否都处理好了？

现进超霸厂要先签合同，是一份内容还算完整的合同，员工也会拿到一份（镉事件发生以前厂方没有给员工合同书）。合同中包括了这些内容：“电池生产存在职业病危害物质及后果的可能性，双方应做足职业病防护措施。”

新员工进厂，有三天培训时间，培训中会提到超霸公司是





金山集团属下的公司，在三天的时间里，会培训一些职业安全方面的知识、6S、厂规厂纪等。车间已装了通风设施，茶水间与车间是完全分开的，喝水是在开水房里，管理交代员工要洗好手和脸后才可以喝水。吃夜宵是在饭堂里。员工进入车间前必须穿戴好防护用品，方可进入车间，口罩是3M口罩，两天一个。手套是沙布手套，两天一双，出车间时，衣服脱了才能出车间。工衣是厂里统一洗的。¹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个可算是一切社会运动的法则。

女工做头人的背后

GP超霸事件还有一个特点。一般民工的自发抗争很少会产生长期的头人，更少有女性这样做。而GP超霸事件则有所不同，不仅产生了长期性的头人，而且，除了最初阶段外，以后的过程都由女工带头。

中国民工由于种种原因，使他们比较国营企业工人更缺乏集体意识。同时，由于在城市里没有根，不像国企工人那样有小区的网路，所以一旦出来抗争，在遇到打击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都是官方的传统惯伎。所以，即使出现了民工斗争，往往也难以找到愿意出头做工人代表的工人。即使背后可能有人推动，但是幕后头人的角色多数只是暂时的，不会长期担任。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像兴昂鞋厂、美芝海燕²这样没有“领导”和“代表”的抗争。这些抗争

1 超霸工人访谈

2 2004年3月和12月，两厂工人分别因为抗议待遇太低而发生罢工。在兴昂厂的罢工中甚至发生大量破坏工厂财物，导致10名工人被捕。





非常激烈，但是从头到尾都是自发的，没有组织的，也没有头人。2005年12月发生在大连市日资企业里的联合罢工事件也是如此：

“谁也没想到罢工会有这么大的规模，然而，政府组织协调劳资谈判时，却发现找不到组织者和谈判代表。‘谁牵头的，你们出来代表谈判。’政府喊话的时候，参与罢工的员工却各个往后退缩，他们害怕作为谈判代表，被政府和企业视为罢工领导者揪出来。”³

从积极方面看，在采取有组织斗争的主、客观条件都不甚具备的情况下，这种无代表的斗争模式对中国的工人是有利的。工人一方面仍然可以在行动中体验到集体的力量，争取到一定的权益或让步，另一方面又不至于遭到报复。

GP工人能够很早就产生自己的头人，一，是因为工人作为受害者，一开始就在道义上占据非常有利的地位，少一点顾虑。其次，厂方以至政府事先未曾料到工人有这个水平据理力争，以为轻易就可以把工人糊弄过去，或弹压下去，等到事情被曝光时，再“镇压”已经太迟了。这就形成了长达九个月的“持久战”，让工人有较多时间学习，也让比较有能力的工人慢慢出头。同时，由于事件的影响从普通工人扩展到拉长，促使拉长站到工人一边，也为抗争带来比较有效的领导（其实中外工运的经验都证明，争取到基层管理人员的支持，对于抗争非常重要）。可以说，这些工人代表大部分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并得到考验的。虽然工人没有建立起稳固的组织，但是这

3 《大连日资企业联合罢工事件调查》，凤凰周刊，2005年34期（总203期），2005年12月5日出版。





些头人始终起着领导作用。离厂后，他们也曾有过投票选举代表的集会。在工人各散东西后，仍然多少维持一个网络。

其次，一般民工抗争，即使女工占多数，如果出现头人，往往仍以男性为主。

因为女工带头会碰到比男工多的障碍。女工是否得到丈夫、父母或其它家庭成员的支持，对她们往往很关键。如果家庭或丈夫反对她们抗争，劝她们“忍”，要她们“别去闹事”，女工就很容易抑制自己。如果得到支持，她们就较少后顾之忧。显然，父权制家庭仍然是一个基本环境，制约或推动着她们的抗争。

一位领头的超霸女工在访谈中这样说：

问：你能谈谈一般女工抗争的时候会面临什么样的障碍吗？家庭会支持还是会反对？如果反对，那会怎么样？

答：就我自己来说，家庭还是支持的，但我知道有很多是不支持的。特别是住在厂附近的。她们现在也只是有事就签个名而已，很少站出来说话的。女工有很多家庭顾虑，有的还没找对象呢！也有的人因此（镉超标）而离婚，看多了真是心痛。不少因为怕男友知道，索性连复查也不来，或者对他隐瞒。这样的话，她们又怎么会积极（继续抗争）？我已经是幸运的了。只是不知以后怎样？

GP超霸事件有所不同，部份是因为拉长都是女的，她们由于职业的关系，本来就粗有管理能力，对一般工人也有号召力。一旦她们倒戈，就自然成为头人。

此外，在访谈中这些女工通常把自己的抗争行为和心理称为“情绪化的”，不像男工那样“理性地看问题”。令她们





的抗争态度越来越坚决的原因是“因为感到自己被欺骗，被侮辱，受到打压，所以心里很气，很愤怒”。她们要“争一口气”，“而不是像男工人那样，理性地去想事情的利害关系。”这可能是她们比较男工更有继续抗争的韧性的原因。不管怎样，这个案例可以让人再次质疑那种“女性是弱者，女工更是弱者中的弱者”的偏见。

虽然主要的计划和行动都是由女工积极分子带头策划和完成的，但她们仍然把一位参与抗争的男工当作核心成员和领头人。女工说：这样她们会比较安心一点，即使遇到暴力对待也不至太惊慌。另一方面，女性作为“弱者”或应受保护者的“现实”，也有助于她们大胆出头，因为对女性使用暴力，可能招来其它工人及社会舆论更大的愤怒和抗议。对待抗争的男工，官商则比较少顾虑，往往径直暴力对待。

一字记之曰骗

中国大陆这么多职业病，并非因为没有生产安全和职业病防治的法律，而是因为官吏不去落实，因为制度性的腐败。

在我们的访谈中，许多女工都有不堪回首的隐痛，感到从入职直到受到损害，全部经历都印证一个“骗”字。有工人编列出以下的被骗经历：

- 工人从应聘工作直到上岗，直到发生损害事件之前，厂方从来没有依法告诉工人厂内的职业危害；
- 工人签订劳动合同时，厂方没有依法给工人一份副本；工人每年签名时，从来没有见到过劳动合同。
- 工人的工资标准长期低于法定最低工资，且经常严重





超时加班。

- 厂方每两年的体检都不包括镉以及其它有害化学品；而且2004年的卫生评估报告中显示，在惠州超霸电池有限公司的装配部，除镉以外还有镍和噪音也超标，但是厂方根本就不管这些，只是检查镉。
- 工人的防护用品几乎全部没有防护作用；在1998年以前装配的很多工位根本没有防护用品（比如车坑工序后的工位都没有发口罩）。
- 当地政府和厂方事前完全知道工厂的空气含镉量超标，可是不仅完全没有依法改善，而且向工人隐瞒。

小小两个工厂，区区几千员工，短短几年中，所遇到的无不是一个骗字！（以上列表未完，请参考本章附录。）

GP超霸电池的镉毒事件，绝对不是工业意外，而是工业意中，意料之中！

表面看来，这似乎不应发生，因为国家有堂皇的法律及专责部门、专职医院去保护环境，保护工人；工厂有工会，有职业安全委员会，有ISO14000认证，金山集团有香港社会服务联会颁发的关怀公司奖……

事实证明，这统统不起作用，甚至有时只起反作用。无他，因为它们在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空架子，门面功夫，是蒙上欺下的工具。真正起作用的是另一个潜规则：金钱就是媒介，强权就是公理，官大的说了算。维护人权的法律只讲不做，官场潜规则只做不讲。但明一套，暗一套，难免露出马脚。为了弥补两者之间的矛盾，就需要制假造假，以假乱真，半真半假。这并非限于一厂一地，而是遍及神州大地。今天中国大





陆就是假货的盛世：盐也假，药也假，打假也假，以至有人调侃，中国什么都假，只有骗子是真。这种制度性造假的最大受害者，就是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最大量的假药都往乡下送，而进城民工呢，伙食往往是“民工粮”——发霉变坏漂白的粮食。事实上，触发民工不满甚至抗议的，往往包括恶劣的伙食。

这种制度性造假的得益者是明如白昼的，就是官商自己。无数官商由于得到它的掩护而发了大财。这也是为什么当地官员在劳资纠纷中连假扮中立也不屑为之，而是决然公然地一屁股坐到工厂主那边，直接向工厂派出工作组去打压工人。明白了这个大环境，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保护劳动者的法律不起作用，打压劳动者的法律才起作用；为什么大多数所谓社会核算（social auditing）⁴都没能确保雇主真正守法；为什么中国的工业意外和职业病患者的数字冠绝全球，为什么其中九成是民工。更可怕的是，大老板在发了大财之后，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知所收敛、发财立品，相反，而是顽固地保卫这种超级剥削的体制，不管他们的盘剥之深早已超出农民或民工的忍耐极限——他们本来是以刻苦耐劳闻名于世的。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与日俱增的民工抗议、罢工、堵路。但是这些官商的对策是什么？压制，压制，再压制。有丝毫反省自己的作为吗？丝毫没有。这个故事一再证实一个道理：对于压迫者与剥削者，你千万不要指望他们自律。如果没有来自受害者的抗争，压迫者与剥削者的压迫与剥削是可以没有止境的，其方式有时甚至

⁴ 这是近年流行的所谓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监督方法，由品牌公司派出调查员去分判工厂去调查后者有无依法给予工人应有权益。





是超乎人类想象的。只要看看过去不久的历史，奴隶主怎样压迫奴隶（想想千里迢迢掠夺黑人为奴），男人怎么压迫女人（想想缠足），早期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资本家怎样役使儿童在矿场挖煤，就知道这个道理。今天中国不过是以历史性规模及更大效率来模仿早期英国的官商所做过的一切罢了。

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

对于民工所受的无人道的剥削，总会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叫人去寄望于清官。其实呢，即使还有这样的清官，他真要扫除不法官商，恐怕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

另一个办法是所谓依法维权。依法维权有它的效用，但也有它的限度。其实工人在维权第一个阶段，总是诉之于官府和法律，这个根本不用别人多教。问题是不仅法律只是一张纸、而官字两个口，而且法律程序往往一拖大半年甚至几年，而没有当地城市户口的民工是拖不起的。最后，依法维权本身也有自己的陷阱：现行的法律本身就有太多有违人权的地方，如果一切抗争都只能通过法律解决，难免有时会作茧自缚。所以法律手段需要其它手段来配合。其实民众自己早就发明了一套办法，那就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各种各样的自发性抗争在中国大陆可谓无日无之。要维权，自己动手⁵！**DIY—Do It Yourself!**⁶

5 用惯常的说法，就是“直接行动”。

6 DIY（自己动手）运动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西方兴起，最初限于在制造或修理家居，后来逐渐扩大到音乐和传媒。在音乐创作上，有一派认为按照自主精神，应该打破音乐演奏者与听众之间的界线。在传媒上，DIY精神启





事实上工人的自发抗争往往能够得到局部胜利，而且具有示范效应。曾经有这样的案例：在一个珠三角的工业区，有一间工厂的工人罢工了几天工，成功迫使厂方提高工资。随后，附近工厂因为害怕自己的工人早晚仿效罢工，所以“先发制人”，提高了工人工资。这些事例说明工人的直接行动的效用。

由于民愤极大，中央政府近一两年来才开始注意要多少保护民工权益。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不断增加民工的工资，保障民工的合法权益。后来全国各地普遍增加了法定最低工资。这些举措本身是好的，但是稍微了解国情的人都会问：怎样保证这些政策得到落实？怎样保证其它一早就存在、但一直没有落实得好的法律也得到落实？答案当然是没有。工人如果根本被消音、被打压，他即使被剥夺合法权益一千次，又有谁知道？除非他们自己DIY，自己动手维权。所以，如果中央政府真要维护民工权益，就至少应该废除对结社、游行、罢工等基本人权的限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等，本来就是基本人权，也是宪法权利。至于罢工权，中国政府在1982年的宪法修改中删掉了，但这根本不合理。基本人权和劳权是任何政权都无权取消的！剥夺了民工什么权利，就还他们什么权利。

可是官吏到今天为止也不脱那种恐龙时代的思维：他们要人民绝对信任自己，但他们就一点不相信人民，认为只要一承认人民的基本人权与劳权，就会天塌下来，就会推翻政权，或者像某个大官对工人的警告：你们抗议闹事，就是阻碍经济发了地下电台的倡议，还有近年才兴起的独立媒体运动（Indymedia）。这里只是套用它来表达一种自主反抗精神。





展，就是搞无政府主义，就是与国家对立。这不过是上纲上线的诬捏罢了。香港被称为示威之都，一年下来不知有多少次游行，但是并没有演变成“无政府主义”啊。官方那种不惜牺牲广大劳动人民，不惜牺牲环境的所谓发展，才是铺向动荡和灾难的道路呢。

职业病与社会运动

直到目前为止，自发性的抗争仍然是民工的主要形式。像GP超霸工人那样比较有组织的抗争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在离厂之后也不成组织了。民工这种自发性的抗争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出的气力很大，获得的成果总是一时的、微小的。自发罢工往往能够迫使企业主提高一点工资，但是老板往往在日后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劳动强度，调整加班时间等等），夺回工人的奋斗成果。150年的世界工运史表明，没有工人自主组织，一切自发抗争及其成果都不会持久（官方工会完全是政府的统治工具，并非工人自主组织）。如果欧美国家的工人待遇比较好，更重要的，如果他们较有劳动尊严，如果像香港那样劳权非常缺乏保障的地方，官商对工人的尊严的侵害都多少有个底线——至少香港金山电池的工人不用在有人监视的情况下取尿样——那首先因为他们发展了自己的自主组织，首推工会，但不限于工会。

工会的作用不仅是提高工资，就是在抵抗职业病与工业意外方面，工会的作用更是不可缺少。在西方早期，不论是为工人开设健康诊所，还是接济受害工人，还是监察工厂的工作环境，还是促进有关职业病的预防与赔偿的法律，工会的斗争是





不可缺少的。美国第一个职业病诊所就是工会开办的。1911年3月，美国纽约的三角制衣厂的大火烧死146个工人，引起工人运动的强烈抗议，导致了美国第一个工业意外赔偿法的产生。同时，工会迫使雇主同意成立环境卫生监察局去预防职业病及工业意外，工会自己则设立诊所为受害者服务。在事件之后，工会会员飙升，因为工人知道工会在抵抗职业病及工业意外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十世纪初也是大量工人罢工才迫使国会制定较为完善的赔偿法律的时期。欧美的有关法律还常常成为其它国家的有关法律的典范（包括中国）。只有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政府官吏和政治精英才慢慢改变过去完全而公开地偏袒资本家的态度，并多少响应劳工的要求。在今天美国，由于工会会员的监督，有工会的职场所受到当局检查卫生条件，比没有工会的职场，次数平均高出五倍。Herbert Abrams 在他的书《职业健康小史》里说：

“整个劳工健康与疾病的历史表明，在有关立法、工厂巡查、赔偿、改革与预防的事项中，工人都扮演着关键角色。

劳工的抗议、罢工、诉诸法律以及工业灾难，都是促成有关方面采取行动的催化剂。从工业革命一直到现在，劳工组织起来，都是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得到改进的关键因素。”⁷

就是在抵抗各种假冒商品的侵害上，也需要工人的自主组织，例如消费合作社。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英国，除了无良工厂主之外，还有无良奸商以种种假冒伪劣的商品来欺骗工人。这

7 转引自Occupational Disease and Workplace Safety: A History, <http://disease.legalview.com/articles/57757/>





种商业现象本来就没有种族性。而当时英国工人的对策，就是组织非牟利的消费合作社，直接向供货商订购比较便宜而又质量较有保障的商品卖给工人。最早是1844年在英国Rochdale成立的The 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洛德尔城公平先驱协会）。由于大受工人欢迎，在1872年与其它合作社联合组成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CWS）——批发合作社⁸。这种劳工组织曾经与工会一道对帮助工人抵制假冒伪劣商品作出不少贡献。

工人不仅仅是受害者，还是有自救能力的、能够思考能够行动的人，所以也有能力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或者推动公共权力去合力解决问题。官方立场则相反，它总是要人民“相信党，相信政府”，要工人坐等官员的救济。同一思维贯串在几乎一切社会问题上：我们父母官为你们解决一切问题，只要你们不要自己动手。但是，当追讨欠薪也要总理出面，当总理出面了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到了这个时候，还能相信官员有能力解决所有重大民生与腐败的问题吗？这种思维的根本缺陷，是以为官吏制度（Bureaucracy）是万能的机器，而坐在金字塔尖顶的大官当然更被看作“无所不能”。其实呢，官吏制度如果没有来自民主的控制与监督，它连自己的恶性膨胀也控制不了⁹，自己的腐败也控制不了，何况是解决千万人民的、千差万别的种种问题！

⁸ 这个合作社到今天仍然存在，不过已经变得同一般超级市场没有什么分别了。不过这不能否定它历史上的贡献。

⁹ 早在1955年，帕金森就在英国经济学会杂志发表文章（后来结集成书），分析官僚制度必然地膨胀的原因，即所谓帕金森定律。





❖ 遭受害女工维权史 ❖

其实，维权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放手让人民自己解决问题。这并非否定政府功能，恰恰相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只有在来自社会运动的监督，政府的腐败才比较有可能得到遏制，才不致太公开地偏袒大财阀。从根本来说，当然更需要建设民主政制。但是民主政制本身也需要强大的工人运动及其它社会运动，才具有社会内容，才成为活泼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否则，纯粹限于政治选举的民主，不能不变成徒具形式的





东西。

附录：工人被骗的经历

1. 工厂和卫生部门无数次向工人隐瞒受镉害的实际情况。
2. 工人被骗要先检查血镉并超标，才能再接受尿镉检查。
3. 工人上访北京被骗回惠州。
4. 工人被误导以为离职后厂方会对他们的健康负责到底；且误导工人说离开镉环境，多喝水，多喝牛奶就会自然排出体外。实际上有些工人的病情在恶化。
5. 厂方欺悔听话老实的中毒工人叶小翠，在做诊断时，厂方代表张莉强行要叶小翠写不在镉车间工作的职业史，否则要小翠的妈用一万元钱来赎回小翠。小翠自小怕事，赶紧写了不在镉车间工作的职业史。致使叶小翠连复查的资格都没有了。
6. 超霸厂许诺给受镉影响上班的工人300元/月营养费，但是当中毒工人上班后领到的营养费却是280元/月，观察对象才100元/月。
7. 自费查出镉超标的在职工人，因检查有血尿，全身痛不能坚持上班，已多次申请要求厂方为其做职业健康检查，但是厂方还是采取拖、压、骗的方式来对付工人，并不为工人作检查。
8. 工人被骗去宾馆作体检。签订的协议内容是在有资质的医疗机构体检，实际上却是在招待所。工人有异议时，厂方竟以放弃复查为由不再安排检查。
9. 在2005年和2006年的体检过程中没有误工费，没有伙食





费，车费没有全额报销，在那两年的复查中，工人为了镉检查还得自己掏腰包。

10. 以前厂方答应给小孩子体检，而且还答应给小孩子奶粉钱，但是直到现在，都没有实现。
11. 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要脱光衣服洗澡后再留取尿样，且在省职防院都没有这样的程序，但是在惠州，有关方面制定这套方案来对付工人。这是想让工人知难而退，放弃复查，从而达到工厂不用负责的目的。
12. 镉在体内波动性太大，有的工人检查结果在一个月内相差上百倍，但是厂方并不给工人复查的机会，只要查出一次正常就视为正常。这样对工人太不公平。





GP超霸电池镉毒事件大事表

日期 / 地点	事件摘要
2003 10月及12月 / 超霸厂	两名超霸厂员工自费检查发现血镉超标。粉房工人陷入恐慌，集体怠工。
2004 5月 / 超霸厂	前后有50名装配部工人自费检查，绝大部分超标。厂方不予承认，且拒绝工人的体检要求。部分工人向广东省及惠州市各政府部门投诉。
5.24	厂方安排装配部540名工人分批血检，但一直隐瞒检查结果。
6月 / 超霸厂 6.9-11	装配部工人罢工。厂方以小纸头发给工人检查结果，不发原件。同时只答应一次送5名工人住院。
6.12-18	工人再次罢工，拿到原件，但检查结果比自费体检低很多。厂方表示：应以尿镉为准，且只安排121名工人尿检。工人继续派代表上访。政府出面，安排106名工人在惠州住院，22名较严重者送往广州。
6.14-21 / 先进厂	先进厂装配部工人罢工，工厂被迫答应安排体检。先进厂450名装配部工人血检。体检结果：130多人镉超标。
6.29 / 超霸厂	超霸厂强迫4名住院工人出院。
7.2 / 先进厂	先进厂以小纸头发给工人检查结果，不发原件。工人再次罢工堵路，要求工厂改善工作环境。工厂停产，安排血镉超标员工做尿镉检查。
7.3	香港多家媒体将镉毒事件曝光，引起各界关注。
7.6	金山集团在各报刊登广告，否认工人的指控。
7.9 / 广州	厂方及惠州市政府官员一起拉7名工人出院 惠州：至中旬，63名工人陆续出院，出院证明列为“观察对象”。



2004	7.15 / 先进、超霸厂	先进厂110多名女工尿检结果超标，送进市中医院和第二人民医院。 超霸厂59名出院工人开始与厂方谈判
7.22		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前往惠州调查镉污染状况。
7.23		30多个香港团体约40多人到金山总部抗议。
8.2 / 超霸厂		2名超霸工人拿到轻度镉中毒的职业病诊断。
8.3		惠州市政府召开媒体见面会，承诺对工人负责到底。
8.9 / 超霸厂		省职防院，金山集团和政府召开镉偏高员工答问会，提出方案给59名工人：给镉观察对象8,000元，血镉超标及尿镉恢复正常者3,000元，限15天内选择，并申明此为公司临时发放，随时可以取消。 又要接超霸厂6名工人出院，工人拒绝。
8.11		央视国际《今日说法》播出：《谁来保障我们的后半生》（至此超标人数为177名，2人为慢性镉中毒）。
8.17 / 先进厂		先进厂出院回厂的工人游行到市府。政府召开员工问答会。
8.26 / 超霸厂		28名工人去北京上访，一无所获，9月2日回到惠州。
9.1		香港理工大学开学，学生贴出大字报袭击罗仲荣。
9.3		厂方给出新方案，修订极少。之后超霸厂、先进厂工人纷纷解除合同。
9.8-11 / 超霸厂		8月中旬体检，140名工人镉超标。该厂尚有500多名工龄5年以上的老工人，要求重新检查不果。工人罢工，阻止厂方出货，轮流值夜。工厂及市政府被迫同意为600多名曾从事镉作业的工人分批体检，但私设了侮辱性的体检程序。



GP 超霸电池镉毒事件大事表

9.11 / 香港	香港团体抗议金山集团。“绿色和平”再度前往惠州，检测梅湖工业区向东江排放污水的情况。10月3日公布报告。
9.22	罗仲荣首次声称：事件由管理层“不够严谨”所致，并指会设立工业安全基金。
10.26	25日，重庆电视台播出《惠州镉超标事件》
11月 / 捷霸、香港时晖厂	香港媒体曝光深圳捷霸工人镉超标、中毒事件。国内报纸接着报导。时晖厂工人听到大陆厂镉害事件后，100多人要求厂方体检，事后发现3人镉中毒，21人镉超标。
12月底	65名超霸、先进厂工人提起诉讼。
2005 1.18	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求个准确的职业危害诊断结果，真难！》，报导捷霸事件。
2月 / 香港时晖厂	厂方在2月至6月间陆续遣散工人。
3.18 / 超霸厂	首批超霸工人诉讼开庭。
5.19	市委书记柳锦州和副市长许光会见罗仲荣、庄绍梁。
6.24 / 超霸厂	首批诉讼工人确定败诉。
6月底 / 捷霸厂	捷霸厂开始将生产镍镉电池的机器搬往湖南，7月底搬完。
9.6	第二批超霸工人诉讼开庭，两厂共244名
10.11	罗仲荣被香港特首曾荫权任命为行政会议新成员
10.14 / 捷霸厂	捷霸工人诉讼开庭。之后亦败诉
12.12 / 超霸厂	前来复查的工人为反对侮辱性的体检程序，发动示威抗议，15日再到市政府上访，均无结果。超霸厂宣布不遵守者即自动放弃复查权利。 第二天香港几十个民间团体和国际代表到金山总部示威，声援工人。（至此超标人数为400多名，21人为慢性镉中毒）





2006	1.19	超霸、先进厂工人到港示威，与金山高层谈判，毫无结果。
	3.24	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召开，超霸、先进厂工人前来抗议，再次要求取消侮辱性体检程序，合理赔偿，并给工人的小孩体检。罗仲荣避开。
	4.21	香港团体向金山集团的特别股东大会举行抗议
	6.28	金山集团控告全球化监察、职工盟、街工三个团体，称他们发放的抗议GP产品的明信片有“诽谤”成份。三个团体延聘律师抗辩。
	7.11	乐施会总干事庄陈有不满金山集团的处理手法，宣布辞去金山集团工业安全基金会拨款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8.31	第二批超霸厂工人败诉。
	9.13	4名超霸、先进厂工人来港抗议金山集团。大约同时，国际自由劳联、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国际工会网络及比利时总工会等发信给金山集团表达关注。
	10.26 / 捷霸厂	工人静坐抗议厂方推出苛刻的离职方案。
	11月初	146名工人向超霸、先进厂提出诉讼，要求厂方安排每年例行体检。
	12.26	3名工人诉讼代表与厂方达成协议，后者得向工人提供每年体检。
2007	1.4-9 / 无锡松下	无锡松下电池厂工人，在看过2006年12月10日的央视有关超霸电池镉毒事件报道后，罢工和游行要求厂方提供体检，但是受到镇压。
2009	2.19 / 捷霸厂	深圳捷霸厂200员工，包括受镉毒影响者，堵塞厂房门口，抗议厂方搬厂没有补偿，也没有承诺继续照顾镉中毒或超标工人。事件以厂方让步结束。
	12.8-12 / 超霸厂	惠州超霸厂一千名员工罢工和堵路，抗议过低工资，最后厂方让步。





为健康与尊严而抗争——编受害女工维权史

出版者 全球化监察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九龙中央邮箱72797号
电话 (852) 6187 3401
电邮 info@globalmon.org.hk
网 址 www.globalmon.org.hk

封面设计 Charlotte Wu
内文排版 Charlotte Wu
出版日期 2010年6月
定 价 HKD 100 / USD 15 (含邮资)

版权属全球化监察有限公司所有。
非牟利转载本书内容者，请注明出处並告知本公司。

ISBN 978-988-18039-5-5



全球化监察致力促进中国劳动权利和生态平衡

